歷史教學

LISHI JIAOXUE

5

1959



中国現代史参考图片（十）

（中央革命博物館供稿）



图 一



图 二



图 三



图 四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二个年度，即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人民解放軍由防御轉入进攻，国民党反动軍队則由进攻被迫轉入防御。在这一年內，我軍共歼灭敌軍一百五十二万余人，解放了包括三千七百万人口的十五万五千方公里的土地和一百六十四座中小城市及重要都会。〔图一〕1947年11月12日我軍解放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魯豫兩解放区連成一片。圖为我軍向石家庄敌軍司令部發动冲鋒；〔图二〕1948年3月，我东北野战軍攻克了四平街，胜利地結束了冬季攻势；〔图三〕1948年4月21日，我西北野战軍收复了革命名城延安。圖为庆祝延安光复的群众大会；〔图四〕1948年3—7月，我軍粉碎了敌中原防御体系。圖中左方为我軍进入开封；右方为我軍攻上襄阳城头；中間为华东野战軍某部为首先攻入洛阳的部队授予“洛阳营”的授旗典礼。

歷史教學

·月刊·

一九五九年五月号（总第101期）　　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出版

目录

·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教学参考·

·教学問題·

× × × × ×

編輯者　历史教学月刊編輯委員会
發行者　天津市邮局
訂購处：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售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者　历史教学社（天津营口道79号）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定价每册 0.26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0.78元
半年六期 1.56元
全年十二期 3.12元

本期印数 001——25,180

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我們应該如何紀念五四运动

王 可 风

五四运动是1919年在中国爆发的一次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领导，有小资产阶級和資产阶級参加，后来工人阶級也参加了，开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五四运动伟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革命走上新的阶段，在这以前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从这以后中国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之中国的历史也揭开新的一頁。

自1840年鴉片战爭以后，外国資本主义侵入中国，日益加剧的强占和掠夺，使中国人民受到很多迫害。当时清代的封建王朝，已經腐朽不堪，不能抵御資本主义的侵略；为着維持其統治政权，它反而又常与外国侵略者勾結起来，狼狽为奸地来殘害中国人民，出卖中国人民的利权，使人民的痛苦日益加深，社会日益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华民族灭亡的危机日益严重。

中国的农民阶級和資产阶級都曾掀起和領导过革命，向侵略者和封建統治政权进行斗爭，但因其阶級局限性，不可能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正确的政策，因之屡次遭到失敗，无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政治在許多封建軍閥操縱把持下，形成分崩离析的状态。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內横冲直撞，有恃而无恐。当时中华民族似乎已到了絕望的时候，五四运动的爆发，却使中国革命起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二年，1917年，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給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启发，使中国人民認識到要爭取解放，必须走新的道路，在无产阶級領导下，彻底摧垮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統治，由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完成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使广大人民过着民主与自由的生活。五四运动时中国的工人阶級参加了这次运动，同时进行着坚决不妥协的斗爭。由于革命运动的气势磅礴，使封建統治者不能不在革命人民面前妥协让步，免除卖国賊的职务，拒絕对帝国主义签訂丧权辱国的条約。革命人民取得一次斗爭的胜利。在这次革命运动中，又鮮明地提出"民主"与"科学"的要求。民主即是推翻独裁专制，实现人民民主；科学即是反对封建迷信，实现科学文明，这正是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的愿望。中国的工人阶級参加了这次斗爭，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从此以后，中国工人阶級在中国革命中就起着領导的作用，沿着新的方向向前迈进，将中国革命指向胜利。

关于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毛主席于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論"一文中說："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692頁。）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他們的知識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級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級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級，就是这样的阶級。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継

續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經不是属于中国資产阶級，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級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級，由于自己的長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經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665——666頁。）

五四运动为无产阶級政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随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誕生了，从此中国人民在革命斗爭中有了正确的領导。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都針对着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出正确的方針和政策，特别是教育人民，发动人民，領导人民，建立人民武装，創立革命根据地，向反革命坚貞不屈、再接再励地英勇斗爭。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民經过二十多年的流血斗爭，終于在1949年推翻了蔣介石的专制独裁政权，将帝国主义驅逐出中国去，取得解放战爭的胜利。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誕生，建立了工人阶級領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从1949年到现在又是十年，这十年中又經过了一系列的运动，特别是1956年的三大改造，解决了生产資料所有制的問題，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又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民都在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照耀下，勇气百倍地建設社会主义。

从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到今年已是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間，中国人民与反革命进行了曲折复杂的斗爭，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領导，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揚光大，由于毛主席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結合起来指导实踐，廓清了各种反革命势力，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質和面貌。所以今年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时，我們深深感觉兴奋的，就是五四运动时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已經完成了，結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不仅如此，建国十年来的斗爭，也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当前的任务是加速建設社会主义。为着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設，必須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繼續以不断革命的精神来普及文化，发展科学，以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建設早日完成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现在中国人民又走进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人民的历史，又揭开新的一頁。

从以上的一些意义来看，今年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我們历史科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学工作者应該做好哪些工作呢？我以为有以下的几項工作急需去做：

第一，做好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做研究工作，非占有大量的資料不可。建国以来，历史学界有些同志曾将中国近代史的大批資料整理出版，如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等，但中国现代史史料整理出版的却很少。虽然也曾有人进行这項工作，出版了几种专題史料，但远远不能适应历史研究工作的需要。实际上中国现代史的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問題在于散存于各处的史料，如何去粗取精地加以整理。如一些报紙、书籍、刊物，特别是一些档案，系統地整理、編輯、出版的却很少。从历史科学的工作需要来看，是迫不及待的，如报紙上的資料、杂志中的資料、档案中的資料，都应該有系統地按专題进行整理。整理这些資料，自然也会碰到一些困难，如革命的資料少，因为以前处在革命艰苦斗爭的环境中，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在搜集頗有困难；另一方面是敌人报刊、档案太多，搜集整理也不容易。这是客观的困难。再就是主观上的困难，如人力不够、做这种工作的人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不够等等。这些困难都不应該阻碍着我們史料整理工作的进行。我們应有信心来克服这些困难，因为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这些困难都是比較容易解决的；問題在于我們历史科学工作者，如何很好地組織起来，互相协作地去进行。关于史料的搜集工作，过去有不少的单位、有不少的人都在进行了，但多是各按所需地去搞，实际重复劳动很多，而所得的效果却很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吸取以往的經驗，我們应当很好地組織起来分工合作地来做。科学研究机关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大专学校中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学中教中国现代史的教师、图书館、档案館，組織起来，共同研究拟訂計划，互相配合协作进行，工作中遇到困难，共同商討解决。今天是社会主义时代，党是重視这一工作的，只要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党会給予大力支持。凡是参加这一工作的，消灭資产阶級的独占史料的思想，发揮共产主义的风格，就会合作的很好，会取得很大成績，会在今后不多的几年中，也象已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一样，出版一套中国现代史料丛书，或者更多出版些中国现代史的专題史料。有了大批的历史資料，无論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或教学工作者，都会有很大的

便利。

第二，編写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史的书。要对学生有系統地教历史課，要使国家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很好地認識中国现代几十年的历史，从而清楚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規律，了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义斗爭的經过，加强爱国主义的热情，激发建設社会主义的信心，必須要有正确的全面的系統的中国现代史书。建国十年了，直到現在还沒有这样一部书。从解放以来，全国大中学校教授中国革命史的同志不少，大都編有講課提綱，各級党校也有不少的同志講党史課，也編写了一些教材，这些在过去教学中都起过不少的作用；但公开印出来的很少，已印出来的几种，又多是革命史性質的，当然这也是需要的，至于对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經济、軍事、文化各方面情况全面地系統地詳細地闡明，能以之更好地認識中国人民斗爭历史的現代史的书，却还沒有。这应該說是我們中国史学界的遺憾。毛主席早在1941年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学习"一文中就指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鴉片战爭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眞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还没有人認眞动手去研究。"他針对着这种情况，在同一文章中并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組織的状态。应先作經济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第798頁及802頁）在现在看毛主席的这些話还有現实的意义。时間已过去十八年，解放以后也已十年，以現在的社会条件，历史学界又有雄厚的力量，早应該有很大的收获，然而却沒有取得应有的成就。今天重讀毛主席的这段指示，深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我們应該积极努力，在党的領导下組織起来，去完成毛主席久已所期望于我們历史工作者的一項工作，依"厚今薄古"的方針，早日完成中国現代史的編写工作。

第三，做好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工作。現在有不少的同志在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工作，也取到很大的成績。但有些同志不安心于这項工作，認为教中国现代史不容易，据說有三大困难：一是沒有系統的中国现代史书为蓝本，教起来难能做到又全面又有条理；二是参考資料缺乏，教学內容难于丰富；三是政治修养理論修养不够，对党的方針政策，常会講的有偏差，以致在政治上影响不好。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对于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教或学，重要的意义在于使全国人民知道今天中国社会是怎样发展来的。知道有了过去經过几十年极艰苦极复杂的斗爭，才有今天社会主义建設，才可以更加珍爱和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知道社会发展的規律，更可以适应和掌握这个規律来建設我們的国家；知道党在全国人民英勇斗爭中所起的作用，更加热爱党，永远在党的領导下积极工作。所以对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現代史，教也好，学也好，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教或学中国现代史有很多有利条件：第一是时間相距不久，历史事实有些还能熟悉記忆；第二是資料很多，便于搜集参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有毛主席的著作給我們很多的启发和指导。这都是非常有利的。至于如何将党的政策方針講的正确而又清楚，只要努力学习，深入体会，也是会做好的。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对我們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設，有很多的关系，并有丰富的內容，只要坚持"厚今薄古"的精神努力去做，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当然教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有几个关鍵性的問題应該抓住而加以闡明。一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作用；二是毛澤东同志如何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問題結合起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踐；三是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各阶級的变化；四是党对于巨大事件和重大問題的方針和政策；五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总之使学习中国现代史的人，知道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經济、軍事、文化的变化发展，中国人民革命复杂斗爭的过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質的轉变，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建設，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澤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今后社会主义建設，有許許多多的工作，我們仍应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指导下，以不断革命的精神，継續努力去做，直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前进。

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我們历史科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学工作者应当共同决心做好以上的几項工作，这是很有意义的。

五四运动期間李大釗的馬克思主义宣傳活动

高全朴　張豈之

五四运动距今已經整整四十年。在这段不算太短的时間里，中国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領导下已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徹底胜利，并已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目前我們正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設。这一系列的伟大胜利也正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傳播，是从五四运动时开始的。李大釗同志就是我国最早的馬克思主义宣傳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創始人之一。

在接受馬克思主义之前，李大釗同志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在这段时期里所写的著作及其活动充分說明，他具有着要求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确道路，而且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光明的未来。

例如，李大釗同志在1917年4月17日为"甲寅日刊"所写的社論"眞理之权威"中說，追求眞理是"人生最高之理想"，为了获得眞理，必須有頑强的斗志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黑暗的社会里，眞理往往被視为"邪說淫辞"，同时，宣傳与信服眞理的人也往往会遭到杀身之禍。因此，許多人"懾于社会心理之势力"，苟且姑息、因循敷衍了。李大釗同志极力反对这种懦怯的行为，他根据許多历史事实，作出了这样的結論："天經地义未必永为天經地义，而邪說淫辞則又未必果为邪說淫辞也。"他又举例說，明代思想家李卓吾是封建正統思想的叛逆者，被統治者所杀，但他的言論和他的著作却不是統治者所能摧毁的，"固犹在人間也"。这就是說，眞理一定会战胜謬誤与反动，新生的力量一定会战胜腐朽与落后。

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追求眞理的精神，在李大釗同志所写的"青春"（1916年9月）这篇名文中表現得最为集中，最为突出。面对着当时"仅有中华之名，无民国之实"的黑暗現实，大釗同志并不悲观失望，他宣称要"再造其神州"，要写出"洁白之历史，新裝之历史，待施絢繪之历史"。而这样光輝的历史之写成，是要依賴"青年之自觉"的。这就是說，青年們要勇于打破旧的，"冲决过去历史之網罗，破坏陈腐学說之囹圄"；还要敢于"脫絕浮世虛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軸"。这样一种对于新的、对于光明前途的贊美与坚定的信念，象一根紅綫似地貫穿于大釗同志的全部早期著作之中。

但在这个时候，李大釗同志虽然有志于把北洋軍閥所控制的旧国家改造为"青春之国家"，冲决封建統治的旧历史，創造中国的"青春之历史"，可是这种"青春之国家"、"青春之历史"，其具体內容怎样？又怎样着手去創造？李大釗同志当时并不了解，这些問題不是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所能解决的；他正在努力摸索解决这些問題的新的眞理。

1917年是伟大的一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埋葬了剝削制度，建立了工农群众自己的国家。俄国工人阶級以实际的榜样告訴全世界的工农群众，只有在馬克思主义政党的領导下，通过无产阶級革命与无产阶級专政的道路，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十月革命的胜利所給予不断要求进步的中国革命知識分子的影响十分巨大，正如毛主席所說："中国的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經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經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級已經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級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①

正在孜孜不倦追求眞理的李大釗同志正是从十月革命中以及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看到了民族

①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692頁。

解放的新希望；找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眞理。他为找到了眞理而感到无比兴奋的心情，在他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言論里表現得淋漓尽致。他这样說："二十世紀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紀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①；"由今以后，到处所見的，都是布尔什維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聞的，都是布尔什維主义的凱歌声。人道的警鐘响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

正当軍閥官僚們陶醉于所謂"联合国武力战胜"，以及那些不明白事情本質的人也跟着这样呼喊的时候，李大釗同志則正确地解释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伟大变化，明确說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束，并非什么"联合国武力战胜"，而是"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③。他进而指出，由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世界的新潮流"，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遏得住的，今后的世界，一定会"变成劳工世界"。

虽然他在这里没有单独提出中国来加以論列，但他既認为世界上各国都要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中間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內。由此可見，李大釗同志在經过了長期的艰苦的摸索之后，終于开始認識到中国的正确出路应当是而且必然是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要着重指出，李大釗同志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坚信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的新潮流"，預言今后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这决不是一时激情的表現，而是具有着坚实的思想認識的基础的。大釗同志在十月革命以后，开始学习馬克思主义，在学习的过程中，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努力克服他早期所受的克魯泡特金与托尔斯泰的影响，表現了自我改造的坚定决心。同时，他又注意运用馬克思主义去观察、分析实际問題，他关于十月革命的正确論斷，就足以說明这一点。

也正由于是在馬克思主义指导下观察問題，因而李大釗同志在分析十月革命的胜利时，才正确地指出：社会現象中的各种不合理的現象，都是由于"生产制度"（即經济制度）的不良所造成的，因此，"生产制度如能改良"，"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爭夺，自然都可以銷灭"④。这一認識是极其重要的，当馬克思主义还未傳入中国，一些向西方寻找眞理的先进人物，虽有改革中国的善良愿望，但他們并不了解应从哪方面下手来进行改革；他們所設計的方案，一經拿到实际中去考驗，便先后破产了。只是馬克思主义傳入中国以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才首先指出改革的关鍵在于旧的生产关系的改变。李大釗同志又指出，在"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得到十月革命光輝的照耀，青年們应"趁着这一綫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一点有益的工作"⑤。

介紹与闡述馬克思主义，正是当时客观环境所提出的重要任务，也是迫切需要做的有益的工作。

李大釗同志努力进行了馬克思主义的宣傳活动，在1919年5月号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馬克思主义观"一文。一开头他就指出，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的革命学說，对它作介紹，使人們对它有正确的認識与理解，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因为，馬克思主义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便会变成伟大的物質力量。

十月革命以后，当馬克思主义刚开始在中国傳播，资产阶級右翼的代言人胡适就对它进行污蔑与攻击，并在1919年的4月发表了"实驗主义"一文，販卖帝国主义资产阶級的哲学与社会学，想以此占据整个思想陣地。李大釗同志的"我的馬克思主义观"也正是对胡适的"实驗主义"一文的反击。

李大釗同志的这篇文章在闡述上虽也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在当时是唯一的一篇比較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着重闡述了社会主义必然取得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規律的科学理解的基础之上。大釗同志之所以要着重地闡述这一点，正是为了战斗的需要。当时，反动統治阶級及其走卒們一面污蔑說"阶級斗爭"是馬克思"制造"出来的，布尔什維克散布"仇恨心"等等，另一方面胡适又在他的"实驗主义"

---

① "法俄革命之比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7.1.

② "布尔什維主义的胜利"，"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10.15。

③ "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10.15。

④ "新紀元"，"每周評論"第3期，1919.1.5.

⑤ 同上。

一文中大肆鼓吹实验主义才是"科学的"①。因此，着重闡述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統一，不仅具有教育人民的作用，而且也是对于敌人的污蔑之詞的有力反击。

李大釗同志从"哲学的貧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經济学批判"等书中摘引出馬克思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經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些論断，加以发揮与解释。他首先說明社会革命的发生并不是任何人主观上制造出来的，而有其客观的必然性，这就在于：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解放生产力，"結局这旧社会組織非至崩坏不可"，因而发生了革命。社会革命的結果，引起了旧經济基础的改变，随之又引起全部上层建筑的改变。接着大釗同志又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說，闡述了資本主义制度剝削的实質。由于資产阶級的殘酷剝削，引起了无产阶級的反抗，"阶級的斗爭因而益烈。斗爭的結果，把这集中的資本收归公有"，这样才能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見資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

李大釗同志又論証說，馬克思主义認为，社会主义不会自行到来，社会主义的胜利，依賴于工人阶級"联合起来，推倒資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的实現，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他認为阶級斗爭的学說好象"一条金綫"，把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即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經济学和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联絡起来"。

李大釗同志在其所写的宣傳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有不少地方是闡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这，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近代的先进人物不仅没有找到中国的正确出路，而且没有認識到改革旧中国的力量——革命群众的力量，因而他們的努力都失败了。只是在馬克思主义傳入中国以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才首次指出人民群众是改造旧社会的伟大力量。第二，反动統治阶級及其走卒一貫鄙視群众，和群众站在根本对立的地位，而当群众开始觉醒并行动起来的时候，他們又感到万分恐惧，千方百計地加以破坏与阻挠，例如胡适在当时就大肆宣揚腐朽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以麻痺群众的革命意識，因此有必要加以駁斥。

李大釗同志首先闡述了劳动創造世界的眞理，他說"一切物質的財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結果"，因此应当"尊重劳动"②。他向青年們指出："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輸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識阶級与劳工阶級打成一片不可"③。他还注意到农民，認为占中国人口絕大多数的农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国民全体不解放"④。人民群众的解放，不能依靠任何人的恩赐，也不能去向統治阶級"央求"，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爭，"从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来"⑤。这就是說，劳动人民要得到解放，必須彻底扫除"宰猪式的政治"（剝削制度的同义語），这种政治"把人民当作猪宰"，拿人民的"血肉骨头，喂飽了那些文武豺狼"⑥。而在这些"文武豺狼"的背后，是有"太上政府"作靠山的，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軍閥政府1915年俯首貼耳地接受了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件，又在1919年把原先德国所占有的山东权益交給日本。李大釗同志指出，这类丑恶的事实无一不証明"东交民巷里有我們的太上政府"⑦。大釗同志不仅揭露了中国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結，还揭示了"巴黎和会"实質上是分贓会議。他完全支持5月4日的学生爱国运动，这样大声疾呼："我們反对欧洲分贓会議所规定对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狹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⑧由此可見，李大釗同志在当时已經認識到，不推翻那些軍閥官僚以及帝国主义"太上政府"的統治，中国人民是得不到解放的。

在五四运动中就表現出了群众反日本帝国主义与封建軍閥的伟大力量。学生們提出了"外爭国

---

① 胡适在"实驗主义"一文中說：实驗主义具有"两个根本观念：第一是科学試驗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又說什么"实驗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胡适文存"，第二册，第83頁）。

② "現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晨报"，1919.3.15——16。

③ "青年与农村"，"晨报副刊"，1919.2.20——23。

④ 同上。

⑤ "眞正的解放"，"每周評論"第30期，1919.7.13。

⑥ "宰猪場式的政治"，"每周評論"第18期，1919.4.20。

⑦ "太上政府"，"每周評論"第23期，1919.5.26。

⑧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評論"第22期，1919.5.18。

权，內懲国賊”、“废止二十一条”等等的政治斗爭的口号。当“五四”发展到“六三”时，工人阶級参加了，“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工人群众在罢工斗爭中提出的口号是“喚醒国人”、“勿忘国耻”、“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禍”。这些，标志着在十月革命以及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影响下的中国工人阶級开始了政治觉醒。

当馬克思主义已在中国开始了傳播，当群众性的徹底的反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政治斗爭已經开始，帝国主义者及其走卒們感到万分惊慌。他們为了压制革命运动，一方面采取鎮压的手段，一方面又采取了“攻心战”，亦即企图从思想上腐蝕群众。于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杜威于1919年的6月来到了中国，在他所作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講演的第一节里便极力反对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而宣揚“零零散散的改造”①。胡适和杜威一唱一和，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31期上发表了“問題与主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一文，其中污蔑馬克思主义者的宣傳活动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又把馬克思主义和王揖唐口头上所挂的“社会主义”这一騙人的辞儿混为一談，而断言“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詞来騙人”。他更反复說教，中国社会不可能徹底改造，而要从所謂“多研究些問題”入手。

这是胡适对馬克思主义的直接挑战，而且带有根本性的严重性質，因为他的“少談些主义，多研究些問題”这一口号的实質是，既反对群众的革命斗爭，又反对运用馬克思主义对中国进行徹底改造，这是資产阶級右派所設計的一条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綫。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呢？或者还是走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投降与妥协的道路呢？这是根本性的問題，，一絲不能含糊。因此，对于胡适的“少談些主义，多研究些問題”加以徹底駁斥，使群众了解其投降主义的实質，在当时是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李大釗同志很敏銳地識別出了胡适的险恶用心，于是在1919年的8月发表了“再論問題与主义”一文，其中將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綫（大釗同志說：將馬克思主义“用于环繞着他的实境”，亦即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和投降主义路綫划分为两条火水不相容的对立的路綫。大釗同志指出，社会問題的根本解决，是指的旧的經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的徹底改造。如果没有經济基础的改造，全部上层建筑的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問題的根本解决也是不可能的。胡适所謂“多研究些問題”不过是反对社会的徹底改造而已。大釗同志着重指出，社会的徹底改造，决不能自发地完成，必須在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才能成功。胡适所謂“少談些主义”不过是阻碍工人自觉，反对革命运动的开展而已。

李大釗同志又說，革命者决不能因为某些敌人（如王揖唐之流）口头上挂着“社会主义”字样欺騙群众，便放弃对馬克思主义的宣傳；相反，“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义，用它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傳我們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声机，尽管他們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說异端哪，尽管他們乱給我們头銜，那有閑工夫去理他”。这对胡适之流的讕言是多么有力的駁斥！这便勾勒出作为实用主义留声机的胡适的丑恶形象！

李大釗同志坚定不移地相信，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学說，它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問題，因此不論敌人怎样污蔑，不論环境如何险恶，都要坚持向人民群众进行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他从俄国革命中吸取了力量，得到了鼓舞，他这样說：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者用尽了殘酷的鎮压手段，但是并不能动搖他們的革命意志，也不能“鉗制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②；革命者排除困难，勇往直前，終于取得了胜利。而那些压制革命思想的屠手們已受到历史的公正审判，被推下了历史舞台。李大釗同志指出，那些把馬克思主义称为“过激主义”的人应該睁开眼睛看看現实的社会，“过激主义种子，实在是因为社会上不滿意的事太多，才产生的。既有这个种子，那社会上的一切不平、不安稳、不公道的事体，就是他的肥料。既加了肥料，又要他不生長，那可有点办不到”③。

李大釗同志庄严宣布革命思想与革命意志不可战胜的言論，鼓舞了革命者，狠狠地打击了敌人。

敌人們則用“武打”与“文打”相互配合的办

---

① “杜威講演录”，上册，第11頁。

② “危险思想与言論自由”，“每周評論”第24期，1919.6.1。

③ “过激乎？过惰乎？”，“每周評論”第6期，1919.1.26。

法，梦想“消灭”馬克思主义。“逮捕”、“査禁书报”等等就是軍閥政府所使用的“武打”的办法；写文章、講演，对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肆行污蔑，就是胡适之流所使用的“文打”办法。同时，在反动文化陣营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与封建的国粹主义者携手合作，一面揚言馬克思主义是“外來进口”的①，“不能拿到国情不同的国家来应用”，又說什么馬克思主义“把道德問題丢开了”②；另一方面国粹主义者梁启超之流則叫嚷西方科学破产、东方的封建文明将要复活，等等。

正如毛主席所說：“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級服务的，是应該被打倒的东西。”③

李大釗同志所写的“物質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年底）与“由經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年初）就是对文化上反动同盟的反击。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釗同志运用馬克思主义的原理尝試着探究中国社会的經济基础的变化与上層建筑变化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儒家的正宗思想乃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經济組織反映出来的产物，……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④。到了中国的近代，資产阶級民主主义运动开始勃兴，儒家思想受到了批判，这和外国商品輸入、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經济”以及中国的产业进步分不开。又由于在中国具有了“現代的經济組織”（即指資本主义生产），产生了中国的“劳工阶級”（即工人阶級），因而“劳工神圣”的新伦理便产生出来。因此，想要使封建思想長命百岁，是不可能的；要想扼杀馬克思主义，也是不可能的。

李大釗同志还初步地运用馬克思主义去观察宗教与道德的变化問題，他首先分析了由拜火拜物諸教到一神教的演变的社会根源，接着对于封建社会的道德与宗教作了比較詳細的分析。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的是皇帝，皇帝之下有王公，王公之下有諸侯，諸侯之下有小領主，百姓农奴被践踏在地底”⑤，这样一种封建社会的等級制反映到宗教上，于是在所謂“天国”里也盖上了等級的烙印，“神”則相应于地上的皇帝，“恶魔”則相应于百姓。在宗教上，統治阶級宣称“恶魔”永远受“神”的支配。这实質上是假借宗教的謊言把他們对于人民的統治渲染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定的。到了資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被归結为“物品与物品的关系”，而“資本家的个人的表象照映于精神界就成了一个絕大的孤立的神”⑥。工人阶級的世界观与神学世界观完全对立，对他們来說，无論是自然現象，或是社会現象都“没有什么神秘不可解的权威”⑦。工人阶級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級观点来看法律、政治等等的上层建筑，因而才能看出它們的本質。大釗同志認为馬克思主义給予工人阶級以彻底的思想解放，他以极其形象的言語表述了这一点：“太阳出来了；没有打着灯籠走路的人了。”⑧

很显然，李大釗同志既然闡述了經济基础的变动必然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动，这就有力地駁斥了新国粹主义复古的謬論；既然运用馬克思主义闡述了道德变化的規律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也就有力地駁斥了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讕言。

社会政治思想的斗爭归根結蒂，是反映了不同阶級的不同利益及其不同的世界观之間的斗爭。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卒在中国所大肆宣傳的实用主义，反映了美帝国主义資产阶級的利益，而其历史观点則是唯心主义的。（按：杜威自己就曾一再表明，他的全部政治思想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即認为社会历史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⑨。）

因此，为了更深入地駁斥反动的社会政治思想，必須对其唯心史观加以批制。李大釗同志正是这样做的，1920年写了“唯物史观在現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在其中他指出，唯心史观不但不能正确地闡明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而且它还“是权势阶級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們掠夺”。唯心史观既不能說明社会历史的本質，“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釋。这种历史的解釋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所謂“物的势力”就是“經济的生活”（即經济制度），这是决定社会构

---

① 胡適：“問題与主义”。
② “杜威講演录”，上册，第61頁。
③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688頁。
④ “由經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1.1。
⑤ “物質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第二卷第二号，1919.12.1。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杜威講演录”，上册，第16頁及第43頁。

造、生产和消费、社会阶級等等的基础。与唯心史观完全不同，唯物史观所給予人民的影响，是使他們“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即人民）于是才自覚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就是覚悟起来与反动統治阶級作斗爭，从而推翻剝削制度的統治。这里，李大釗同志强調了唯物史观与群众革命运动的紧密結合，同时也强調了群众自覚斗爭的重要。大釗同志坚信，通过群众的自覚斗爭，必然“創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如果說，在十月革命之前，李大釗同志向往于創造“青春之历史”，而他当时还正在摸索眞理的过程中，不知道“青春之历史”究竟是什么，那么，到了1920年，李大釗同志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青春之历史”就是人民群众在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自覚斗爭所創造出来的人民的历史，人民的时代，人民的国家。这就标志着李大釗同志思想的跃进。

以上我們簡略地叙述了李大釗同志在“五四”期間（这里指的是1919——1920年）的馬克思主义宣傳活动。虽然大釗同志早期宣傳馬克思主义的作品，有些地方“未必精当”，但这是非主要的，也并不需要提出加以論列，主要的是：他坚定地相信馬克思主义是彻底改造中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南，因而他努力学习着去运用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問题，并对各色各样的敌对思想展开了坚决斗爭。这些，永远値得我們学习。

当时除李大釗同志外，毛主席、周恩来、惲代英同志等为傳播馬克思主义，做了許多工作，还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傳教育与組織的工作。这就为建党准备了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人民就在党的領导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五四运动开辟了知識分子和工农相結合的广闊道路

洪 煥 椿

1919年轟轟烈烈的“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已經过去了四十年。

在这四十年当中，我們党領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今天我們不但已經解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获得了自由和独立，而且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时代。

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之一，就是为知識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結合，开辟了广闊的道路。当时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他們逐步地懂得，必須使馬克思主义的宣傳深入工人群众，使革命的理論和中国的革命实踐結合起来。这是五四运动的正确方向。

五四运动是依靠工人阶級的力量取得胜利的。中国的工人阶級在五四运动中，已成为成熟的、独立的力量。这就給当时进步的知識分子一个深刻的启示：中国的革命必須以工人阶級为領导力量。于是，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决心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革命理論的宣傳工作，进行工人群众的文化教育与組織工作。由于五四运动以后，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結合，因而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的第二年（1920），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湖北、山东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組先后建立起来了。共产主义小組的建立，推动了中国的先进知識分子和工人群众相結合。他們“傳布了中国必須实現社会主义的观点，傳布了必須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观点。他們抱着这样的观点在工人中間进行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①]。

这里，我們可以举出五四时代知識分子和工农

①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頁。

群众相結合的生动事例。这些生动的史实，对今天我們的知識分子来說，也还有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

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大学学生們所組織的“平民教育演講团”展开了群众性的宣傳工作。这个学生团体，是由共产主义的知識分子邓中夏（即邓康）及革命的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为中心組織起来的。在那一年的五一节，出动了数十人的宣傳队伍，宣傳“五一”的历史及将来的希望。从这个演講团的活动中，可以看到青年知識分子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和工农群众相接近的一系列事实，也可以看到当时进步知識分子和反动的北洋政府作斗爭的英勇事实。北京大學的工友夜校也在当天上午举行了五百多人的大会，提出：“把全世界人人紀念的五一节，当作我們一盏引路的明灯。我們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①这一事实說明五四时代的先进知識分子，已經看出工人阶級是我們的引路明灯，必須跟着这盏明灯前进。

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組建立以后，共产主义的知識分子就积极地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1920年的10月，他們在上海的工人群众中建立了最早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这个工会在霞飞路漁阳里外国語学社开发起会，到会的发起人有七、八十人，通过了工会章程三十二条②。同年的12月，上海又成立了一个印刷工会，会員中有鉛印工人三百多人，石印工人一千三百多人。这两个工会都有自己的刊物，一种是“机器工人”，另一种是“友世画报”③。

北京共产主义小組的同志們，以長辛店为中心，进行各种群众活动。1921年1月，邓中夏等同志在長辛店办了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兄弟們傳播新文化，傳播先进的思想。1921年7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第六号中，有这么一段記載：說这个“劳动补习学校除招收学生外，并且經常請人講演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知識的机会越多，各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結团体的能力也漸漸地訓練好了。五月間，他們又組織了一个工会，办理得很有条”。后来“工会又办了一个‘工人周刊’，…… 办得很有精神，……不愧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当时的知識分子在長辛店所进行的活动，大大地推动了北方各地的工人运动。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長辛店的工人弟兄們举行一个空前的游行紀念活动，有一千多位工人参加。

湖北的共产主义小組也在京汉鉄路和各工厂中进行工人运动。1921年3月，共产主义知識分子領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車夫反对車行增加車租的大罢工。

五四运动以后不久，随着青年知識分子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1920年的11月，在北京、湖南等地建立起来了。湖南是全国青年团組織最大的地区，毛澤东同志是当时的領导者与組織者。他很重視团員的質量，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发展了团員。新民学会的許多会員，都是进步的知識分子。他們已有了革命的思想准备，也参加过实际的革命斗爭，有决心和工农群众相結合。因此，他們都加入了青年团而結束了新民学会。这样，湖南青年知識分子的力量更加集中了。

当时革命的知識分子，就是这样地利用各种方法和工人弟兄們打成一片，虚心地向工人群众学习，深入了解工人的思想、感情和具体生活情况。这样，使知識分子本身也得到很大的鍛炼和改造，对革命事业来說，也更加有利了。

“五四”时期知識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結合，毛澤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是我們最光輝的典范。1920年的下半年，毛澤东同志在湖南紡紗厂、火車头修理厂、銅元局、黑鉛鍊厂、面粉厂、泥木工人和鉛石工人中，进行組織工人的工作。他亲自坐長（沙）株（州）、株（州）萍（乡）鉄路的火車，深入安源矿井，与矿业工人交朋友，为工人群众办夜校。在每一个工厂或行业里面，他发現了积极分子和干部，然后再通过这些积极分子，来扩大对周围群众的影响。蕭三同志在“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二〇年”的文章中④，詳細地回忆了毛澤东同志和工人群众相結合的动人事例。最后他說：“整个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毛澤东同志在湖南，都是在党組織正式成立之前，就緊密地与工人运动相联結了。这样，革命理論和革命实际密切結合起来，而由实际又产生了更多更切实的原則或理論。这样，毛澤东同志开始奠定了工人运动的基础，奠定了党的基础。”

从五四运动开始的革命道路，就是知識分子和

---

① 見1920年5月上海“时报”所載的“北京之劳动紀念”。

② 見“劳动界”第9册，1920年10月10日出版。

③ 見“劳动界”第18册，1920年12月12日出版。

④ 載“中国青年”第57期，1951年1月。

工农群众相結合的道路，也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踐相結合的道路。循着这一条道路发展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們說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相結合的产物，这从"五四"时期的历史事实，得到了充分的証明。历史本身說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伟大变化，就是由于"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識分子和工人群众相結合，使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工人阶級所掌握。正如陈伯达同志在紀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时所說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大变化的枢紐。这是中国人民由数千年被統治地位，而經过三十年的奋斗、逐步与完全取得統治地位的枢紐。中国人民今天震撼全世界的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正是从此出发的"①。

五四运动最光荣的傳統，就是促成知識分子和工人运动的結合。先进的知識分子以群众的智慧、創造、勇敢和力量来鼓舞自己，丰富自己，从而使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不仅从理性上获得根本改造，同时也使知識分子在自己面前展开了一个无限广闊而光明的新世界。历史的实踐証明，知識分子只有和工农相結合，才能改造自己，也同时改造世界。毛澤东同志曾經說过："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結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动往往是动搖的。"②毛澤东同志十分生动地講到他自己和工农群众結合以后，思想感情的变化情况。他說："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軍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資产阶級学校所教給我的那种資产阶級的和小資产阶級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較，就覚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都干凈。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級变到另一个阶級。"③这是多么深刻动人的体会!

从五四运动以来，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經常教导我們知識分子，必須和工农群众相結合。毛澤东同志在延安紀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所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講，就深刻地說明了知識分子必須与工农相結合的道理。他說："中国的知識青年們和学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員起来，組織起来。沒有工农这个主力軍，单靠知識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軍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識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在一块，和他們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軍队。"④他在同年5月里写的"五四运动"短文中，更明确地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結合，則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义或馬克思主义。眞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結合的。"⑤这是永远不变的眞理，也是检驗知識分子的唯一准繩，誰也逃不出这个严格的考驗。

1942年，毛澤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講話中也曾說到，在我們的文艺工作者中，一些人"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王国"。"要彻底地解决这个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时間不可。但是时間无論怎样長，我們却必須解决它，必須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們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爭的过程中，在学习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漸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級这方面来。"⑥1945年4月，毛澤东同志在"論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明白地指出："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識分子应該覚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結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应該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脫下学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覚悟起来，組織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項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⑦

1949年解放以来，广大的知識分子在党的教育下，逐漸地深入工农群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貢献。但是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广大的知

① 陈伯达："五四运动与知識分子的道路"，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②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636頁。
③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第853頁。
④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553頁。
⑤ 同上，第546頁。
⑥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第859頁。
⑦ 同上，第1080頁。

識分子虽然已經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滿。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継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資产阶級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轉变是一个根本的轉变，現在多数知識分子还不能說已經完成了这个轉变。我們希望我国的知識分子継續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①。党是如何殷切地希望知識分子迅速改造成为工人阶級的知識分子。

由此可見，知識分子进行自我改造的核心問題，就是知識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結合的問題。四十年前，革命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邓中夏、惲代英等許多同志，已經走在我們最前面，是我們的最好典范。四十年后的今天，广大的知識分子仍然要在这个問題上接受历史的考驗。

可是今天我們所处的时代，已和四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今天我們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条件更加完备了。我們有党的英明領导，广大知識分子在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指引下，在干部上山下乡、下厂下社参加体力劳动的伟大鼓舞下，使知識分子有更多的机会与工农打成一片。

五四运动已过去四十年了。四十年来的变化多么巨大！今天摆在我們面前的艰巨任务，是要把我們国家建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业和現代农业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現这个任务，知識分子必須継承五四时代的优良傳統，就是知識分子与工农相結合的光荣傳統。

全国的知識分子，一定要通过与工农打成一片，来培养自己成为又紅又专的建設人才。

我們必須根据四十年来知識分子的革命斗爭經驗和党的指示，深入工农群众，为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眞正的工人阶級知識分子而努力，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間的差別而努力，为建設社会主义和为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努力！

---

① "关于正確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頁。

"五四"时期天津爱国运动概述

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現代史教研組

一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斗爭的火焰，迅速地燃燒到天津。天津的反动派曾責令各校校長对学生的行动"暗自留心防范"；但是，它不能阻止天津青年学生对这一爱国运动的响应。5月5日，北洋大学学生便連續发出四封电报，表示愿与北京同学采取共同行动；要求卖国政府释放被捕同学；警告我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不获所愿，不签和約"；最后致函南北各地代表，希望速开会議，一致对外。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还在学生郭隆眞（即郭林一）、邓穎超（即邓文淑）和校友刘淸揚的倡导下，召开了全校同学紧急会議，决定联絡中西女中、普育女中、貞淑高等女校籌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以推动斗爭。

5月7日，"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組成了，会上决定电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追还青島，幷分函各省共同采取一致行动；同时派代表九人分赴直隶省教育会、省議会、天津总商会三处，要求組織天津公民大会，向群众宣傳五四运动的意义，幷举行大規模的游行示威，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5月14日，"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进行改組，正式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票选諶志篤、馬駿为正副会長。以后又由周恩来同志主編出版"学生会报"，作为进行爱国运动的思想武器，对运动起了思想領导和組織推动的作用。不久，"天津女界爱国同

志会”也于5月25日成立，公推刘清揚、李毅韜为正副会長。从这时起，广大的青年学生便在“学联会”与“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統一領导下进行了有組織的斗争，使运动向縱深方面发展。

5月12日，天津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千多人，举行追悼北大学生郭欽光烈士大会，由学联会会長諶志篤主祭，諶致哀詞后即发表了沉痛的演說，慷慨激昂地拔出刀子刺开手指，血书“学生作事，純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誘”十六字。群众見此壯举，大为感动，追悼会变成为团結群众向反动派斗争的动員会。青年学生們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与反动派継續展开了英勇不屈和百折不回的斗争。

为迫使反动政府让步，在“学联会”的統一領导下，5月23日，天津十五所中等以上学校約有一万多学生举行了罢課，发出宣言、通电和分散傳单，指出軍閥政府对內鎮压、对外投降、断送东北矿产、森林和山东特权等等罪行；并向当时的总統提出六項条件，表示如不获准，决不复課。

“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使运动扩展深入，爭取輿論的同情和广大群众的参加支持，組織了講演团，并在講演团的統一領导下，分别在各校学生中組成一講演单位，于每星期六、日往各公共娛乐場所講演，其他各日，則分赴各主要街道进行宣傳講演。他們向群众叙述青島与中国的关系，說明日本不肯归还青島并逼迫中国专使签字的情况，分析1915年二十一条件的內容和指斥軍閥的卖国罪行，借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以共御外侮，并告以御侮的办法之一是抵制日貨等等。由于学生們的热心貞誠、从早到晚不辞劳苦地反复講演宣傳，大大地感动了听講的群众，如听众中曾有一农民激于义憤，把口袋中仅有的銀圓二毛捐献給同学作为印刷費，又有一人力車工人大声呼称：“我有銅元二十枚，悉行捐助貴团，虽云于事无补，然我中华倘能人人尽力，安見被人欺侮到底，不能富强耶？”这些，一方面表明了劳动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表明了这次学生的响应行动已經不是孤立的斗争，而是取得了社会輿論的同情，人民的支援，是具有一定的群众性的。

五四运动发生后，全国各地由于痛恨日帝的无理欺凌，紛紛开展抵制日貨运动。天津学生也积极掀起了这一运动，大力地向群众进行了宣傳，做到家喻戶曉，群众都以穿洋布用日貨为可耻。小学生們把“从前所买的色碟、色笔、茶杯等种种应用物品（均指日貨）尽数搗毁，以示其抵制之决心”。南开、成美等校的青年学生將“校內所用日本器皿、物品及个人平日零用之物，凡屬日貨一律焚毁，以表抵制之坚决”。除此而外，学生一面抵制日貨，一面又在当場“售卖国貨”；許多群众也“极其踴跃”地购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以罢上日語課的实际行动向日本帝国主义抗議。

在抵制日貨运动中，工人阶級起了最大作用。当时的碼头工人曾召开全体会議，决議从今以后对日本来往船只拒絕装卸，貨棧工人也表示不給日商存儲貨物，以示誓与日本断絕經济来往，对抵制日貨起了很大的作用与影响。

由于学生反帝爱国行动的影响与推动，天津总商会也行动起来了，致电巴黎专使和总統力爭青島。“学联会”并为进一步地聚集力量，特派諶志篤、馬駿、于兰渚（方舟）等五人到商会动員其共同抵制日貨。5月28日商会公布提倡国貨办法七条，对抵制日貨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天津的爱国反帝运动是与全国各地的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运动发生后，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即赴京了解情况，清华学校代表亦来津演講，介紹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5月11日，“天津中等以上各校学生推举代表四人……联袂晋京，探聞系在北大会集，俟各省学生代表到齐后即开学界联合会，以资研究力爭青島之办法”。同日，北京学生代表二十七人来津，召开京津学生联合会議，由北京代表报告北京学运情况，并介紹平民教育和講演团用文字語言宣傳、提倡眞正民气的办法，最后要求京津学生在对內对外方面采取一致行动。这些都給天津方面的活动以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与此同时，天津也派出代表到各地联系，5月11日天津代表与北京代表同赴上海联合各界一致行动，并挽留北大校長蔡元培。5月28日，京、津学生联合致电各处，倡議共組“中国学生联合会”，并建議設总会于上海，以便統一領导全国学运。5月29日，天津学生即推派代表赴滬磋商进行。在此以前，并派代表赴山东、山西等地，介紹天津运动的情况，要求采取一致行动。由于各地学生的团結一致，使运动获得了进一步的胜利。

和广大人民持相反态度的是反动卖国政府采取对外投降、对內鎮压的方針。当天津的运动还未开展时，伪直隶省長曹銳即令教育厅長、警务处長

"暗自留心防范"，将运动"无形消弭"。5月7日伪直隶教育厅密令各校，严防学生举行"五七"紀念会，警务处長張韻樵还发布了临时戒严令。然而各校学生們不顾反动政府的鎮压，仍在本校举行了"五七"紀念会，水产、北洋等校还議决了抵制日貨的办法。学生們的毅然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惊慌失措。他們命令高等工业学校、直隶第一师范学校和北洋大学等校校長，极力阻止学生集会和参加校外运动。但是，爱国的青年学生冲破了这些防范和压抑，推动爱国的浪潮继續高涨，粉碎了反动派"无形消弭"的企图。

学生講演团的活跃，抵制日貨运动的深入，特别是5月23日的罢課以及学生有組織的进行宣傳活动，更加引起反动派的惊慌，他們一面下令取締学生的講演，凡"遇有演說团一律劝阻，倘有違抗不服者，即以違警拘案詳办"；另方面又加派巡警沿街进行干涉鎮压。"学联会"于5月28日召开全体会議，討論对策，决定"仍照常进行，所有一切举动概持机健态度，以达坚持之目的……当局无論如何取締，我輩必須毅力进行之"。并为防止奸人冒充破坏，特别加强了組織，每天"每人出发时必須佩帶徽章，並以講演科图記，虽如此严密，倘恐奸人沾迹其中，每日复由总团長发給口号于各校团長，此种口号須于出发时各团員始得聞悉……"。經过周密部署后，每天"出发講演者較往日为多，而秩序亦較往日为佳，虽經巡警干涉，但学生皆以好言相对，故彼等亦无冲突。……"学生們巧妙地用了說服警察的方法，避免干涉。同时由于运动的正义性，使得下层軍警也在群众广泛斗争的形势下，不敢公然地正面干涉，以致統治阶級处心积虑的干涉也就失却了他們預期的作用。

但是，反动的統治阶級是不甘心他們干涉鎮压的失败的。他們根据过去的失敗經驗，又"筹議对付制止学生罢課、游行、演說之办法，其第一步拟先用正式公文剀切告誡，如果告誡无效，即就其罢課时間将計就計为之提前放假，以作为第二步之手續"。而学生的回答是"即放假亦不散去"。这个提前放假分裂学生团結的阴謀，就象他們以前所用过的一切阴謀一样归于无效。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帝国主义及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邏輯就是："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

二

"六三"以后，由于无产阶級参加了战斗，使斗争突破了青年学生、知識分子的狭小范围，而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內工、学、商各界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工人的罢工斗爭首先从上海开始，仅从6月5日至11日短短的一星期以內，参加罢工的有日商紗厂、鉄路等五十多个单位六、七万工人。接着，京奉路的唐山工人三千余人和京汉路的長辛店工人也开始罢工。其后商人也罢市了。这个伟大的群众性斗爭，很快地影响到全国各地。

6月5日，上海工人阶級罢工声援北京于6月3日被捕的大批罢課講演的学生的消息傳到天津后，"学联会"即于当日上午十时，召集了各校学生一千余人，在南开广場召开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发表誓言：（一）誓保国土；（二）誓雪国耻；（三）誓挽国权；（四）誓除国賊；（五）誓共安危；（六）誓共終始。同时致电北京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电滬声援。会后进行示威游行，反动派企图制止学生游行，派大批軍警荷枪实彈，上了刺刀，把南开学校围住。紳商界代表見此情况表現了动搖，提議派代表往見省長，但学生們則表示"无論有何危险，誓必出发"。軍警阻止游行队伍出发，学生与之理論不听，群情激憤，决定"冲路而行，虽有白刃当前，亦在所不顧"。最后冲开一条出路，出发游行，沿途講演，散发傳单，并轉赴省署，推派馬駿、諶志篤等五位代表向省長提出三項要求，要求內容包括准許学生講演，請电京释放被捕学生，并爭回青島，取消二十一条，准开公民大会等。

反动政府見运动日益扩大，感到惊恐，当天下午警察厅長張汝桐发出布告，严禁学生游行講演，并威胁游行群众："……嗣后如再有游行演說散布傳单及各种图书情事，无論何人，本厅一律禁止，其不服制止者，即依法严办，决不寬容。"当晚曹銳又令警察厅長派出警察队，将"所有中等以上业經罢課之各学校，每校門首派警察二十名守卫巡視，并在各該校校門首，高搭帐棚，以便該警察駐防，无論何时，不准学生等自由出入"。6日，北洋大学、官立中学、法政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南开学校等校悉为警察包围，断絕出入。在"南开学校門前已搭帐棚五座，其旁則排列枪架"。反动派越来越殘酷的鎮压并沒吓倒英勇的爱国青年，"学联会"連續于6月6日、7日召集各代表开会，决定講演团照旧出发。8日早晨，南开、官立中学、成美中学等校学生躲开了警察的监視，外出講演，并互通声息，下午一

时講演团分布于各馬路，高标旗帜，分团講演，学生人数越聚越多，由指揮司令召集各生結队游行，至总商会，推派代表动員商会罢市响应。游行队伍又轉赴省公署請愿，进行坚决的斗争，迫使曹銳答应了下列要求：（一）准許自由講演；（二）成立宣講所；（三）不用警察"保护"；（四）6月9日在河北公园召开公民大会。爱国群众的斗争获得了又一次重大的胜利。

"学联会"为了动員更多的人民参加斗爭，于6月9日在河北公园召集天津各界公民大会，到会市民二万多人，"学联会"正副会長諶志篤、馬駿在大会上說明我国外交尙未胜利，卖国賊还未懲办，号召大家团結起来共同斗爭。群众爱国热情极为高涨，高呼："共救国难"、"不当亡国奴"、"还我山东"等口号。大会主席講演完以后，紧接着由講演团的男女同学，分别向群众作爱国宣傳。講演时馬駿、邓穎超、刘清揚三同志起了很大作用，他們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前后經过情形，以及反动政府如何卖国投降，要救国只有大家团結行动起来，迫使反动政府拒簽和約，抵制日貨；邓、刘并就八小时工作制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向大家宣傳，获得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深深地受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有一小商販当时即登台表示，今后誓不卖日貨，并将头上所戴日本草帽摘下毁掉。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跑上講台，用小刀划破手指，血书"睡獅已醒"四字，群众非常感动，高呼"誓死救国"。

大会再一次致电北京，限以时日懲办卖国賊，并电告上海等地，希望一致行动。会后进行示威游行。

通过这次大会的教育，群众的爱国觉悟普遍提高，加深了对日帝和軍閥政府的痛恨。

学联的領导人在实际斗爭的过程中，認識到在与反动政府作斗爭时，必須团結能够团結的一切力量参加运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力量，孤立敌人。因之，他們几經与商会磋商，动員他們罢市。尽管商人对罢市有顾虑，犹豫不决，但在爱国人民的感召下，商会終于在召开公民大会的当天下午召集全体董事举行紧急会議，研究罢市問題，到有全体商会董事和各行业代表六百余人，馬駿等七人从大会上抽身来列席旁听。会議决定电請北京政府懲办卖国賊，保护爱国学生，限两日內答复，否则实行罢市。馬駿听完后，即刻发言称：目前正是紧要关头，应即罢市，如商会不同意，即到公民大会上征求群众意見。說完后，馬駿赶到公民大会会場說明商会开会情况，群众表示，商会如不能决定即日罢市，当群赴商会要求。馬駿将群众意見，轉告总商会，至此商会才最后决定，从10日起全体罢市。于是运动基本上已經在全天津市范围內掀起来了。

反动的北京政府获得津市罢市消息后，为緩和众憤，不得不在当天下午，致电曹銳謂总統已准曹汝霖等辞职。总商会副会長卞月庭在董事会上轉达这个电报后，即有某些董事指出电文的敷衍性质，并表示不承認；同时，商人們也已觉察到工人們有罢工的趋势，如果工人阶級眞的罢工了，对資本家来說也是不利的。所以他們当即急电北京謂："……查棲息于津埠劳动者数十万人，現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牽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請急明令懲办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以謝国人而救目前！……"这些資本家以工人阶級的所謂"不稳"情况，暗示統治阶級应作某些虛假让步，实质上反映了資产阶級在这次反帝爱国运动的紧要关头中为了其阶級利益而显露了自己的妥协要求。反动政府本来在全国的反抗形势下已感难以应付，現在近在咫尺的天津又已罢市，而且工人阶級还有"不稳"的情况，更加使它感到惊慌狼狽，于是即召开国会緊急会議，星夜派国务院参議曾毓雋来津，由曹銳陪同到总商会，宣讀总統免去曹、章、陆等卖国賊本兼各职的命令，并假作同情似地向商人說些安慰好听的話，要求商会明天开市。在这紧要关头，資本家妥协投降了，他們背弃了共同通过的决議，准备在11日开市。資产阶級妥协投降的消息很快地傳遍了全市。翌晨，学生和公民群众万余人聚集商会門前，由馬駿代表进入商会質問："……要求目的还沒有达到，以此情形，商界为何罢市，为何开市，自相矛盾，恐各位也无以自解。鄙人奔走呼号，原为救国，肯以此青年宝貴的光阴及一切生命全欲犧牲，而商界区区罢市还不肯本諸良心去做，国民資格何在？前日鄙人到貴会来，就有一位会董問鄙人何籍，天津有无財产。鄙人本吉林人，天津固无財产，知某君之意不过是譏諷的話，然鄙人尙有生命热血可流于諸君面前，以激諸君良心之发現。国势如此，唯有一死以謝同胞！"說完后，馬駿毅然地以头向商会里面的大明柱撞去，拟以身殉国，这时幸得商会秘书長夏琴西在側，猛将他拖住，生命才得保全。馬駿这样視死如归的大无

畏精神和商会門前的群众声势，迫使那些資本家們不得不决議次日（12日）再度罢市，与学生采取一致的行动，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天津的罢市，特别是工人阶級有罢工的趋势，迫使反动政府不得不让步，同日，国务院发往各省电报中，对学生爱国行动予以承认，并表示愿加以保护。“此次各校学生，激于爱国热誠，不得已而有罢課請愿之举，固为国人共諒，現在政府开誠披示，准按輿情，力維大局。……国家注重教育，自当加意保护。”由于工人阶級行动起来，也仅仅是这样，才使斗爭获得胜利。目的既初步达到，紳、商、学、报各界代表公决从14日起开市，照常营业。

在罢市斗爭中，天津警察均改为武装値崗，保安队警到处巡查，企图以此鎮压恐吓人民。“学联会”恐有坏人乘机扰乱，并为預防警厅从中破坏，即組織了学生的糾察組織負責維持秩序，使反动軍警无从借口。学生在执行任务时，一律着操衣，紮裹腿，精神煥发地在各馬路游行視察，或贩卖国貨。并为各校加强联系，互通消息，組織了自行車队，每日分赴各馬路、各会所，窺探消息，轉达情况。

一个多月来，天津各阶层人民在“学联会”推动下和工人阶級的参加影响下，进行了共同的斗爭，获得了不少的战果，爱国情緒和覚悟都有所提高。为了更好地将各界人民团結起来和反动派斗爭，在“学联会”的奔走联絡和动員下，又进一步于6月18日組成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参加的单位极其普遍，包括工人、学生、妇女、教育界、工商界、士紳、宗教界等三十多个团体，一百七十多个单位。

“天津各界联合会”的成立，在全国范围来說，是一个創举，接着上海各地也先后成立。从这也可看出，各地的斗爭是紧密联系、互相支援、互相影响的，从而使运动具有全民性。

侭管斗爭得到了初步的胜利，卖国賊曹、章、陆已免职了，但政府如何懲办卖国賊，却只字未提，山东問題也还悬而未决，拒簽和約还在妥协动搖，这一系列的問題說明了斗爭还有待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学联总会”（6月16日成立于上海）在6月26日发表了外爭国权、内除国賊的宣言。27日召开全国学生大会，通过决議三項：

（一）致电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簽和約；

（二）通电各省，要求立即废止中日一切密約；

（三）不承认卖国政府，取消新国会。

“天津学联会”在“全国学联会”的号召下，决定推派代表十人赴京，会同京、魯（山东）学生，向总統徐世昌請愿，要求总統拒簽和約，宣布高徐济順鉄路借款眞象，懲办卖国賊。然而徐世昌拒不接見，最后由于学生大队与代表們在新华門前坚持两天，迫使徐世昌不得不接見，京津代表向徐痛陈利害，并告以全国人民坚持反对“和約”的态度。这才迫使北京政府急电巴黎和会我国代表拒簽和約。

人民的胜利——拒簽和約，使日帝恼怒万分，暗示其走狗“安福系”加强对人民的鎮压。“安福系”爪牙济南鎮守使馬良，首先向人民开刀，宣布山东全省戒严，自任戒严总司令，对爱国运动严厉制止，甚至还下令枪杀学生領袖馬云亭等三人，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憤怒。8月23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为抗議馬良罪行，公推郭隆眞、張若名等十人和山东省代表进京，会同北京学生代表瞿秋白等共二十五人，二次向总統徐世昌請愿，要求解除山东省戒严，懲办馬良。但徐世昌不但不接見，还逮捕全部代表；24日又有代表往新华門求見，仍不得見，并被警察围困于門內，断絕飲食，第二天又全部被捕。

代表先后被捕的消息傳到天津，群情憤怒，表示不管反动派如何鎮压，仍需坚持斗爭到底，决定再派第三、四、五批代表，直到最后胜利为止。26日，即約集同学五、六百人，改換装束，由馬駿率領，分批进京。周恩来同志也一同赴京，参与了領导和策划工作。从26日到28日，京津等地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門，与反动政府进行斗爭。28日，学生分队向新华門、西华門、福华門請愿；反动政府的軍警当局把全体学生包围起来，压进天安門內，进行野蛮的鎮压，逮捕了馬駿等学生代表，驅散了請愿队伍。

反动政府的殘酷鎮压，激起了全国　論的不滿，紛紛致电質問，同时部分軍警亦为学生英勇的精神所感动，轉而同情学生。处此情况下，徐世昌、段祺瑞大为惶恐，“始托調人保释，借端释放”。8月30日，全体被捕代表再一次胜利地出獄了。

在整个爱国运动中，同学們除了参加游行、請愿向反动派作面对面的斗爭外，还配合运动开展了

宣傳鼓动工作，他們用講演和文字宣傳，揭露反动派对外投降卖国、对內殘酷鎮压人民的罪行，以此爭得社会輿論的同情，提高人民的觉悟，团結了更多的人民投入斗爭，同时团結了广大的人民抵制日貨，提倡国貨，使运动广泛深入。

如果說学生們在前一阶段的講演获得不少成績的話，那么“六三”以后的講演，在講演長邓頴超同志的領导下，所获得的成績更大。每天派出講演的人数比前为多，組織比前完善，每“五人为一組，每組有組長一人，五組为一队，举队長一人”；同时講演內容也比以前丰富多彩，除継續揭发軍閥卖国、抵制日貨、爭还青島外，还增添了“民德、民智、民則、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等普通知識，……旣获人民的欢迎，并免警察的干涉”。随着反动政府鎭压的日益殘酷，斗爭是越来越尖銳化。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民参加斗爭，講演便不能局限在城里，而須扩展深入到广大的农村去，除寒假中归家的同学担任当然的演講員外，“学联会”講演部又決定“出发直隶各县（每县二人）演說，以期喚起国民”。工作开展得很順利，也获得了不少的成績，如直隶省立第一中学講演团出发到胜芳鎭講演，备受“人民之欢迎……居民喜形于色，紛紛約請講演者不下十余处……足見該鎭人民急于聞国事矣！”“又南开、成美中学以回籍講演各生为数无多，恐有鞭長莫及之患，昨特組織本校游行講演团，分往各县村鎭講演，俾咸知此次外交經过之眞相，以期輸入共爱国思想，聞該团每团仍定为十人，已于十一日出发，由本埠西头湾，登舟先赴寿县、滄县、静海、大城等处，随地演說”。又南开学校講演科派“王君在丰、时君宗智等十余人乘船至大营庄講演，頗受該处人民欢迎，并聞該处人民頗有击楫中流，誓雪国耻之概”。

反动派对学生的宣傳講演极为惱怒，先严令禁止，无效；継而誣蔑学生为“无賴”，仍无效；最后甚而卑鄙地造謠說：“此次爱国运动原为自私自利起見，否則何以每人每月有七元之津貼。”但是这样的謠言在勞苦奔波、坚忍不拔的爱国学生面前和在广大人民的同情下是不攻自破的，造謠者只有更加显出自己卑鄙的面目而已。

“五四”爱国运动开展以后，各校为扩大宣傳，曾先后創办报刊，如周恩来同志主編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学生日报”、許广平主編的“女师周刊”，其它尙有“北洋大学日刊”、“醒世周刊”、“师范日刊”、“南开日刊”和京津合編的“民鉢报”等。各校发刊的宗旨大都是“要喚醒一般平民，輸入一种国家思想，在人人的腦海中打破他从前一切的頑固腦筋……”；“是議論机关……本民主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張，……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的解释下公允正确的批評，介紹現在最新的思潮”。各校报刊的发行，在宣傳鼓动、揭发反动派的卖国罪行、介紹科学知識等等方面，对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同时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介紹苏联的文章，如8月20日“南开日报”发表了“布尔扎維司目同布尔扎維克”，这些对新思潮运动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尤其是周恩来同志主編的报刊更对运动起了思想領导的作用。但由于各校独自經营，在互相配合和統一步調方面难免存在着缺点，并因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进行了“学生报界联合会”筹組工作，8月9日，“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成立，其宗旨为：“本会以联絡感情，交換意見，造成强有力之言論，以指导社会，監督政府及会外各言論机关为宗旨。”成立后曾先后召开几次会議，周恩来同志代表联合会出席，报告北京二次請愿代表被捕消息（即8月23日京津联合請愿一事）以及建議如何对待警厅的鎭压，获得会議的注意。会議通过了对待警厅的办法应“監督其行为，并揭破其黑幕”。此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領导下，又在9月20日成立了“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在于兰渚的領导下成立了“新生社”，它們对提高同学們的觉悟和傳播新思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学生們在与反动派作斗爭时的宣傳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加强，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具体領导了这項有重大思想教育作用的工作后，使同学們不仅团結了自己，而且还以此武装教育了群众，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爱国觉悟，团結了各阶层人民参加这全民性的斗爭。

在軍閥政府的統治下，勞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被剝夺了，因而文盲很多，社会风气閉塞，对国內外大事知道得很少，新知識尤其缺乏。要动員群众参加斗爭，必先使他們明了斗爭的目的意义。針对这种情况，“学联会”对平民教育頗为注意，領导同学在校內創办識字班，以注音字母为入門課程，同学不仅义务教学，且无代价地供应学什用品，群众报名入学的很多。在教师認眞教、学生用心听的情

况下，群众的学习情緒很高，获得了很好的成績。出发講演的同学們，除講演外，并自带黑板、粉笔，在固定地点露天教群众唸书識字。我們还可以从当时“益世报”报导的消息中看出“学联会”对平民教育的重視。“天津男女学生，近頗尽力于平民教育及文化运动，設立各种义务学校。平日，学校使一般人識字知书，复組織平民杂志社，发行平民杂志，使識字之人得借文字之力以增長其知識，慘淡經营，已历两月；每半月发行一册，宗旨分五项：（一）輔助平民教育；（二）灌助新潮；（三）改造环境；（四）主張平民政治；（五）增进平民爱国思想，且努力改造社会并解放一切束縛。其內容取兼收及公开之态度，議論多注重实行，不务空談……。”

在宣傳工作方面，除口講笔写之外，还利用艺术形式如話剧等进行宣傳，曾上演过描写安南的“亡国慘”和日帝虐待朝鮮情况的“救国鏡”，南开学校还演出过“一元錢”、“一念差”等剧，由于內容新頴，配合时事，备受群众欢迎，对宣傳鼓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还利用了歌曲的形式，如广东旅津学生再版了“国耻勿忘”，其中的强国歌和爱国歌，揭发了日帝的侵略野心和自强御侮的办法。这些小歌調，适合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群众喜聞乐見的，所以起了不小的作用。

学生們在进行宣傳講演中所碰到的最大困难是經济問題，如創办报刊，每期仅卖銅板一枚，亏本很多。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問題，除接受热心的社会人士乐捐帮助外，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动手开辟經济来源，特别是女同学們做得更为出色，中西女校和女师附小等校学生均亲手制作工艺品售款捐助“学联会”的活动。他如育才学校和商界的演剧收入也統归“学联会”支配。

随着爱国运动的深入，全国各地的抵制日貨运动也风起云涌，給日帝以沉重的打击。天津由于开埠早，又是近海城市，因之日貨充斥市場，故抵制日貨运动在天津来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行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联会”等都重視到这一点，也把这个問題緊緊抓住。其中如“女界爱国同志会”即于6月22日开会时指出抵制日貨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应以女子为首倡的建議。但又鉴于资产阶級的唯利是图，要将这个工作搞深搞透确非容易，除同学們的努力外，最主要的还是要發动群众，把广大的店員工人和劳动人民团結起来共同投入斗争。因此“各界联合会”即在6月24日成立了“抵制日貨委員会”，下設“日貨調查委員会”、“国貨調查会”等，具体領导和推动这一工作。当时的店員工人曾是运动中的积极力量，他們协助两会順利地进行抵制日貨工作，同时两会又根据需要每天派調查員分班分組到各商店調查現存日貨，列表登記說明，以后随銷随报，不得隐匿，已定的日貨速向日商退約，未来的不准再訂。当时“各界联合会”曾为此事发布通告，希望各商号自7月15日以后，不得再行买卖日貨，否則“視为公敌，即有相当之处置”。另方面，为提倡国貨，在“国貨調査会”領导下，把国貨編刊成册，注明厂地和名称、厂名，分贈群众或在报刊上发表，“以俾国貨之銷路易广”，而“购国貨者不致有誤認之弊”。

开始各商号在爱国运动感召下和群众压力下，还能遵守决定，但以后就不断发生破坏事情，有的匿而不报或报而不实，甚至有的別立后賬，私自勾結通融，暗行买卖。资产阶級这种破坏运动的卑鄙行为經常为职工們所揭发，引起了冲突。“各界联合会”除对商人进行批評教育外，还采取其他方式，劝說这些資本家要一本良心地抵制日貨。另外还有鋤奸团的組織，到各奸商鋪戶，曉以大义，警告勿再买卖、訂购日貨，奸商們懾于群众威力，表示愿遵守公約。此外，也有个別商人曾創办“救国十人团”，制訂公約提倡国貨，不买日貨，提倡儲蓄等等。所有这些活动，对于推动抵制日貨运动都有一定的功效。

但是終究还有部分奸商冥頑不灵，依然勾結日帝进行买卖，如“竹竿巷万德成东洋庄，日来屡次运日貨进門，并聞已經获利六十万余元之巨”。而商会对此不甚注意，因而激起学生們的公憤，故“学联会”于7月15日在南开学校开会，集合学生百余人，出发赴該鋪理論，并加以一定的懲处。这样就有力地警告了其他偷售日貨的商戶，也不敢再繼續售卖日貨了。

抵制日貨，提倡国貨的开展，給日帝以沉重的打击，使它的商品輸入减少，“自抵制日貨之声浪愈高，日貨之銷路愈狹，全国日貨几完全停滞”。日帝为想弥补损失，竟使出了卑鄙欺騙的伎倆，以其商品假冒“中国貨若干，运至中国……胡某至河北买胰子数块，外面只写中华国貨，究为何地、何厂所制，俱未标明，且所用裹胰紙，俱系某国（日本）貨……”。但这种伎倆也在爱国群众警惕下破

产了。日貨在城市受到打击后，就想轉移到农村，可是日商一在农村活动，即遭到农民的反对，如当时靜海县农民董国孙致总商会函中称："昨日有日人来敝处，偏街戶貼仁丹广告，今日又在街上施送仁丹。想因京、津抵制日貨之故，遂赴乡鎮間大施其活动手段。恐不只敝处为然，他省他处亦当如是也。……貴会又为商务之要枢，人民生計所关，于京、津間能胜任，而于乡鎮亦当設法挽救也，……恳請貴会轉咨各省商会，并飭所属各县商会，令其通飭乡鎮商会，同时进行。"

以上的情况，說明了日貨在这全民性抵制下，在城市和乡村都无它們的立足之地。由此可見，当时天津的抵制日貨运动，已是相当广泛和普遍的了。由五四运动激起的抵制日貨的爱国运动，經过七月的高潮以后，就将运动引向持久的經常性运动，天津的爱国群众把爱国运动継續堅持下去，并根据形势的发展掀起一次新的高潮。

三

継抵制日貨运动以后，天津的爱国群众又酝釀着一次新的爱国高潮。"天津各界联合会"在一次会議上曾一致通过一項决議，准备利用"双十节"举行示威游行，发动一次大規模的、群众性的爱国宣傳，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喚醒民众的覚悟，号召反对軍閥統治者的卖国外交、抵制日貨和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的山东請愿学生等等。

經过一番的筹备，"双十节"那天，庆祝大会胜利地召开了，各阶层数万人齐集在南开广場，高举着各色标語。会后正当群众队伍准备出发游行之际，反动的警厅，在日本駐津領事的恫吓与指使下，突然派出警察与保安队包圍了会場，以青年男女学生为主体的游行队伍与軍警展开了机智的斗爭，尤其是女学生表現得更机智勇敢。她們排在队伍最前列，以手中仅有的尖竹竿和軍警的枪托相对抗，隨后男同学也奋勇冲上。正好此际开来"学生联合会"的宣傳汽車，里外夹攻，冲开一个缺口，憤怒的人們，奋不顧身地一涌而出，突破了軍警的包围。学生在搏斗中被毆打刺伤的有二十来人。

警厅的无理阻挠及軍警的蛮横毒毆，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怒火，于是游行大队就奔赴东浮桥，包围了警厅，提出質問。同时講演队在附近四处展开了爱国宣傳。奸猾的警厅厅長楊以德避而不見，于是代表又轉向省公署請愿，亦无实效。

13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联合发表了由周恩来同志用白話文撰写的"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罢課宣言书"，备陈"双十节"游行时警厅无理痛毆学生、阻挠游行的罪恶，呼吁各界民众团結一致，群策群力，共同反抗警厅的野蛮行为，并决定罢課四天表示抗議。

罢課期間，学生組織講演队，四出展开宣傳。16日"女界爱国同志会"、"学生联合会"又发布文告，严斥楊以德的无理攻击学运、忤逆民意与民众为敌的罪行，要求政府罢黜。由于抗議目的未达到，又决定罢課延續二天。此时正在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天津代表团馬駿、刘清揚等聞訊，为爭取更广泛的声援，把天津反动警厅的罪恶同时在上海公諸公众，发表了"天津代表敬告各团体书"，痛斥反动派迫害爱国学生运动的罪行，希望获得广泛的声援共同携手进行。

天津学生的罢課一直堅持21日，获得各界輿論的同情，反动省署也不得不答应作一定的让步，声言要免楊以德职，"学联会"才又发表了"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終止停課宣言书"，恢复上課；但同时表示仍不放弃今后的継續斗爭。

"双十节"风潮才略平息，11月間福州又发生了因抵制日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公然开枪杀害市民及警察的慘案。消息傳到天津，人民异常激憤。同时，又从巴黎和会傳来日本帝国主义向"和会"提出关于山东問題由中日两国交涉的新阴謀，竟得到"和会"的"允許"，而且由亲日派"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亦将应充，因之更引起各界的无比憤慨。全市再次卷起了抗議日帝侵略、抵制日貨的风潮。对于山东問題，在11月13日即有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及"学生联合会"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在巴黎的王正廷、顧維鈞两专使，以及各地的联合会、学联会，吁請各阶层对于日帝的新阴謀应予严斥和坚决的反对。閩案噩耗傳来后，更是群情激憤，24日下午四时，各校学生一千多人齐集在青年会，全体出发游行、講演，沿路分散傳单，并推出代表到省公署要求省長致电政府外交部，"向日本交涉，以保国权而維民命"。27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又致电大总統、国务院、外交部，要求对日抗議。

同时，为了更全面彻底地喚起民众，共同抵制日貨，12月13日"各界联合会"开会，在馬駿的由滬来函倡議下，仿照上海联合会的成例，通过抵制日

貨的办法四項，即：（一）不买日貨；（二）各鋪商所有之日貨尽皆燒毁；（三）調查各商号，如有匿藏日貨者，严重处罰；（四）通知各县商会一体照办。会上并发出公函，邀請各界派出代表筹組国民大会，共救时艰。因为抵制日貨与商家关系密切，为了团結和說服商戶积极支持，"学生联合会"特派周恩来同志等到总商会与会長商談，終于取得一致的意見。到19日，講演会成立，調查团四出調查講演，印发敬告商家傳单二十万張，劝告各商家速将日貨一律封存。此时各校宣布在召开国民大会时，停課一天；商会即宣布休息半天，表示支持。

12月20日，第一次国民大会在南开广場召开了，到会者万余人。大会設講台三座，各团体代表分别在三座講台上作沉痛悲憤的演說，会上还朗讀了国民大会的宣言书，最后在群众激昂声中，一致通过焚燒因私自違法售卖而被没收的日貨，傾刻間火焰冲天，堆积如丘的两堆日貨立即付之一炬。人們莫不鼓掌称快，振臂高呼："坚决抵制日貨"、"收回青島"等口号。会后即出发游行，沿途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这一次的爱国示威大会，在天津各阶层民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激发了人們的爱国热情，提高了群众的認識，从而使天津的爱国运动更推向高潮。在这一影响之下，不久，"国民大会筹备会"（是当时各界联合組織的机构）开会研究了抵制日貨办法；同时各行业会議对抵制日貨办法也作进一步的修訂，通过了共同遵守的三大原則：

（一）运到已經起封的劣貨（即人們对日貨的蔑称），应将貨物的种类和数目报告委員会，由商学两界会同查明批准后，始得在市上銷售。

（二）运到尚未起貨的劣貨，应封存不准出售。

（三）已訂尚未运来的劣貨，应去信退返。

商界执行这三項原則的爱国行动，收到不少效果，引起了国內外的重視。

第一次国民大会示威游行和焚燒日貨以后，抵制日貨的行动更加扩大，以学生团为主所組成的检查团益为活跃。当时反动政府想提前在1920年1月放寒假，企图借此分散学生的团結力量，但未能达到目的，这使反动統治者和一小部分奸商怀恨在心。同时由于全国大力抵制日貨使日本的經济侵略受到沉重打击，因之在1919年10日間，日帝駐津总領事就因各行商訂立抵制日貨条例而致函省公署无理干涉，强横粗暴地要求"飭各該行团体或报紙其他妥善方法，声明銷废此种排日条規，……"；后来并又揚言要調軍队"自卫"等等，借此恫吓、要挾无能的軍閥統治者。一貫卖国求荣的反动官僚們对此惶恐万分，怕得罪了主子，动摇自己的統治地位，不惜瘋狂地与民为敌，对爱国运动和热爱祖国的志士加以殘酷的摧殘。

1920年1月23日，"学生联合会"調查委員段鴻蔭根据报告，率人到东門內魁发成洋貨庄查出未經呈报的日貨灯罩十七簍，遵照規章运至"学生联合会"，准备报請"国民大会委員会"处理，这时突然来了三名日人，把段痛打一頓，搶去检查証。委員会聞訊后，有学生多人赶到，日人已走，学生們遂将魁发成的裴某带到"国民大会委員会"，准备由大会詢問究竟。第二天早晨，伪警察保安队总队長带領武裝保安队多人到委員会，蛮不講理地用皮鞭打散人群，帶走裴某。事后警察又拳脚相加毒毆到警厅花园探詢情况的学生，并无理逮捕同学六人以及到省署請愿的学商各界代表馬駿等十五位代表。25日，反动政府把"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一律查封，并出告示宣称："救国十人团"、"国民大会"、"各界联合会"、"学联会"等为"未呈請令准有案，即属違法，一律解散取消"，严禁人民"私行集会結社，屋外集合，或粘貼图画以及言語形容有扰害誘惑煽动之作用者"，否則将"一律依法究办，决不姑息"。同时还出布告指責和誣蔑学生检查团是"私翻商鋪，侮辱商人"，禁止再行检查日貨。

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及其毒辣手段，阻遏不住人民群众怒涌的爱国热潮。在1月27日，五千多市民秘密地集合到南开广場，举行了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沿街高呼口号，散发傳单，发表文告，历陈外交失敗、丧权辱国之可耻，痛斥政府之卖国无能，申訴人民的爱国热忱，并极力主張山东問题拒絕直接交涉；催办福州交涉。学生界即坚决抱定"虽因检查日貨問题被警察厅封禁（指"学生联合会"），开会言論，已失自由，困苦顚連，达于极点，惟一息尚存，誓抱初志，力謀进行。……"

1月29日，宣傳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人們爱国热情更为洋溢，在周恩来同志的策划与領导之下，为营救被捕代表，与反动政府坚决斗爭，一千多学生举行了反抗大运动，发表宣言，四出講演，散发

傳单，最后齐赴省公署請愿，要求：（一）請省長代电中央，駁回日本通牒；（二）拒絕青島直接交涉，催办福建交涉，取消中日軍事协約；（三）請省長恢复天津学联会原状；（四）释放被拘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省長避不接見，当时由門坎下鑽进省署的四代表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眞、張若名等又被捕，在門外等待訊息的学生队伍被卫队、馬队用刺刀、枪托冲刺毆打驅散，演成有名的天津“九一念九”慘案（即民国9年1月29日慘案），流血受重伤者六十余人。

30日，直隶省督軍曹錕、省長曹銳发出布告，居然无耻地对学界爱国运动肆意攻击、誣蔑，說学生是“侵扰商业，違背約章（按指不平等条約）……殊属目无法紀”，要求軍警“严加取締”。在同一天，反动的北京軍閥政府国务院、內务部、陆軍部、教育部也竟联名致电河北省長，要求对爱国运动采取戒严措施，主張对“学生非法举动不受劝戒，应予法律制止”；“国家对学生……斷不可姑息养患，致釀不可收拾之局。如为維持秩序，势非戒严不可，屆时应即就近参酌情形，依法宣布，行使戒严职权”。

在反动軍警的高压政策摧残下，爱国运动的領袖及中坚分子大部被捕入狱，进步組織被封禁解散，熾烈的爱国热潮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工作的开展越加困难。爱国青年一方面轉入秘密的活动，整頓队伍；另方面即派人北上南下，争取外援，扩大影响，坚持斗爭的意志仍非常旺盛。首先“学生联合会”会長諶志篤在1月31日，約集了各校代表秘密开会，重新改組“学生联合会”，推选临时負責人，坚持每天照常办公。女界同志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也都召开了緊急会議，商議对策。省一师范、官立中学、法政学校等学生即一律自2月1日起罢課表示抗議。其次，“国民大会委員会”卞月庭、諶志篤等五人上北京，联合“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共同向总統府請愿；“觉悟社”連夜开会，商討营救被捕代表，除全体投入斗爭外，还决定派刘清揚化装南下，先到南京，継到上海，取得“南京学生联合会”以及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热情声援。两处都召集了万人以上的大会声討反动政权对爱国运动的无理破坏，和对爱国志士的野蛮迫害，“全国学联”并通电全国声援。全国各阶层的同情与援助，使天津各界爱国人士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更加信心百倍地展开了斗爭。

另方面，被捕入狱的代表，激于爱国义憤及对反动派的痛恨，虽然被押拘留所，却毫不气餒或妥协，彼此团結一致，互助友爱，发揚了高度的革命乐观精神和不屈的斗爭意志。他們身在拘留所，却“爱国不忘求学”，仍坚持学习，周恩来同志还在狱中編述了后来由民意报社刊行的“警厅拘留記”；同时仍坚决为爭取恢复自由而斗爭。4月初旬，为要求移送司法机关起訴，早日出狱，并抗議警厅的无理拘押，还共同自4月2日起絕食三天，是为狱中“四二絕食”斗爭。

最后，經过全国人民的声援、天津各界的奔走营救以及狱中諸同志坚强忍受各种折磨的不屈斗爭，終于在4月7日，迫使反动警厅不得不把二十一位代表由警厅拘留所移送検察厅，又經拖延三个来月的所謂“偵查”，在7月1日对馬駿等被捕同志提起“公訴”。从6日起，連續开庭三天，至8日辯論終結，在17日宣告判决，对各代表分別判处徒刑和拘留、罰金等，并准将羈押日数折抵。事实上代表們的在押日数远远超过判处的刑期，这是反动派在群众的压力下为自己遮羞的一种手法而已！二十位被拘代表（有一位病重提前释放）当天即当庭释放，恢复了自由，受到“天津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及各阶层的群众盛大的欢迎和慰問。“九一念九”事件至此告一結束。以后爱国团体的一些重要領导者如周恩来、郭隆眞、刘清揚等在10月間相継出国。天津由于“五四”革命洪流所激起的波瀾壯闊的爱国运动暂告一段落，但是人民群众特别是日益壯大的工人阶級和知識青年对反动統治者和帝国主义的斗爭，几十年来却一直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 × × ×

附注：本文是参考以下資料編写成的：

“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2期），馬惠卿著：“五四运动在天津”；

天津“益世报”（1919—1920）；

“天津总商会卷宗档案”；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編：“五四运动史料彙編”（第6、7、8、9等册）；

周恩来編，天津民意报社刊行：“警厅拘留記”；

南开学校刊行：“南开日刊”（1919年）；

觉悟社刊行：“觉悟”（1919年）；

刘清揚同志等的回忆录。

——編写者



教学参考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

亦 明

自明成祖朱棣永乐三年（1403年）始，至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八年（1433年）止，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英雄郑和，曾先后七次率领规模浩大的艦队，訪問了"西洋"（即今南洋和印度洋一带）三十多个国家。

"七下西洋"航海规模之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从时間上看，較世界史上著名的葡萄牙人迪亚氏和热那亚人哥倫布所完成的航海事业，都早过半个世紀以上。本文拟对这一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談談自己的初步看法。

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結果是元朝統治的复灭和明封建帝国的建立。这一次轟轟烈烈的阶級斗争，和历史上所有农民革命一样，对社会生产力起着推动的作用。元末农民大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立即表現在明代初年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上。

在农业方面，明初統治者为了恢复元末被破坏的农村經济和安定农民的生活，以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实行了一系列对农民让步的措施。明政府一方面号召农民复业，规定"所垦荒田""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而且以"給資粮牛种"、"毋許兼并"①等加以保証；另方面用移民来解决土地荒蕪和劳动力缺乏的矛盾；又移徙豪民和犯罪者去开垦荒地。这些措施，再加上明初对水利兴修的重視，对农民栽种經济作物的鼓励，对灾荒的及时救济和賦粮的减免等，經过二十多年农业生产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洪武末年已呈現出"畟畟无弃土"的現象，人口亦有很快的增長。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及社会的安定，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明初把元代的匠戶改为"輪班"、"住坐"两种。"輪班""住坐"虽然还带有封建劳役制的性质，但是由于工匠除应役外，还多少有一些自己能自由支配的时間从事商品生产，这对技术的鉆研和改进就提供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明初手工业的发展，具体表現在明初的矿冶、造船、紡織及瓷器等手工业生产部門的提高上。

商业上，明初針对元代的弊政，裁并了稅課司局十分之七，规定"凡商稅三十取一，过者以違令論"②，这些措施使商业得到了正常发展。

明初商业繁荣的情况，不但反映在一些大的中心城市，"以是薪粟而下，百物皆仰給于賈属"③；而且連一些較小的地方也成为"商賈往来兴販"的要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之間是有着互为依存条件的关系的④。明初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基础上，作为工商业集散中心的三十三个大城市形成了。

所有上述情况，都表明明代初年社会經济在各方面的恢复和发展。当然还应該指出，这一切也都是由于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流血斗爭和辛勤劳动的結果。社会財富增多了，統治者的仓貯更充实了。"是时（洪武、永乐間）宇內富庶，賦入盈羡，米

---

① 参閱"續文献通考"卷二，田賦考。

② "明史"卷八一，食貨，商稅。

③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二，民利。

④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10頁。

粟自輸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紅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賑貸，然后以聞。”① “明史”卷七十七“食貨一”也記載說：“洪（武）、永（乐）、（洪）熙、宣（德）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萊蕪，人敦本业……故上下充足，軍民胥裕。”正因为明初社会矛盾的暫时緩和，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因此使統治者能“府藏衍溢”，这才有可能实現明成祖朱棣和宣宗朱瞻基統治时的各种巨大支出，包括派遣“多赍金币”的使团到四周各国“招徠”（“郑和下西洋”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项）的各种活动。正如“明史”記載的：“当是时（永乐年間），兵革初定，論靖难功臣封賞，分封諸藩，增設武卫百司，……中官造巨艦通海外諸国，大起北都宮闕，供亿轉輸，以鉅万万計，皆取給戶曹，……国用不絀。”②

同时，自宋、元以来海外貿易和漕运已有很大的发展，到明初已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知識和技术，也鍛炼出了大批能掌握这些知識技术的航海人員。

在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社会背景时，上述的社会經济情况和物質技术条件等是他实現这样伟大事业的前提条件；但若仅只从这一点来說明这一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是远远不够全面的。只有更进一步对明初社会政治經济的矛盾变化加以研究，才能正确了解“郑和下西洋”产生的必然性，从而避免把历史事件的复杂背景簡单化。下文即准备由这方面試加探討。

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和邻近各国发生了来往貿易的友好关系。唐宋时，我国船舶已經“多往安南市易”；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来貿易。到宋元时，这种貿易的范围和交换物的种类都有所扩大增加。明初，随着社会經济的恢复和发展，这种貿易更加頻繁了。

史书上就有許多有关明王朝建立初年这方面情况的記載，如“洪武三年(1370年)，瓊州海商以番貨入京，道溺死”。“六年(占城)貢使言：海寇張汝厚、林福等自称元帅，剽劫海上，国主击破之，賊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謹奉献。帝嘉之。”③

因为經营海外貿易是有利可图的，所以連明王朝的官吏也私自“遣人出海行賈”，而且成为相当普遍的現象。洪武末年已形成：“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番貨，因誘蛮夷为盗。”④到朱棣即位时已是“緣海軍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永乐二年(1404年)“时福建瀕海民私載海舡，交通外国，因而为寇’⑤。这是国內扩大国际貿易的要求。因为朱元璋一开始即采取严格的“海禁”，故海商不得不采取武装走私的办法。

其次，再看当时的亚非各国也存在通商貿易的要求。到明代时，各国的商业也有了很大的繁荣发展。略举几例說明：当时榜葛剌（在今印度半島）“其民善，富庶而淳，好为商賈……市肆咸备”⑥。苏門答剌（在今南洋群島）“此处多有番船往来，所以国中諸般番貨多有卖者，其国使金錢、錫錢”⑦。爪哇(今爪哇島)“鋪店連行为市，买卖聚集”⑧。甚至也有包买囤积的大商人。如：柯枝国（今印度半島）“土无他产，只出胡椒，人多置園圃种椒为业，每年椒熟，本处自有收椒大戶收买，置仓藏貯，待各处番商来买”⑨。在各国之間也可見到通商友好往来的情形。如：“(永乐二年九月)福建布政司奏：暹邏国通好琉球番船，漂泊海岸，已借記船物請命。上諭禮部：命各布政司，舟坏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风便导之去，豈可利其物而借之也。”⑩

可見当时出現扩大国际貿易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这时的国际貿易基本上还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运到中国来的主要是供封建統治阶級浪費的奢侈品（也有一些药品或手工业原料），但运到各国的則多为絲、瓷、金属等手工业品，且多为一般日用品，因之能广泛在各国流通使用，而且已成为日常需用和喜爱的了。如：占城（今印度支那半島）对“中国青磁盘碗等品，紵絲綾絹燒珠等物，甚爱之，則将淡金换易。”⑪又爪哇（今南洋群島之爪哇島）“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銷金紵絲、燒珠之类，則用銅錢买易。”⑫

---

① “明史”卷七八，食貨二，賦役。
②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傳。
③ “明洪武实录”卷五、卷四八四。
④ 同上，卷二三一。
⑤ “明永乐实录”卷十、卷二六。
⑥ “西洋朝貢典录”卷中，榜葛剌。
⑦ 馬欢：“瀛涯胜覽”，苏門答剌。
⑧ 費信：“星槎胜覽”，爪哇国。
⑨ 馬欢：“瀛涯胜覽”，柯枝国。
⑩ “皇明大政記”卷六。
⑪ “瀛涯胜覽”，占城国。
⑫ 同上书，爪哇国。

但是这种随着經济发展而出现的扩大国际貿易的要求，却由于明初所采取的对外关系的政治措施所阻碍着。如大家所知的"海禁"政策，就是与这种扩大海外貿易的要求极端矛盾的。

朱元璋建国时，由于明政权才建立，元的殘余势力还是威胁；同时在統一战争过程中，沿海一带反抗的豪强地主逃亡海外者很多，都"犹謀蠢动"，而"倭寇之患"自明初即已存在。为了防止內外反对者勾結，乃宣布禁止海道与外邦往来。这就是"海禁"政策。

但是，朱元璋也和历代封建統治者一样，对周围各国自認为是"天朝上国"，而把各国看作是自己的"属国"，即他所說的："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內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①因之，在改朝換代时，对各国的措施首先是"頒正朔"，即通知各国这种"藩属"关系的改变。明帝国建立后，就接連不断地派遣使臣到各国去进行这項工作。如洪武元年(1368年)派吳用等人到占城国宣布："朕主中国，天下同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諸国……今以大統曆一本……且諭王以道，能奉若天命，使占城之人安于生业，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孙。"②次年，吳用等人又被派使爪哇，对其王說："朕奉天命，已主中国，恐遐邇未聞，故专报王知之……頒去大統曆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③最明显的是洪武三年派赵秩使渤泥国，对其王說："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④既然"称藩"，建立"藩属关系，承認明王朝为"正朔所在"，就要求和前一代——元割断联系。如洪武五年："其（爪哇）王昔八达剌遣使奉金叶表，貢方物，納元授勑。"⑤即可說明。

当然，不能把这种封建的"藩属"关系和近代資本主义的殖民政策混为一談，这一点列宁早已批判过⑥。其区别即由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經济条件不同而决定的。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資本家所追求的是利潤、最大限度的利潤，因此，其殖民政策的結果必然是对殖民地人民的殘酷掠夺和奴役⑦。而在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級剝削的主要来源是对土地的占有，借以对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无情榨取。对"藩属"虽然也要求奢侈品的进貢，但主要却是政治上的"称藩，一示无外"，而形式则主要是通过友好的"貢"和"賜"，来維持政治上的宗主和藩属关系。明代初年的这种情况，可由下述事实得到說明：如永乐五年时，爪哇东、西王互相攻杀，适值明王朝使者到此，一百七十余人被无故杀死，朱棣为了保証以后使者的生命安全，要爪哇西王偿金六万贖罪。次年，西王遣使認罪，且献金万两，禮部認为不足六万之数，还要追賠，朱棣便說："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今既知过，所負金悉免之。"且"遣使齎敕諭意，賜之鈔币"⑧。由此可見，这种"藩属"关系并不是把經济掠夺放于主要地位的。

由上述可見，明初的对外关系，即：一方面不許人民私自和"外邦"接触来往，实行严格的"海禁"；另方面又要継承和各国"宗主"和"藩属"的关系。很显然，这种政治措施和前述扩大国际貿易的要求是相違背的，是极其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越来越尖銳。恩格斯指示我們說："无論在什么时候，經济的发展，总是无情的、无例外的打通自己的道路。"⑨自然，"打通自己的道路"是經济发展的客观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但却是通过人們的实踐活动来实现的。考察明初海外貿易发展中政治和經济的矛盾时，也是符合恩格斯这一正确的原理的。

首先，从国內私人海外貿易情况来看，如前所述，虽然明初即"禁民下海"，但私人海外貿易仍然存在和发展着。到洪武末年、永乐初年时，由于加紧"海禁"，商业資本只有采取武装走私，被迫反抗，因此被統治者目为"寇盜"。这对封建統治是不利的，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从明代的張燮所說可以看出，他說："濱海一带，田尽斥鹵，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視淵若陵，久成习慣。富者征貲，因得捆載归来；貧者为傭，亦博升斗自給。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輩悉健有力，不肯摔

---

① "皇明通紀"卷二，明太祖元年諭。
② 严从簡："殊域周咨录"卷七，占城国。
③ 张燮："东西洋考"卷十一，賜爪哇国王璽书。
④ "殊域周咨录"卷八，渤泥国。
⑤ 矛瑞徵："皇明象胥录"卷四，爪哇国条。
⑥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989－990頁，莫斯科中文版。
⑦ 見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第七部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⑧ "明永乐实录"卷五六、卷六〇。
⑨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9頁。

手困穷，于是所在連結为乱，潰裂以出。”①就是說，沿海一带的人，不論”貧者”（下层水手等）或“富者”（商业資本家）大多以下海經商为生，而且“久成习慣”（即已成发展趋势）。因此，如果統治者对他們限制太严，一旦完全“断其生活”时，那就必然会遭到“連結为乱”的反抗，“統治秩序”就要受严重的威胁。

其次，明帝国又希望和各国恢复傳統的关系，因此接連派使者到各国去“招徕”，这就是通过“赐”和“貢”的形式来达到的。但在这种“朝貢”关系进行的“赐”“貢”过程中，实际上是包含着两国之間相互的物物交换②，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即带有国际貿易的性質。因此，在明初严格禁止“外邦”和人民接触的“海禁”政策下，各国为了滿足向中国进行貿易的要求，除了不顧“海禁”来进行外，只有通过明王朝所許可的唯一形式——“朝貢”来达到。“明史”即記載說：“海外諸国入貢，許附載方物与中国貿易。”“番使賈人，来輒挾重貲与中国市。”③故明代即有人指出：“貨舶与貢舶一事也。”唐胄也明确指出：“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邻；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国。”④这些記載充分說明了“外邦入貢”的經济背景，即为了滿足国际貿易的要求。

但明王朝的主要目的却是通过“朝貢”来建立“藩属”关系，不是为了滿足各国的貿易要求。为此，就不惜用“免抽分”、“厚往薄来”等好处来促进这种关系的发展。但又因为害怕“外邦”和人民接触太多，故規定各种办法加以限制。如：貢使“領賞畢日，許于会同館开市三日，館行人等，照例將貨入館，两平交易。”⑤

就是說：第一、带来的貨物要在“貢賜”之后（“領賞畢日”），才許和“館行人等”“两平交易；第二，交易的地点应在明朝招待各国使者的“会同館”內；第三，交易的期限只許“开市三日”。不但如此，明王朝对已建立这种关系的国家又頒发“勘合号簿”为凭証。还要对“入貢”的期次加以限制，如朱元璋时即有：“古者中国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藩方远国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过表誠敬而已。”⑥在这种种限制之下，各国为了取得需要品，滿足貿易要求，只有“不遵（明王朝規定的）旧制”“再貢”“三貢”以至“四貢”了。甚至商人也有冒充“貢使”的，有的則直接前来沿海貿易。“（洪武二十年）时溫州民有市其（指暹羅国商人）沉香諸物者。”“今（洪武二十三年）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貨物。”⑦因此形成：“夷貨之至，各有接引之家，先將重价私相交易，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后牙人以貨报官。”⑧就充分反映了各国为了滿足貿易要求，对“朝貢”形式的貿易开始了“不合法”的活动。到洪武末年，由于明王朝加紧对“海禁”和“朝貢”的限制，就迫使各国不愿通过“朝貢”形式来进行貿易。洪武三十年(1397年)乃有“礼官以諸番久缺貢聞”⑨的严重現象，这和封建統治者“临御天下”的地位要求就发生了矛盾。

总之，不論“海禁”或“朝貢”的限制，到了洪武末年，都形成了当时国际貿易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矛盾日益尖銳。从国內私人海外貿易来說，这样下去会产生“所在連結为乱”的武装反抗，封建統治“秩序”就要受到威胁。而对各国“朝貢”的限制，由于不能滿足需要，故各国也以“久缺貢”但“番商”直接前来貿易的行为反抗，这又使“天朝上国”自居的封建帝国的国际地位低落。要巩固統治秩序，維持“临御天下”的国际“威信”，就必須采取让步措施来緩和矛盾。

当然，不能設想封建制度下会有完全开放自由的海外貿易出現的，因为封建自然經济的本身没有这种要求。但在矛盾尖銳时采取相对的让步还是可能的和必須的。至于采取什么形式，在什么时候出現，也是由当时的政治經济发展情况来决定的。“郑和下西洋”不早不迟，恰恰在朱棣即位初年出現，这就必須进一步具体来考察当时的經济的和政治的原因。

在經济上，朱棣为了緩和上述“海禁”政策和

---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餉税考。
② 大量物物交换，記載甚多，散見于“明实录”、“明史稿”中有关朝貢的記录。
③ “明史”卷八一，食貨五，市舶；及卷三三二，天方国傳。
④ “明史”卷二〇三，唐胄傳。
⑤ “明会典”卷一〇一，外夷；卷一六四，作“开市五日”，日数虽不同，但有限制則可肯定。
⑥ “殊域周咨录”卷八，瑣里寸里。
⑦ “明史”卷三二四，暹邏国傳；“明洪武实录”卷二〇五。
⑧ “殊域周咨录”卷八，暹邏国。
⑨ “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国傳。

要求扩大国际貿易的矛盾，他采取了让步的措施。即：一方面相对地放松“海禁”和“朝貢”的限制；同时在社会发展已提供的經济基础和物質技术条件的可能性上，用大力派遣“多賫金币”的使臣团到各国去“招徠”，企图用这种让步来满足当时国际貿易的要求，緩和矛盾，扭轉洪武末年“諸番久缺貢”的現象。

关于朱棣采取的让步政策的記載是很多的，例如，当他正式称帝改年号的前一年(1402年)就对礼部大臣說：“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諸国有輸誠來貢者听。”①此外再从他当时实际的措施上来看，更充分表現了他对“海禁”的让步。永乐元年，下令把朱元璋初年設立、后来又废罢的三市舶司加以恢复。“上以海外番国有朝貢之使，附带貨物前來交易者，須有官专主之，遂令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設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②不只如此，对“祖制”看作“不合法”的一些“貢使”进行的貿易活动也加以让步，事实很多，举几个例說明：

其一，永乐元年九月，日本貢使来，对“不得私載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的“祖制禁令”也不执行，原因是怕“失朝廷寬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③。

其二，同年十月，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馬没尼奇等来“朝貢”，附載胡椒私与民互市，这也是和“旧制”違背的，但他还是怕“亏辱大体，而不許有司收税”④。

其三，永乐二年，琉球貢使亦不遵明廷指定在“会同館开市”，而私自“賫白金詣处州市磁器”，对这种“違制”行动亦以“怀远人”故而不加追究⑤。

此外，明廷为了各国来往的方便，二年五月更派官軍“帅舟师往海道巡哨”，“勦捕寇賊”以保証来往“朝貢”船只的安全⑥。

从上述所举的一系列的对“海禁”政策的让步及其措施来看，朱棣派遣使臣团去海外各国活动，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从政治方面来看。朱棣和朱元璋一样，在政治上，对外要継承对各国的“宗主”和“藩属”关系，以扩大他的政治威信。尤其是朱棣是用“靖难”为名，从他姪儿朱允炆那里夺到帝位的，这种情况在当时一些持有封建正統观念的士大夫分子看来，是不合法的，叫做“篡位”，所以时常发現有許多反对者。因而朱棣对內的政治措施主要是迫切希望得到地主士大夫阶級的支持和承認，以緩和統治阶級內部矛盾。

在对內方面，朱棣采取了很多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这里不多談。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希望很快緩和洪武末年存在的矛盾，以便取得周围各国的支持和承認，从而提高国际威信，扩大影响。因此出現：“当成祖时，銳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貴：西洋則(郑)和、(王)景弘，西域則李达，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显。”⑦即大量派使臣团到各国去建立关系。郑和即其中之一，他的七下西洋是其中最重要、且最有代表性的。这也就是朱棣派遣郑和七下“西洋”的政治方面的目的。这可以从他們所担負的任务得到进一步說明，記載說他們是“多賫金币，因給賜其君長”，即用“厚往薄来”的手段收买各国，以便“宣天子詔”，来达到承認他是“正朔”所在的地位。那些認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耀兵异域”的說法，显然是只从形式上看問題，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我們認为当时明王朝和各国建立“朝貢”关系的方式基本上是和平友好的。郑和自己曾說：“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勦灭之。”“番王之不恭者”，是指拒絕或反对和明王朝建立“朝貢”关系，亦即不承認朱棣的“正統”帝位者；“蛮寇之侵略者”，是指的那些阻止海道、危害各国間信使往来之海盗。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使用武力。而事实上，从整个郑和七下“西洋”的三十多年內，也只在上述情况下用过三次兵；而且他們每到一国，就把金帛贈給国王，表示愿意建立友好关系。由此可見，建立和平的关系是主要的。

那末，对历史記載說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踪迹建文”，这又如何解释呢？我們認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朱棣的帝位是“篡夺”来的，因此他对朱允炆(建文帝)的下落問題是不能不关心的。但是，如果仅只为一个建文帝而在几十年中，連續派遣大批人馬下“西洋”去作毫无把握的

① “明永乐实录”卷十二上。
② “明永乐实录”卷二一。
③ 同上书，卷二二。
④ 同上书，卷二五。
⑤ 同上书，卷二九。
⑥ 同上书，卷二九。
⑦ “明史”卷三〇四，鄭和傳。

寻找，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明史”“郑和傳”說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疑惠帝亡海外，欲縱迹之”，虽可能是朱棣的意图之一，但不能訒为是唯一的或主要的目的。

还有一种訒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联合印度各国，組成軍事联盟包围帖木儿帝国的說法也是缺乏史料根据的。朱棣即位前后，帖木儿帝国的兴起，曾一时形成过对明帝国的威胁，尤其在永乐三年有过进攻明帝国的动机和行动，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和此事有关，則无直接的史料証明，故也不能成立。

从上述的分析看来，虽然“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緩和国内国际的矛盾，想通过和海外各国建立联系，来巩固扩大傳統的封建“藩属”关系，但由于它出現的时間是国內工商业已也发展，国际貿易已有相当的发展，并要求扩大，而它所采取的形式，又是通过国与国間的物物交换的“貢賜”形式，这就决定它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国际貿易的性質。郑和每次下西洋“总率巨綜百艘”，船上带着大量的金銀物資，几乎每到一国都进行着“貢賜”性的物物交换，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大規模的貿易活动。如到阿丹国，其国“聞和船至”，“尽出珍宝互易”①。又如“中国宝船到暹邏，当地人民亦用小船去做买卖”②。郑和下西洋不但販卖本国貨物，还带回了大量的奢侈品。据当时記載說：“由是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龙涎之香，麟師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归。”③换回来的这些奢侈品不但有利可图，也是为統治者所需要的。正如“瀛涯胜覽”紀行詩所說：“归到京华覲紫震，龙墀獻納皆奇珍，重瞳一顧天顏喜。”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就是由于朱瞻基“好宝玩”而被派去采办的。

綜上所說“郑和下西洋”，是在明初在“海禁”政策和海外貿易迫切要求扩大的矛盾需要解决的形势下，在朱棣为了速迅发展和海外各国的关系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的形势下发生的。这两方面都是为了巩固朱棣的政治統治，但客观上正是对当时国际貿易要求的让步，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因此推动了国际貿易的发展。

---

① “明史”卷三二六，阿丹国傳。
② “瀛涯胜覽”，暹邏国。
③ “西洋朝貢典录”，序。
④ “瀛涯胜覽”，紀行詩。

1935—1941年的菲律宾农民运动

[苏] Г.И.列文森

1934年菲律宾群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迫使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謂“泰丁斯——麦克杜斐”法案，根据法案，菲律宾获得了自治权，十年后可以取得完全的独立。但是这种“自治”是带有虛构性的，因为仅仅在殖民地管理机构中增加了当地資产阶級和地主阶級上层分子的名額，可是美国总督却仍然保持了无限的权力。而且，在經济方面，“自治”也絲毫没有触动到美国垄断資本和地主阶級的利益。另一方面，長期处于封建殘余和美帝国主义剝削和压迫下的人民群众从“自治”中却一无所获。

正因如此，当时处于非法状态下的菲律宾共产党就坚决反对这个法案。在“自治”法案生效以后不久，菲律宾共产党就发表了一篇宣言①。在宣言中，共产党确定了人民群众当时斗爭的主要目标：爭取菲律宾的完全独立；把帝国主义的企业收归国有；没收地主和僧侣的土地，并把他們的土地、牲畜、农具分給貧农、中农和农业工人；废除农民和城市貧民所欠的債务；禁止高利貸；税收制度民主化。宣言并給党規定了以下的任务：揭露資

---

① 此宣言名为“反对泰丁斯——麦克杜斐法案——民族奴役和貧困的法案！爭取民族解放、爭取土地、爭取建立工农政府！”宣言曾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紐約，1935年第4期，第366——380頁）。

产阶級地主集团的各个政党的卖国政策，使他們在人民中孤立；揭露妥协主义的工会和农民組織中那些改良主义领导人物的眞实面目；把所有的組織（不論是革命的或是改良主义的）組成战斗的、群众性行动的工农統一战綫；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和經济的罢工；組織抗議警察暴行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反对从耕地上驅逐佃农，反对没收繳不起租税和还不起債务的貧农的财产；号召农民开展群众性的拒繳租税运动；号召农民有組織地夺取地主、商人和寺院的儲粮，并把它分配給飢餓的貧民。

爭取在思想上影响广大农民并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是菲律宾共产党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完成这項工作，对当时年輕的共产党来說，是很艰巨的。1930年——1932年，由于共产党被取締，进步的全国农民协会主要領导人也因此被捕入獄。协会遭到警察不断的迫害，它的影响仅限于吕宋中部各省的一些地区。

在"自治"时期以前，菲律宾的农民运动受着各种落后的思想影响。例如，1931年1月，在邦加西南省領导农民起义未成的"庫洛魯姆"①神秘教派仍継續在活动；1927年在布拉康、內瓦·埃西哈等省建立了"唐古兰"秘密协会②，这一协会的基本群众是貧雇农，他們幻想获得土地和自由，但是領导协会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却在农民中散布一种危险的妄想，他們說，菲律宾人的"同种兄弟"——日本将要以"保护人"的資格帮助他們摆脫美国的压迫。1931年年底，"唐古兰"协会由于試图发动起义，而遭到警察的破坏。

不少农民（特别是在吕宋島西北各省的农民）追随着小资产阶級的共和党。这个党为新教派的"菲律宾独立教会"所建立，新教派經常从道义上来譴責貪婪的天主教僧侶和地主的专横。但是菲律宾基本农民群众还置身于所有政治思潮、政党和政治組織之外。資产阶級地主的国民党向农民保証：只要泰丁斯——麦克杜裴法案通过，菲律宾也就会获得独立。这种騙人的保証当时在农民中起了一定的影响。此外，1935年3月通过的菲律宾宪法在相当广泛的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一种錯觉，似乎在十年后菲律宾就会是一个主权的民主国家了。在这种情况下，菲共認为向工人、农民以及所有政治上没有經驗的人解释宪法和"自治"的眞正意义乃是自己的首要任务。

1935年3月全国农民协会在馬尼拉附近召开大会。在会上全国农协領袖共产党員M·Д·卡斯基里揭露了这些法案的反人民性質。到会者譴責了已經通过的宪法，并宣布自己奋斗目标乃是建立工农政府。美国法官馬尔柯廉根据警察局的报告，报导了这次会議的情况。他說："会上許多人穿着紅衣和揮着紅旗，"最后他的結論是："共产主义思想在馬尼拉和吕宋中部各省取得了有力的影响。"③

但是在"自治"的最初几年，农民运动由于多半带有自发性，没有无产阶級的領导，因此都遭到了失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35年在吕宋中部所爆发的广大群众性的农民运动。这一运动后来被称为"薩克达尔党人起义"④。薩克达尔党⑤是在1933年由資产阶級、地主阶級的知識分子組成（在1930年，这个团体就开始在馬尼拉出版"薩克达尔"报）。該党管理委員会的主席是新聞記者貝·拉摩斯⑥，副主席是地主兼記者謝·迪安柯和律师埃·桑托斯。

薩克达尔党的領导人和普通党員的政治要求有本質上的区别。党的領导人属于資产阶級集团，他們企图利用日本和美国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依靠日帝的支持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經济的地位。拉摩斯和他的亲信同日本执政集团建立了联系，在他們的支持下，拉摩斯等进行了亲日的宣傳，并打算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組織以便对美国政权施加压力，然后从他們手中取得个别的让步。拉摩斯宣布："我們反对革命和暴力……我們不反对外国人……我們为合理的目标而奋斗。"⑦"薩克达尔"报号召群众抵制美貨，举行和平的示威游行。

① 这个名称的来源是曲解了的天主教教义 in Saecula Saculorum（拉丁語）——永恒的意思。

② Tanggulau——塔加洛語是保护者的意思。

③ G·馬尔柯廉："菲律宾自治"，紐約，1936年版，第283頁；"馬尼拉論壇报"，1935年3月29日。

④ Sakdal——塔加洛語是抗議的意思。

⑤ 薩克达尔党在馬尼拉附近几省拥有极大影响。詳情請閱奥·依·札鮑兹拉也娃："菲律宾群島的薩克达尔运动"一文；"太平洋"杂志，1936年第1期。

⑥ 貝·拉摩斯多年来一直是国民党一些报紙的編輯部的工作人員，和奎松很接近，不止一次帮助奎松竞选。他以"本·普本"笔名用塔加洛語写的詩很有名。

⑦ J·R·哈定："菲律宾"，紐約，1945年版，第386頁。

薩克达尔党人批評行政机关的“浪費”，要求降低高級官員的薪金。

当时拥护拉摩斯的有“不得意”的地方政客、資产阶級地主亲日集团的代表人物以及清教徒等。1934年选举中，在这些富有人士的支持下相当多的薩克达尔党人当选了，其中三人为众議院議員，很多人当选为市政府官員。薩克达尔党为了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提出以下的要求：如取消人头稅，取消佃戶繳納的地稅，“研究僧侣土地所有权，以便弄清他們地产增加的原因”，并提出“改善工人社会条件”这样一个含糊的口号；此外还主張在法院和学校中使用当地語言等①。这些要求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受压迫的农民群众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在上述选举中，这些打动人心的口号起了显著的作用。薩克达尔党人对国民党和民主党領袖借助虛伪的泰丁斯——麦克杜裴法案出卖菲律宾的批評也提高了自己的声誉。到1935年，据警察局的統計，薩克达尔党共有六万八千个党員，其中大部分是呂宋中部和西南部塔加洛族地区无地的佃农和雇农。唐古兰秘密协会的殘余部分也加入了薩克达尔党的队伍。同情薩克达尔党的大部分农民都不知道拉摩斯和日本人有联系，有些人则是天眞地相信日本这个所謂的“同种兄弟”会帮助菲律宾摆脫美帝的桎梏和地主的压迫。普通党員不太服从拉摩斯和其走卒的領导，他們經常不顧領袖的意图，而打算用革命的方法来争取本阶級的利益（尽管农民对本身的利益認識模糊，斗爭的方法是笨拙的）。

呂宋中部一直是菲律宾土地問題最严重的地方。布拉康省出租土地达到64%，內瓦·埃西哈省达到69%，邦邦加省竟达到70%②。号称全国粮仓的呂宋中部的耕地，大体上有99%是掌握在地主手中③。这就是为什么薩克达尔运动会在这一地区展开的原因。

由于受压迫的农民和雇工憤怒的情緒不可压抑的增長，所以爆发了五月起义。5月1日当社会党④在邦邦加省圣斐南渡組織示威游行时，社会党領袖彼德罗·阿巴德·圣托斯发表演說，在演說中他表示，劳动人民由于压迫加深所引起的憤怒随时都可以轉变为公开的起义⑤。

5月14日举行关于批准宪法的公民投票，为此特派警察在“不安”地区进行各种鎮压活动，局势变得很紧張。有关宪法和建立“自治”政府的問題激动了所有的人，因此，由群众的憤怒醞釀为反对以假自治欺騙人民的抗議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1935年5月2日——3日在布拉康、拉古那和黎薩各省和呂宋中部其他区域爆发了自发的武装农民起义，虽然薩克达尔党領导人不是起义的发起者，但是該党地方組織却領导了起义。

5月2日——3日起义者同警察发生冲突的直接原因，虽然各地不同，但起义者的呼声“菲律宾立即获得完全的独立”却是到处一致的。許多地方提出了废除新宪法的要求⑥。与此同时，薩克达尔党人的宣傳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他們在起义中傳播一种流言，說拉摩斯和李卡尔特将軍⑦最近一两天內将从东京飞到菲律宾来，并带来日本方面的軍事援助⑧。

根据被捕的起义者向美国副总督赫金所作的供詞可以了解到在农民的思想中是把反帝和反封建的斗爭任务結合在一起的。被捕者之一說：“如果我們获得独立，我們就能从外国人手中夺取土地。”另一个說：“我想在独立制度下，我們的处境会好一些，收成也将会是属于我們自己的。”起义者对国民党領导者也表示不滿，一个参加起义的妇女在审訊时說：“我們不能送孩子上学……我們五年来无力繳納地租。我的丈夫因为没有繳稅收据被关入监獄，我們反对宪法，反对国民党領导者，因为他們答应給我們独立，但没有兌現。”⑨

一个美国新聞記者报导說：“成百个馬尼拉貧民窟的居民及附近农村的漁民和雇农”都加入了农

① H·乔治：“菲律宾人民进入争取自由而进行武装斗爭的时期”，“共产党人”杂志，紐約，1935年第6期，第505頁；J·R·哈定：“菲律宾”，第363、386頁；“馬尼拉論壇报”，1935年5月7日；“馬尼拉論壇周刊”，1935年5月12日（公报1935年第6期）。

② “菲律宾統計年鑑”，馬尼拉，1947年版。

③ “远东概览”，紐約，1946年8月14日。

④ 1933年建立的合法馬克思主义政党。在共产党被宣佈为非法后，主要是在呂宋中部各省的农民和雇农中拥有影响。

⑤ “馬尼拉論壇报”，1935年5月5日。

⑥ “中国評論报”，1935年5月9日。

⑦ 阿·李卡尔特——曾是自1896年至1901年解放战爭中的一位有声望的参加者，他拒絕向美国人投降而出走日本。唐古兰协会会員把他认为是他們的名誉領导人，常常自称为“李卡尔特党”。

⑧ “馬尼拉論壇报”，1935年5月5日。

⑨ J·R·哈定：“菲律宾”，第395——397頁。

民起义的队伍①。处于非法状态下的非律宾共产党党员积极地参加了起义，但是他們对农民群众的影响毕竟还不足以保証无产阶級对起义的領导。薩克达尔党資产阶級領袖却善于把农民的憤怒引入歧途，强使农民接受亲日的影响。

共产党的策略是要促进自己在农民群众中政治思想影响的增長，但是在保証无产阶級对农民运动的領导方面却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由于没有无产阶級的領导，1935年的五月起义正象过去每一次人民运动一样，遭到了失敗。起义刚一开始就走下坡路。起义的第一天，起义者（据政府統計共有5000——7000人）②攻打十四个市政中心，占領了其中的三个。最大的一个城市是布拉康省的圣·依杰尔封索，"非律宾独立共和国临时政府"曾在这城市宣告成立③。最初殖民当局十分慌張，馬尼拉和各省的联系也中断了。但到5月4日政府就基本上稳定了局势。政府派去鎮压起义的共有八千名警察、宪兵和美国士兵。华盛頓方面宣布，如有必要，还可以派出二百名士兵④。

起义者的装备很差，而且薩克达尔党領袖在战争一开始就投降或逃跑了。因此，很多地方，普通党員憤怒地拿起武器来反对那些临陣脱逃的領袖⑤。起义在几天內被鎮压了。据官方报导，死亡人数約有七十人，而被捕的有八百人，但美国民主报刊指出实际数字还远不止此⑥。

虽然起义中心被鎮压了，但是运动在各地并未平息。一些小的起义团体还进行了很久的游击斗争。如阿賽基里奥的队伍在泰亚巴斯省和拉俄那省活动了几个月，他的主要政治要求就是：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没收付不起税人的財产和土地，采取消灭失业和改善农民处境的措施。他并指出，甚至美国独立宣言上也承认人民有权推翻专横的政府。在他致自己拥护者的信中最后写道："工人和农民，兵士和水手，不要相信把我們說成是土匪的資产阶級报紙。我們劳动人民立志要保卫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祖国，在斗爭中爭取政治的、經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解放。"⑦阿賽基里奥提出的綱領比薩克达尔党領袖的号召成熟得多，而且更接近人民。但是在恐怖統治下，他的队伍被赶上山，最后終于被消灭了⑧。洛·杰·拉·罗沙領导的队伍直到1938年才被警察抓住。

殖民当局分別处理了五月起义的起义者，把普通薩克达尔党員判处死刑和長期徒刑，而对这个党的領袖們却极为宽大，認为他們是危险性很小的敌人。果然大多数薩克达尔党領袖被捕后，立即表示悔过，因此很快地就被总督大赦了⑨。薩克达尔党仍允許繼續存在，新选的領导机构对总督"表示尊敬"⑩。这就是薩克达尔党人的影响迅速下降的原因。

在"自治"最初几年，农民运动几乎只是在吕宋中部各省展开。1935年6——8月在內瓦·埃西哈，塔拉克，邦邦加，布拉康，巴丹加斯，拉俄那等省发生了一些零星的佃农起义⑪。政府有时应地主的要求而派来軍队。很多場合下，地主被迫作些让步。

1935年底，拉俄那和泰亚巴斯省发生武装起义。1936年，据美国代理最高专員瓊斯的报告，主要的"騷动"地区是黎薩、布拉康、內瓦·埃西哈和邦邦加省。1936年12月——1937年1月在內瓦·埃西哈省的卡巴納渡大領地上发生了一次佃农起义，起义的原因是地主企图没收佃农的收成以償債务。省長亲自率領宪兵去救地主，将不馴服的农民关进监獄，但是地主也被迫降低了一些貸款利息。总之，每个月都要发生零星的土地冲突和农民起义。

以奎松政府为首的"自治"政府是保护地主和大資产阶級利益的，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依靠美国軍队来鎮压工农运动。在"非律宾統計評論"中曾这样报导："他（奎松——作者）最初采取的步驟之一就是亲自領导反对騷扰地方秩序的武装暴徒叛乱的运动……。他特別指示政府市政当局要严厉对付暴徒，在很多情况下，他亲自率領宪兵去鎮

---

① F·霍恩："太平洋的孤儿——非律宾"，紐約，1941年版，第260頁。
② J·R·哈定："非律宾"，第389頁。
③ "馬尼拉論壇报"，1935年5月4日。
④ "紐約工人日报"，1935年5月9日。
⑤ "中国評論报"，1935年5月9日。
⑥ "共产党人"杂志，紐約，1935年第6期；"紐約工人日报"，1935年5月4日。
⑦ "馬尼拉論壇报"，1935年7月28日。
⑧ 偵察和亲自枪斃阿賽基里奥的宪兵队军官赫·华尔加斯現（1956年）任非律宾軍队的总参謀長。
⑨ "馬尼拉論壇报"，1935年7月28日。
⑩ "馬尼拉論壇报"，1935年6月4日。
⑪ "馬尼拉論壇报"，1935年6月6日，7月2，11，28日；8月17，24日。

压在吕宋胡作非为的匪徒。”①

警察积极地帮助地主掠夺农民。为了不让佃农收庄稼，政府派了一队力量雄厚的警察到桑打——罗莎的阿勒比納庄园去，地主的“理由”是农民欠债未还。在另一个庄园，因被赶走的佃农仍在自己破屋頂下过宿，地主竟派警察逮捕了二十六个农民，并把佃农茅屋的柱子鋸断②。

奎松总統在一篇向农民发表的演說中断言道：“在菲律宾根本談不上政府沒收土地的事。我的根本义务在于保卫私有制，我将采用一切手段来执行这一义务……如果有必要，我将使用强力。”③

奎松不仅会使用强力，而且也会运用欺騙性的宣傳，他把确立所謂“社会正义”的行动綱領載入1935年的宪法中。这綱領的目的在于用对劳动人民的小让步来抑止工农运动的增長。美帝对这种欺騙性的宣傳，評价很高。

1935年“自治”政府为研究农民运动的原因，就委派了一个委員会去調査十八个主要省份的情况，根据調査的結果，政府认为向农民作一些无关重要的让步乃是上策。

1936——1939年菲律宾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土地問題的法案。所謂“稻田分成地租法案”，按其实質是固定了傳統的实物地租制，法案規定要締結用当地語言写的书面租地契約，并規定征收种子的偿还部分不得超过全年收获的十分之一④。税收制度改革的实質就是以新的“居住”税⑤来代替人头税。此外，还設立了合作社，表面上好象是为了减輕农民产品銷售的困难和取得貸款的困难，而实际上地主們却利用它来掩飾他們所締結的“卡特尔”协定，正是这种协定强迫农民接受对自己不利的价格。国家租賃和收买大庄园再租售給农民的法案执行得极慢。由于政府以最高的贖价向地主购地，因此对农民也提出了过高的地价要求。所以很多农民拒絕向政府繳納贖金。

1937年取得合法存在的共产党經常在农民中进行提高他們觉悟和揭露国民党欺騙性宣傳实質的工作。在农民群众生活要求的日常斗爭中，共产党是他們忠实保卫者，因此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不断地提高。

1938年10月菲律宾共产党同社会党合并，因此共产党領导的全国农民协会（这时拥有六万会員，并在內瓦·埃西哈和布拉康省农民中具有决定的影响）同社会党建立的以邦邦加省佃农和雇农为基礎的貧苦劳动者联盟也实行了統一。

这时薩克达尔党在农民中的影响下降了。党的領袖停止对国民党的攻击，并放弃了以前籠絡人心的口号。在1938年选举中拉摩斯号召自己的拥护者投国民党的票。因而，从此以后很多农民党員都加入了全国农民协会⑥。只有在拉俄那省的农村中，拉摩斯的党还保留了一定的影响。

共和党在农民中的影响也衰退了。庫洛鲁姆等神秘教派团体也退出了政治舞台。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影响也就愈来愈扩大了。

为了在农民面前揭露国民党政策的真面目，因此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有关土地問題的最低綱領，这个綱領的內容是：要求奎松政府将自己制訂和允諾的东西付諸实现，徹底实行“分成地租制法案”，禁止高利貸，給农民国家貸款，禁止把佃农赶出土地，减輕税收負担。

从1939年春天起，农民自动实行“分成地租制法案”，拒絕支付超过法律規定的那一部分地租和債务。而地主却依靠宪兵将佃农成群地赶出土地。地主迫害活动規模最大的地方是布拉康、內瓦·埃西哈、塔拉克和邦邦加等省（1939——1940年共产党領导的农民运动中心）。

共产党从組織农民抗議的示威游行工作开始，1939年4月准备通过全国农民协会在呂宋四个中心省发动一次有雇农和佃农参加的、反对把农民从土地赶出的联合起义。奎松得到消息后，不得不召集地主和农民代表会議，在会上地主們被迫答应了停止群众性的驅逐佃农行为⑦。

1939年6月，国民議会通过一項法律，內容是只有按照“分成地租制法案”規定的理由才能驅逐

① “菲律宾統計評論”，1636年第2期，第149頁。
② “馬尼拉論壇报”，1937年1月7，21日。
③ “美国商业部月刊”，馬尼拉，1936年3月号，第16—36頁。
④ A·卡斯迪洛：“菲律宾經济”，馬尼拉，1949年版，第84—85頁。
⑤ “美国商业部月刊”，馬尼拉，1940年3月号，第212頁。
⑥ “美国駐菲最高专員第三年度报告”，华盛頓，1943年，第38頁；F·霍恩：“太平洋上的孤儿——菲律宾”，第261頁。
⑦ K·比尔塞：“热带亚洲殖民地的开拓者”，第137頁。

佃农。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用另一种方法控制农民运动。

奎松打算把所有的农民組織都置于政府保护之下。1939年6月26日，劳动部長宣佈，經过全国主要农民协会的同意，成立一个旨在“在法律和秩序的范围內保卫佃农、雇农和小土地所有者权利”的全国农民委員会①，参加委員会的共有四十名代表，他們是由拥有三十万农民和雇农的四十个地方組織选派的，在这四十名代表中包括了胡·菲利奥，馬·杰·卡斯基里奥，卡·阿列汗德里諾，哈·馬納哈这些共产党領导人物。劳动部長是委員会的主席，执行秘书需要选举，为此，特召开了第一次农民大会。虽然政府代理人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共产党員胡·菲利奥却当选了②。

在同一年中，又召开了第二次农民大会，大会要求沒收大地产，职工会脫离政府的监督，并主張实行陪审制③。

总之，全国农民委員会辜負了政府的期望，1940年劳动部長奉命同这个組織断絕了关系④。这就表明国民党已无力控制农民群众了。

1939年底，共产党、所有进步的工会和农民协会、共和党的組織以及一些不大的小資产阶級团体組成了人民陣綫，这就标志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統一民主力量的增長。1940年12月在呂宋中部的人民陣綫在省市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內瓦·埃西哈、塔拉克和邦邦加等省人民陣綫的候选人中很多当选为市長。

被选入行政机构的共产党員竭力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改善城乡貧苦人民的状况。共产党員市長利用一种从未实行过的古老法律来反对高利貸，禁止地主向农民征收过高的利息。被激怒的地主以拒絕发放貸款来威胁农民。此时人民陣綫就組織了一个强大的农民攻势，迫使政府創立“农业財政办事处”发放利息为2%的貸款，虽然不到一年办事处被取消，但是这个暫时的胜利也加强了农民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邦邦加省的大地主企图以停止繳稅来破坏由共产党領导的市政委員会的工作。但阿略特市共产党員市長馬上向地主发出警告，如果他們眞不納稅，則市政府将收割田地上的庄稼充作稅款。这样一来，地主們不得不納稅。

共产党人利用每一次这样的冲突来吸引更多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参加政治生活，喚起他們积极为爭取自身利益而斗爭的意志。

显然，人民陣綫的政治意义还远远超过了呂宋島三个省的范围。

1941年农民运动从呂宋中部扩展到国內其他区域——阿尔巴、巴丹、喀皮斯、卡維特、依洛依洛、拉俄那、依薩維拉省。除去地区的扩大外，农民运动还有新的質的变化；1938年，参加同地主冲突的佃农中仅有3%的人参加了农民同盟，而1939年这一比例达到29%，1940年却达到60%（根据官方的統計）。

美国資产阶級观察家彼立采尔惊慌地指出：“1941佃农变为有組織的了，他們接受律师和工人的領导，而那些組織家和宣傳家不断地鼓励他們捍卫自己法律上应得的权利，并向他們解释这些权利。在佃农已参加組織的某些区域中，旧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已迅速消失了。”⑤

到1941年，菲律宾农民运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共产党在教育和組織群众以及在团結城乡劳动人民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共产党在馬尼拉大多数工人以及呂宋中部平原的大多数农民和雇农中贏得的巩固影响是建立工人阶級領导的反帝統一战綫的一个重要步驟。正因为如此，共产党在1942年日本侵略者占領菲律宾以后，能够立即成为爭取祖国独立的武裝斗爭的組織者和領导者。

（禹順云摘譯自“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簡报”第20期）

---

① A·卡斯迪洛：“菲律宾經济”，第67頁。

② K·庫立哈拉：“菲律宾經济中的劳工”，斯坦福特，1945年版，第82頁。

③ H·克立潘：“菲律宾土地危机”，第355頁。

④ H·克立潘：“菲律宾土地危机”，第356頁。

⑤ K·比尔塞：“热带亚洲殖民地的开拓者”，第101頁。

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

学　顺

总罢工的历史背景

1924—1928年在資本主义的历史上被称为“稳定”时期。这个时期里，資本主义世界在經受了1917—1923年革命风暴的冲击后，資产阶級的統治暫时地巩固起来。經济上，各国在战后曾經一落千丈的生产和貿易开始恢复并且逐漸地超过战前水平。

但是資本主义世界的这种“稳定”局面是暫时的，局部的和极不巩固的。这种“稳定”并没有克服資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就是：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之間的矛盾，殖民地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而且，資本主义的“稳定”的本身就孕育着这些矛盾的更加尖銳化，准备着新的經济政治危机的暴发。因为資本主义的“稳定”主要是靠加强对本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剝削和压榨而实现的，其結果必然导致无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以及殖民地劳动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以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矛盾来說，“稳定”时期不是緩和了，而是日益加深、日益尖銳了：資本主义局部“稳定”的特征之一就是欧洲各資本主义国家經济上的“稳定”主要是靠美国的帮助，而以欧洲各国在財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换来的。根据1923年的材料，欧洲各国当时积欠美国的債款就达一百一十六亿美元。其中英国欠四十七亿美元，法国欠三十八亿美元，意大利欠九亿美元。这些国家支付利息和債款的主要来源就是加重人民的捐稅負担。以1924年为例，欧洲各国人民的捐稅負担显然是加重了：战前的1913年英国人民的捐稅負担占英国全部国民收入的比率是11%，而1924年却增加到23%，法国1913年是13%，而1924年是21%，意大利1913年是13%，而1924年却增加为19%。賦稅加重的結果就是劳动人民物質状况的不断恶化。当然，賦稅的加重只是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恶化的因素之一。除此而外还有許多因素，如加强剝削工人血汗的“合理化”制度的盛行，劳动时間的延長，工人实际工資的不断降低等等都使得劳动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状况日益恶化。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要使无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不可避免地导致无产阶級反对資产阶級斗爭的加强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这次罢工是在資本主义“稳定”时期发生的的一次規模最大的无产阶級反对資产阶級的革命搏斗，它是資本主义“稳定”的暫时性和局部性的最有力的証明。

总罢工爆发的原因

“稳定”时期在英国爆发这一次規模空前巨大的总罢工，不是偶然的，它是和当时英国經济政治发展的特点分不开的。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相比較，英国在“稳定”时期經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速度緩慢和它在資本主义世界垄断地位的丧失。如果說“稳定”时期許多資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的工业生产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增長，那么英国的工业生产直到1929年才勉强地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而許多重要工业部門如煤炭、炼鉄及棉花的消費量直到“稳定”时期終結时，連战前水平也没有达到。只要把1929年几个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与战前1913年相比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英国的落后状况。如以1913年各国的工业生产水平为100，那么1929年，美国是170.2，法国是139，德国是113，而英国只有99.1。

由于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甚至是战敗国的德国竞爭的加强，英国以往在資本主义世界的垄断地位受到了根本的破坏。爭夺原料来源地、銷售市場和投資范围的斗爭給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这个斗爭中，技术装备陈旧、工业組織落后的“老牌”帝国主义当然敌不过“那些商品較为低廉、技

术較为高明的資本主义集团和資本主义国家”。美国、法国、日本以及德国，其中特别是美国資本迅速地排斥了英国在資本主义世界市場上的地位。英国壟断資本在国外的投資大大地减少了。以1929年和战前的1913年相比較，英国的資本輸出就减少了八千六百万英鎊。战前的1913年英国工业产品在資本主义世界市場上所占的份額是14.8%，而1926—1929年英国工业产品所占的份額只有9.8%；而同一时期，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市場上所占的份額却从37.9%增加到44.1%。在这样情况下，英国壟断資本渴望着寻求摆脫它的經济困难的出路，办法就是“犧牲英国工人阶級利益来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减低商品价格”，以便恢复与加强英国在資本主义世界市場上的竞爭能力。1924年12月上台的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全部政策就是根据壟断資产阶級的这个愿望出发的。

保守党上台后，立即向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展开瘋狂的进攻。1925年初，保守党政府在“恢复英鎊威信”的口号下，用提高物价降低工人实际工資的办法来稳定通貨恢复英鎊金本位①。由于这一措施的結果使英国商品的价格平均提高了10%。

为了“弥补”英国資本在国际市場上所遭到的“損失”，减低英国商品价格以加强英国工业在世界市場上的竞爭能力，保守党政府采取了进一步降低工資、增加劳动时間和使工人劳动条件更加恶化的政策。壟断資本及其代理人保守党政府在推行这种向工人阶級生活水平进攻的政策时，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手段。他們把煤矿工人作为第一个打击的对象。1925年6月，煤矿主向工人发表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声明：要求取消現存的全国性的合同，代之以分区締結的新合同，降低工資13%—48%，取消最低工資制度。如果工人不接受这个条件，矿主就从1925年8月1日开始同盟歇业。矿主的声明发表后，保守党政府馬上宣布支持矿主的要求。1925年7月26日，保守党政府首相鮑尔溫召見了矿工領袖，要求矿工接受矿主所提出的条件。他公开宣称：“我認为全国的工人都必須接受工資的削减，以帮助工业站稳脚跟。”

英国壟断資本和它的代理人保守党政府首先选擇了煤矿工人为它們的主要打击对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英国煤矿工业的“处境”特別困难。大家都知道，煤炭是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但是自从旨在复活德国軍事工业潜力的道威斯計划开始执行后，在美英資本的直接帮助下，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地恢复起来，魯尔的煤很快地就开始在資本主义世界的煤矿市場上排斥英国。由于英国煤矿工业的技术装备較为陈旧，它是經不起德国的竞爭的。这就給英国的煤矿工业带来了很大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英国壟断資本迫切地需要从降低矿工工資和增加劳动时間中来“补偿”他們的“損失”。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英国煤矿工人一向是英国工人队伍中的一支最先进的部队。在英国历史上的历次工人阶級反对資产阶級的斗爭中，煤矿工人都是走在斗爭的最前列。所以英国資产阶級在向工人阶級进攻时，首先选擇了煤矿工人为主要打击对象，他們打算首先击潰英国工人的这支主力部队，然后再向其他的部分工人进攻。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一文中指出：“英国資本所以进攻煤矿工人，不仅因为煤炭工业技术装备很坏而需要‘合理化’，而且首先因为煤矿工人过去和現在一直是英国无产阶級的先进部队。制服这支先进部队，减低工資，延長工作日，为的是把这个基本部队压制下去以后再去对付工人阶級的其他部队，——这就是英国資本的战略。”②

当然，英国壟断資本对工人阶級生活水平的这种猖狂进攻，不可能不遭到英国工人而首先是矿工的堅决反抗。1926年的总罢工就是英国无产阶級对壟断資本及其代理人保守党政府的压榨政策的一次大規模的、最激烈的反击。

資本主义局部“稳定”年代中，英国无产阶級的革命性和阶級覚悟有了显著的提高。虽然在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英国是改良主义影响較深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英国資本主义壟断地位的消失、壟断資本超額利潤的减少、工人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和社会主义苏联的革命影响，英国工人运动中左傾化、革命化加强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現在1924年英国工会运动中所出現的“少数派”运动上。这个运动是在英国共产党領导和倡議下掀起的，它的目的是反对职工会和工党头子們所执行的阶級合作政策。“少数派”运动首先开始于煤矿工人中，以后很快就扩大到其他部門。1924年8月，“少数派”

① 英鎊的贬值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开始的。战时英国放棄了英鎊的金本位，到1925年英鎊价格跌到其战前价格的90%。

②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2頁。

运动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以波立特同志为首的“少数派”运动执行委員会，并且制定了“少数派”运动的基本綱領和方針。“少数派”运动发展得很快，1924年参加“少数派”的人数是二十五万人，而到1926年初就达到一百万人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英国职工大会人数的四分之一。

“少数派”运动在促进英国工人运动左倾化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1924年9月在赫尔举行的英国职工大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是在英国职工大会总委員会的右翼領袖和工党头子們控制下举行的。尽管如此，大会在“少数派”运动代表的影响下，通过了一些带有左傾化的決議。大会通过了一项“产业工人宪章”。宪章的主要內容是：要求实行土地、矿山、鉄路国有化，实行四十四小时工作周制，在一切工业部門确立最低限度工資等。大会決議按照产业原則建立工会，決議英国职工大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去团結欧洲各部分的工人运动”，以求在国际范围內达到工人运动的統一，大会还決議与苏联职工会团結一致。这些決議的內容也就是“少数派”运动的基本綱領。在“少数派”运动和广大工人的要求下，1925年4月英国职工大会总委員会和苏联职工会达成协議成立英俄統一委員会，作为苏联工会与英国工会經常合作的机构。

“少数派”运动的发展，赫尔代表大会的決議和英俄統一委員会的建立，这些事实都証明了資本主义局部“稳定”时期英国工人阶級革命性和組織性有了迅速的进步。正是这个进步准备好了1926年总罢工的爆发。

总罢工的发展过程

1925年的“紅色星期五”事件是1926年总罢工的先声。

当1925年6月矿主和保守党政府向工人发动进攻后，立即遭到矿工和全体工人阶級的一致反击。矿工和全体英国工人以一致行动来回答矿主露骨的挑战。煤矿工会发表声明，坚决拒絕矿主的最后通牒并且作好战斗准备。早在1925年春，煤矿工会就恢复了和鉄路工会、运輸工会的“三角同盟”①，并且由于机械工会也加入“三角同盟”，“三角同盟”就扩大为“四角同盟”。煤矿工会的声明发表后，鉄路工会和运輸工会也发表声明：“如果矿主不撤銷其最后通牒，鉄路工人和运輸工人就在全国范围內停止运煤。”其他部門的工人也相継向矿工表示了他們的支援。在全体工人的要求和压力下，工会总委員会的右翼領袖們也不得不在1925年7月31日宣布：当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时，全国各鉄路、港口都要以罢工来支援煤矿工人。

工人阶級团結斗爭的决心和行动是对英国資产阶級和保守党政府的一个迎头痛击。資产阶級和保守党政府不得不寻求暂时的妥协，以便赢得时間进行充分的准备后再举进攻。正因如此，1925年7月31日（矿主原訂同盟歇业的前一天），保守党鮑尔溫政府以“調停人”的資格出現，“建議”矿主撤銷最后通牒，政府撥給煤矿工业以二千三百万英鎊的补助金以便維持矿工的原有工資水平。这是工人阶級团結斗爭所取得的胜利。1925年7月31日这一天是星期五，英国工人为了紀念这个胜利，便把这一天称为“紅色星期五”，把它和1921年的“黑色星期五”②相对照。

但是垄断資本和它的代理人保守党政府并不是眞正的对工人实行让步。二千三百万英鎊的补助金只够九个月之用，他們的目的是利用这九个月的时間进行充分的准备后再举行进攻。事实正是这样，資产阶級和保守党政府在“紅色星期五”以后，“从八月份的第一天就开始准备着一次他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且，坦白地說，如果能把整个工会，特别是矿工打倒，这也是他們所期望的一次冲突”③。准备工作是按照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1）首先对工人阶級的先鋒队——英国共产

---

① “三角同盟”产生于1915年。这是煤矿工会、鉄路工会和运輸工会之間的同盟关系。三个工会协定，各工会都要以行动来支援彼此的斗爭。但是这个同盟建立起来后屡次遭到各工会右翼领导的破坏。1921年4月，由于鉄路工会、运輸工会的右翼領袖違背协定，拒絕支援矿工而破坏了“三角同盟。

② 1921年矿工为反对矿主削减工資，举行了罢工，在罢工发生前，矿工曾和鉄路工会、运輸工会約好共同行动，但是当罢工发生后，鉄路工会和运輸工会右翼领导違背了諾言，拒絕支援矿工，結果使矿工的斗爭遭到了失敗。这个事件发生在1921年4月15日，这一天是星期五，英国无产阶級把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五”。

③ 約翰·穆菲：“1926年英国总罢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9頁。

党施行了打击，目的是使英国工人阶級在未来的冲突中失去眞正的革命的領导。1925年12月，英国共产党总部遭到警察的突然袭击，党的十二名主要領导人（主席麦克曼納斯，副主席加拉赫，书記英克平，波立特等）被逮捕。他們的罪名是“出版列宁先生的著作”，“以言論煽动叛乱”，并分别判处六个月到一年的徒刑。这就足以使他們不能参加1926年4月底的預定冲突。

（2）制造反对矿工的“根据”以孤立矿工。为了制造这种“根据”，政府設立了一个以自由党人賽繆尔爵士为首的皇家煤矿委員会。这个委員会的任务是对煤矿业的情况进行調查并提出建議。这个委員会完全是由資产阶級的代表人物組成的。1926年3月10日，賽繆尔委員会提出了調査报告和建議。报告的結論是同意煤矿主在1925年6月最后通牒中所提出的要求，建議：降低工資百分之十，取消全国性合同而代之以分区合同，把矿工的工作时間由七小时增加到八小时，并且建議在国家領导下实行煤炭工业托拉斯化以求加强英国煤矿业的竞争能力。

（3）建立了鎭压罢工的秘密机构。全国被分为十个区，每区都有一个由政府秘密委任的拥有非常权力的专員来統轄。各区都制定了周密的鎭压罢工計划，其中包括“加强机动的警察队，以便隨时投入遭受威胁的地区执行任务”。

（4）建立了专門破坏罢工的工賊組織，名称是“供应維持組織”。这个組織表面上是一些“志愿人員”組成的；实际上完全是在政府的支持和策划下建立起来的。控制这个組織的都是一些反动政客和垄断資本的忠实走狗，如海軍元帅杰列哥勛爵，陆軍上将、前皇家卫队司令官法兰西斯·劳埃德爵士，名律师林登·麦卡賽爵士等等。当时在英国存在的法西斯組織也“志愿地”参加了“供应維持組織”，这个組織的任务被指定为在罢工发生时破坏罢工保障运輸，維持电力和粮食的供应。

（5）貯存了大量的煤炭（大約可供五个月之用）和相当数量的原料和粮食。

当資产阶級和保守党政府大規模地准备进攻时，英国工会总委員会的右翼領袖們却置若罔聞和毫无动作。在賽繆尔委員会的报告未公布前，他們借口是“等待賽繆尔委員会的报告”，而当賽繆尔委員会的报告公布后，他們就开始在賽繆尔报告的基础上，和政府进行“談判”，并企图誘劝矿工接受賽繆尔报告所提出的建議。

只有英国共产党是英国工人阶級利益的唯一的眞正的捍卫者。虽然当时共产党的处境很困难，党的主要領导人都被逮捕关进了监牢，但是共产党还是坚定不移地为保卫工人阶級的利益而斗争。英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警告英国工人未来更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敦促工人为斗争作好准备。1926年1月，共产党提出了它的斗争計划：要求在加强总委員会权力的同时，在企业中建立工厂委員会，工会和合作社締結合作协同，建立工人自卫团等，并建議一旦发生冲突，就以全国总罢工来回答。共产党的口号是：“不減少一文錢的工資，不增加一分鈡的工时。每个城市一个行动委員会。和士兵做朋友。人人都来支持矿工。”共产党的計划得到了“少数派”运动的积极支持；但是却遭到总委員的拒絕。控制在右翼分子手中的工会总委員会和工党絲毫没有作准备斗爭的打算，就在这种紧急关头，他們不去团結一切力量为捍卫工人利益而斗爭，相反地却在1925年9月所举行的工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从工党組織中开除共产党員的决議。

以上就是1926年总罢工前敌对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英国資产阶級和保守党政府，他們为了迎接未来的斗爭，利用了罢工前九个月的时間进行了有把握的周密的准备；另一方面是掌握在右翼分子手中的工人运动的大本营——工会总委員会。“这个大本营的主要人物，不是英国煤矿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級的公开叛徒（湯姆斯，韓德逊，麦克唐納及其伙伴），就是那些惧怕斗爭尤其惧怕工人阶級获得胜利的叛徒的毫无气节的同道者（柏塞尔、希克斯等人）。”①他們对未来的斗爭没有作任何准备，如果說有准备的話，就是准备在未来的斗爭中出卖工人阶級。1926年的战斗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开始的。

1926年4月30日，資本家和保守党政府向工人宣战：这一天保守党政府作了关于国内处于紧急状态的决定，同一天矿主向工人宣布，从4月30日夜間开始同盟歇业。

虽然总委員会存心妥协，矿工和英国全体工人还是表现了团結斗爭的决心。矿工表示坚决拒絕矿

---

①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4頁。

主的威胁并以罢工相对抗，其他部門工人都表示和矿工团結一致。由于考虑到工人的战斗情緒，害怕丧失自己的影响，总委員会的“領袖”們才不得不作出总罢工的决定：如果矿工与矿主不能达成协議而举行罢工时，其他各部門工人就以总罢工来支援矿工。总委員会的“領袖”們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根本就没有想执行这个决定，他們仅仅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各地工会，而没有为罢工作任何的組織工作。尽管如此，英国工人阶級却以充沛的热情参加了斗争。

1926年5月3日夜——5月4日，总罢工开始了。罢工的規模是巨大的。罢工爆发的第三天（5月6日），参加罢工的人数就达四百余万人，以后又陆續有二百万人参加了罢工，总罢工給英国资本主义的“稳定”局面以致命的打击。总罢工期間几乎是一切主要工业地区，一切主要工业部門都停止了工作，“罢工象燎原之火一样从一个工业区蔓延到另一个工业区，席卷苏格兰和威尔斯的全部工业企业”，在总罢工的打击下，全国經济生活都陷入了瘫痪状态。总工会在完全不合总委員会領袖的意志的情况下发展着。工人們没有等待他們“領袖”的“指示”，就自动地建立了罢工委員会、行动委員会和工人糾察队。总罢工逐漸地由經济斗争向政治性的罢工过渡。許多地区的政府权力被罢工委員会所代替，保守党政府事先建立起来的鎭压罢工的机构和“供应維持組織”失去了效用。这时罢工委員会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机构，向市民提供必要的供应品。在許多地区，警察局長要把一个犯人由监狱提往法庭或由法庭送往监狱都要事前获得罢工委員会的許可。許多城市的街道上可以看到挂着“經罢工委員会許可”或“經行动委員会許可”的紅牌子汽車，不然就不能通行。当时的煤矿工会书記柯克在描述英国工人阶級在总罢工期間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时写道：“这是一个奇特的功业，这是一个奇特的成就，它断然地証明了工人运动中有这样的男女，他們在危急时，有能力管理国家。誰能忘却摩托車輛上貼着‘經职工大会許可’的紙条的印象？政府和它的‘供应維持組織’完全涣散了。尽管那些志愿人員，工賊和特别警察制造事端，但到处都呈現着信心，沉靜和秩序。工人們象一个人一样的行动着。了不起的紀律！了不起的忠誠！”①

总罢工发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当英国总罢工的消息傳到国外后，很快地就获得其他国家工人的同情和支持。許多国家的工人发动了同情性的罢工。荷兰、比利时、德国以及許多国家工人拒絕把煤炭装运往英国。为了支援英国工人的斗争，許多国家的工人自动地发动了募捐运动，仅苏联工人的捐款就达一千一百五十万金卢布。但是英国工会总委員会却在“不愿使资产阶級有借口指責工会接受莫斯科的金錢”的“理由”下，拒絕接受苏联工人的捐款。

正是在斗争处于最尖銳的时刻，当资产阶級在和无产阶級的正面斗争中显得无能为力时，总委員会的“領袖”們出来为他們的主子“效劳”了。被罢工的威力和規模所吓坏了的总委員会“領袖”們，从罢工一开始就采取了叛卖性的立場。他們在看到总罢工已无法阻止后，便力图把总罢工限制在狭隘的經济范围內。他們号召工人的行动“不要超过大英帝国的宪法范围”，要求工人在罢工期間“离开街头，自己去进行文娱活动或者是留在家里”，“希望每一个参加的会員在他的行动中应当是堪为范例的，并且不要給予警察干涉的机会。任何紛扰的发生对于胜利地結束糾紛的远景是有害的——委員会要求糾察队特别避免糾紛，并严格执行他們合法的任务”②。

不仅如此，从罢工开始的第一天，总委員会的“領袖”們就背地里和保守党政府勾勾搭搭地进行出卖总罢工的談判，最后終于在1926年5月12日（总罢工的第九天），总委員会借口“政府已向总委員会保証，只要停止罢工，矿工一定能够获得矿主的让步”而宣布停止总罢工。实际上他們是說謊，他們从来就没有得到任何保証，这是一种十足的叛卖行为。

英国共产党看穿并揭发了总委員会的叛卖行为，它尽一切努力来使总罢工恢复和坚持下去。共产党在它出版的“工人公告”中向工人呼吁：要継續支持矿工，“要求立即召开有所有罢工委員会和行动委員会代表参加的緊急会議，以考虑継續斗争并迫使領袖們也这样做”。共产党还建議召开罢工委員会代表的全国会議以及各工会执行委員会会議，为継續战斗提供領导。但是由于共产党力量的

---

① 約翰·穆萊：“1926年英国总罢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96頁。

② 同上书，第103——104頁。

薄弱，当时大多数工会是掌握在总委員会手里的，工人們在总委員会的"命令"下停止了罢工。只有矿工单独地坚持斗爭到12月中旬，最后終于因为独力难支而遭到了失敗。

总罢工失敗的原因

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失敗原因，归結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1）总委員会的叛卖。控制在右翼分子手中的总委員会在罢工爆发前，他們反对总罢工，拒絕为罢工作任何准备工作；当罢工发生后，他們又尽一切努力把罢工限制在狹隘的經济范围內；而当战斗进入最紧張的时刻，他們就出卖和破坏了罢工。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英国工人阶級首先必須摆脫他們現在的那些領导者。有了湯姆斯之流和麦克唐納之流的領袖，是不能和資本家作战的。后方有了韓德逊和克萊因斯之类的叛徒，是不能指望胜利的。"①

（2）英国資产阶級及其代理人保守党的老奸巨滑和富有斗爭經驗。"英国資本家和保守党比起英国工人及其領导者总委員会和所謂工党来，一般是更有經驗，更有組織，更坚决，因而也是更有力量的。"②資产阶級和保守党政府有把握地准备了这次冲突，并且有效地利用了工賊和工会右翼分子的叛卖行为来从內部瓦解了工人队伍，破坏了总罢工。

（3）英国共产党力量的薄弱。英国共产党在总罢工时期的立場自始至終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英共力量的薄弱，它在英国工人中缺乏应有的威望，因此它没有能够掌握罢工的領导权，没有能使广大工人按照自己的正确路綫进行斗爭。相反地，大多数工人却是在右翼工党的影响下行动的，这就决定了总罢工的失敗命运。"英国共产党的軟弱对于总罢工的失敗有相当大的关系。必須說，英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优秀的支部之一。必須指出，在英国罢工的整个期間，它的立場完全正确。但是也必須承认，它在英国工人中的威信还不高。而这一情况在总罢工进程中不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③

总罢工的历史意义

总罢工虽然是以失敗而告終的，但是它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1926年的总罢工是現代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最重大的事件。"这次罢工是宪章运动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阶級搏斗之一"。它是英国工人阶級的革命性和組織性迅速增長的最鮮明的标志，"它代表着早期工人运动和現代有組織的工人阶級的成長与发展之間的一个明晰的分界点"④。由于这个伟大的斗爭，英国工人阶級不仅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而且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輝的一頁。

1926年正是資本主义"稳定"的兴盛时期，而就是这个时期，在英国这样"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爆发了这样巨大規模的总罢工，这就不仅是对英国資本主义"稳定"局面的一个重大打击，而且也是对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稳定局面的一个最严重的打击。它是資本主义稳定的局部性和暂时性的一个最有力的証明。"英国的罢工証明，共产国际关于稳定局面的暂时性和不巩固性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英国資本对英国煤矿工人的进攻是企图把暂时的不巩固的稳定局面变成巩固的和永久的稳定局面。这一企图沒有成功，而且也不可能成功。用大罢工来回答这一企图的英国工人向整个資本主义世界表明，要在战后时期的条件下建立資本主义的巩固的稳定局面是办不到的"⑤。

---

①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9頁。

② 同上书，第143頁。

③ 同上书，第146頁。

④ 約翰·穆萊："1926年英国总罢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第10頁。

⑤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8頁。

资 料

上海工人第一次紀念五一勞动節

子 牛

一 紀念节前的宣传活动

1920年上海工人紀念五一劳动节，是上海工人第一次紀念自己的节日。这一年除了上海以外，全国許多地区也都举行了群众性的紀念活动。

这次紀念活动是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导与推动下进行的，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后一年，馬克思主义在当时思想界中日益成为主流，工人阶級本身也开始了初步的觉醒。在上海工人紀念五一劳动节前，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星期評論"、"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等，都登載了許多启发工人觉悟的文章，例如刊登在4月18日"星期評論"上的一篇題为"工人应有的觉悟"的文章，針对当时一些资产阶級知識分子高唱"改良工人待遇"、"提高工人文明程度"的欺騙言論，用阶級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文章說："資本家除却財产上的利害关系之外，簡直沒有改良待遇底必要；或者同时于各資本之中，有比較良好的待遇；这一种与其認为慈善，不如認为誘惑較为恰当；又資本家有时为利害所迫（如同盟罢工、薩波达举之类）不得不改良种种待遇，这一种也不能認作劳动者底胜利，因为劳动者依旧是卖他的寿命，资本家依旧是吃着劳动者底寿命，……所謂現在的文明，就象劳动者自己踬成了很大很重的石搗臼，載在自己底头上，舂米給不做工的人吃。享受文明底幸福是一起人(資本家)，負担文明底工作又是一起人（劳动者），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那里还有过于此的！"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我們从前的革命，是替一般的資本阶級拆旧房子造新房子，我們沒有分住的；从前的护法，是替一部分資本家捉强盗，我們也沒有分的，我們要求能享受的自由平等，还是要从打破阶級制度上努力奋斗。"文章最后并提出了工人的責任："我們为自身的打算，为人类打算，不但应該負担現在的責任，并且应該負担将来的責任。……一、打破一切旧制度。一、建設新的社会"；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我們建設工作底任务……"①

除了这类启发工人觉悟的宣傳外，"新青年"和"星期評論"还特地出了紀念五一劳动节的专刊；在"新青年"的七卷六期"劳动节紀念号"上刊載了李大釗同志写的"五一运动史"等文章，同时以几乎超过二分之一的篇幅刊載了中国許多地区工人状况的調查。这一期的另一个特色，是插了許多工人自己的題詞和三十二幅工人生活照片，这在中国报刊史上也还是第一次。工人們写着："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脏物"；"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这些簡单的題詞，表現了当时工人的觉醒和对剝削者的仇恨。

在当时环繞五一劳动节的宣傳中，除了进步报刊外，甚至上海某些資产阶級报紙象"时报"、"时事新报"，"申报"等，也在五一劳动节前后做了不少关于紀念活动的报导，并且发表了一些評論。自然在这次广泛宣傳中，对于劳动問題、劳动运动等表現的观点也是相当龐杂的；但从上述情况我們可以看出在上海这次紀念宣傳活动里，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識分子显然是居于領导地位的，使得上海工人的第一次五一节就具有了革命战斗的气息。

二 大会的籌备

1918年在上海也曾有人进行过紀念五一节的一些活动，但那仅仅是少数知識分子的活动；而1920年在上海則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参加了紀念自己节日的活动，举行了前所未有的集会。当时上海工人还没有自己的工会組織，发起这次紀念大会的是下述七个团体：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誼联合会。这些

① "星期評論"，1920年第48号。

团体都不是真正工人自己的組織，其中除了药业友誼联合会这样一个工人自发性团体外，大部分都是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和政客所操縱的，他們企图用这些团体影响和控制工人并借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他們是没有工人群众基础的，因此这些团体都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傾向。尽管发起的是这些团体，但是当时在上海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不但在思想宣傳中占先，而且在大会筹备过程中也起了相当的影响。

在筹备的过程中，七团体曾經正式召开过两次筹备会議。第一次是在4月18日。在这次会上确定了大会的名称（"世界劳动紀念大会"）和筹备的組織（由各"工会"推选出三人为筹备代表），并且作出了两項决定：一項是除电車、电灯、自来水、电話、电报外，各項工作均須休息一日，工人列队游行以示紀念；第二項是以上海各界联合会名义通电全国。在各界联合会意見书中說道："五月一日为世界劳动者与資本家及其他种种强权奋斗之历史紀念日，本埠工界于是日列队游行，借作紀念，誠为上海工界彻底觉悟之第一次。"①会上还提出了四項紀念办法：（一）各团体、学校、商鋪及住宅悬挂国旗；（二）各工厂各商鋪放假，仍給工資；（三）各团体各界贈送物品：（甲）旗帜（旗头紅色），（乙）徽章，茶具；（四）各团体各学校列队，或派代表赴会②。筹备会又在4月26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議，到会者約有百数十人。这次会議是为了筹备紀念活动的具体事項并組織动員工人参加紀念大会。会議具体确定了大会的地点、时間和会議的程序。为了发动工人参加大会，筹备会向工人发了一种很簡单的通知傳单；此外还同时发了致各厂主、各店东、各报館书，和致县公署书，以便于工人顺利参加大会③。4月29日七团体又发表了工界宣言，宣言說："我們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鈡工制幸福的日子。我們紀念他的意思，第一是感謝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④

这次紀念大会从一开始筹备就遭到了軍閥政府的阻挠。本来在头一年即1919年发生的五四和六三运动，已經使得軍閥和帝国主义感到了工人力量的可畏，加以"五四"以后一年来的工潮、学潮也使軍閥官僚大伤脑筋，他們对即将来临的"五四"周年就早为戒备，现在听到工人要集会游行紀念"五一"，就更加惶恐万状了。他們进行阻挠的手段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誣蔑恫吓。上海軍閥头子卢永祥在致"北京政府"电报中說："学生等拟于五月一日开俄国劳动大会，乘机大举。"⑤北京軍閥政府在給上海护軍使和江浙两督命令中，也把这次要举行的集会誣蔑为"流氓煽动"；反动的上海淞滬軍使署和淞滬警察厅在4月27日和28日分别发出布告进行恫吓："如有故違，……定当执法严繩，决不寬貸。"同时他們还致函上海县商会，要商会轉知各工厂"預为疏导，勿任附和"。除了誣蔑恫吓，他們还直接用武力进行威胁，調动了大批步兵、騎兵、警察、宪兵，架起机关枪，把工人預定开会的地点——西門体育場，象战場一样地布署起来；并且早在"五一"的前两天，就把从斜桥到西門体育場的各要道都布置了軍警，并把斜桥以南划为戒严区域，白天也不让人通行⑥。

面对着这种形势，发起团体中的那些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就表現得动搖軟弱。他們本来就抱着借此抬高自己在工人中的地位的目的并企图从而把工人引上改良主义的道路，因此这时他們就大力强調这个节日的經济性質，力图使这次紀念活动在和平、"合法"的形式下举行；并且致函反动軍署，請求予以保护。但是一些觉悟了的工人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先进知識分子和青年，却表現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时的許多报紙报导說，当工人听到軍閥禁阻的消息后"甚为激然"，并表示："吾人各具自由之性灵，豈能因威迫之故，竟致辜負大好之紀念节耶?"⑦在"五一"前夕，有一位署名"克明"的讀者在投給"民国日报"的一封信中說："我底意見，劳工应該和官厅竭力奋斗……明天之中国劳动界第一次的举动，官厅要挫折我們底銳气，倘若含糊过去，以后还有仰首伸眉底日子嗎？所以不管压力怎样厉害，不能不奋斗，不管牺牲怎样重大，不能稍为躲避。……"⑧我們还发現了一分曾在当时工人中傳閱、后来被捕房暗探搜得的秘密

---

① "时事新报"，1920年4月20日。
② 同上，1920年4月25日。
③ "时报"，1920年4月28日。
④ "新聞报"，1920年4月29日。
⑤ "民国日报"，1920年4月29日。
⑥ "时事新报"，1920年5月1日。
⑦ "新聞报"，1920年5月1日。
⑧ "民国日报"，1920年5月1日"觉悟"副刊。

傳单。这份傳单提出了工人長远的奋斗目标，并且也反映出了工人們坚决鮮明的立場。傳单写道："我們不应該为获得八小时工作制而滿足，应該进一步收回土地，收回那些强盗們开設的工厂，尽最大的努力，使那些工厂在我們的掌握之下，这样我們才能享受我們底权利。不劳动的人都是强盗，窃贼，騙子，卑鄙小人，我們大家都应該'一起工作，一起吃飯'。……联合起来，推翻政府資本家，建立一个新政府。……"①

三 五月一日

上海工人的第一个"五一"紀念节日，是在軍閥和帝国主义武裝威胁和各种破坏阻挠下渡过的。这一天，反动的护軍公署調动了大批的武装軍警和帝国主义租界的巡警配合一起将上海布置成为了一个刀枪森严的世界。反动軍警和巡捕的头子什么厅長啦，总巡啦……这一天都亲自带領着軍警布防巡邏；从火車站到市区中心，到处都布滿了軍警；帝国主义者四处派出暗探打听工人集合的消息，甚至停泊在黃浦江的法国軍艦也于当天下午派遣了海軍陆战队馳往顧家宅法国老營盘駐守②。工人原定的会場——西門体育場这一天的景况是："体育場大門，固已坚閉，門前后駐守灰色兵士多人，荷枪实彈，如临大敌，后門亦有兵士駐守，遇人进前，出而驅逐，体育場周围，并有手执藤条的兵士若干人，专事揮逐道旁行人。場內駐紮第十五团之步兵及馬队机关枪炮队有五六百人，快枪成架林立，气象为之森严，电車过場时，乘車下望，但見一片灰色之制服，体育場之地面，几为所掩。"③但是工人們既沒有接受厂主的"疏导"，更沒有为軍閥的武力所吓倒，"中午初过，本埠工界中人，陆續乘車或步行往体育場者为数甚众"。"一时許，到会工人，漸聚漸众竟达四、五千人"，事实上人数一定还在此数以上。当聚集到西門体育場的工人看到会場已被軍警把持的情况后，于是被迫逗留在馬路的两侧，多数則退至体育場对面之顧家花园中，"簇之于园后土堆上，拍手呼嘯，以祝良辰，寂寞之荒地，頓成为喧鬧之場矣"。由于軍警的一再阻挠，紀念会会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更，先后一共变更了五次。最初由西門体育場改为提籃桥精武体育会体育場，又再改为北四川路青年会体育場，均由于遭到軍警和巡捕的禁阻，不能进行。当第四次改在青年会体育場旁边的广場时，軍警起初仅許以五分鐘的活动；可是正当会場刚布置好、工人高呼"劳动神圣万岁！"并要演說的时候，又有軍警前来干涉，勒令出場，"后到者不得入內，已入者复被逐出"。最后大会移到了靶子場路荒場上举行，这时又有淞軍三十九团第二营全营赶来，只不过这次并未立即干涉，"見工界人士并无何种特异举动，遂整队而去"，这样才算最后开成了会。

由于会場的数次变动，人数从几千人减为几百人，而所留下的大部分均是工人，并且情緒都极为高涨。据当时报載："到会者大部分皆純粹之工人，商界学界仅居其少数，且此輩大都抱客观态度"；"人数虽少而人人精神均极兴奋，殆亦因激而然"；"該場有小車一，工界人士之演說者乃用作講壇"。"工人中有一部分均执紙質赤帜，当散会后，三五成群，手揚小旗呼嘯而过街、衢，市人見者，为注目焉"④。会議的程序是仍旧按照原訂計划进行的，有工人代表（李恒林）演說，学生和商界也有代表講了話，并当場决定三項：（一）各工业要求工作每日八点鐘，一星期四十八点鐘；（二）各工业組織純洁之工会；（三）无論何种工业一律联絡⑤。

虽然紀念活动进行得很不順利，然而不論工人或革命知識分子，都从反动軍閥的刀枪下面获得了一次极为深刻的反面教育。你說是"純粹和平經济行动"，軍閥老爷們却如临大敌；你再三声明与官厅毫不相干，然而他們偏說你是違反戒严命令，横加干涉。那些祈求官厅"保护"的幻想，頓然地在无情事实面前破灭了。就在5月1日集会后的当天晚上，七团体在一些工人参加下召开了紧急会議，情緒十分激憤。在这次会議上，議决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和"致俄国劳农政府对我国通牒之答书"⑥两个文件，这两篇文件表現了中国工人新的觉醒。"上海工人宣言"表明了上海工人从当天事件

---

① "警务处日报"，1920年4、5、6月。
② "申报"，1920年5月2日。
③ "新聞报"，1920年5月2日。
④ "新聞报"、"申报"，1920年5月2日；"时事新报"，1920年5月3日。
⑤ "时事新报"，1920年5月3日。
⑥ 1919年7月25日苏联政府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在1920年初突破軍閥政府的封鎖被发表出来，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这里就是上海工人对这个通告的答书。

中所得到的教訓和工人的斗爭决心，“宣言”写道，“多謝今天軍警的强横行动，竟能使中国人由惊訝而怀疑，由怀疑而認識，由認識而决心，由决心而奋斗，从今天起，我們中国工人覚悟的团結的精神，已經足以使压迫我們的人胆战心惊。这一个事实，一定能够使全世界的朋友認識‘不入支那人清梦的五月一日’这一个可羞的批評，更由吾人今天的努力而稍微洗去一点。”而同时在“工界答俄国政府通告”中这样写着：“俄国工农同胞和俄罗斯劳农政府公鉴：我們是被华盛頓劳工会議屏弃在特殊地位的工人，接你們的通告，格外感动……我們相信一向没有国际观念的中国劳动者，今天才听到最亲切的劳动同胞底講話……我們要努力創造新的、美丽的、永久和平的人类世界，决定和你們同力合作，負担这个責任。現在，我們都处在国内国外金錢阶級的压迫底下，希望你們先起的同胞給我們和印度、日本、朝鮮、安南底劳动同胞一个猛力的援助。”①在这封信里表达了中国工人对苏俄工人的敬意，也表明中国工人認識了国际无产阶級的援助对于自己解放事业的重要意义。

上海工人第一次紀念自己的节日正当五四运动后一年，当时还在爱国运动高涨时期。在五四运动中，上海就已經有过工、学、商的联合战綫，“五四”以来工人也已經初步表現了自己的力量，而这次紀念活动又事先遭到軍閥的无理阻挠，社会輿論大都是同情工人的，因此5月1日同时也就成了除帝国主义者和反动軍閥以外的上海全民的节日。当天一部分学生和商人也程度不同地参加了紀念活动。“时事新报”5月3日的“各界与五一节”报导中称：“前日之紀念会，虽不能为完滿，而各界之表示，则甚有可观。英、法、美三租界、城內、閘北、各大小商店以及各路商界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各学校門前，均一律悬旗以示庆祝。二学生会（按：指全国学联会和上海学联会）二各界联合会（按：指全国各界联合会和上海各界联合会）各送‘劳工神圣’‘人力万能’紀念旗二面，茶点洋十元，祝詞各一篇。法界商业联合会亦送‘劳工神圣’紀念旗一面……其他各学校，各商界团体均有祝詞礼物，惜因屡被干涉，均未宣讀。”

爱国的青年学生們表現了很大的热情。青年学生在过去屡次爱国运动中往往祈求商人店东，想从他們那里得到支援；从六三运动罢工之后，学生們从斗爭中逐漸地感到工人这支雄厚力量了。这次看到工人自己要集会庆祝五一劳动节，学生們的心情是欣悅兴奋的，他們向工人送礼物，致祝詞，有的在学校里邀請工人参加开紀念会，有的就直接到工厂里去送礼品。有个叫“知学会”的学生团体，在“五一”那天由該会干事携同面包二車，小国旗数千面，往会場散发，并在附送的傳单上面写道：“将祖国之旗插在当胸，将麦粉面包吃在肚中，再請你們想想祖国的危境和餓肚的痛苦，还要想用什么方法去对付，我們要抱着牺牲的精神去奋斗，就是舍了性命和恶势力去战，这是最好的方法了。”②有一位名叫李仁余的青年学生于节日晚上“闖入捕房，向捕头質問不許开会理由”，捕房拘留了这位年仅二十的青年③。資产阶級也有一些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不过他們有的是利用这次机会向工人散布“阶級合作”的論調，有的資本家乃是为了討好工人，甚至借此来作推銷商品的宣傳④，他們是抱着不同的打算来参加这次活动的。

× × ×

1920年上海工人第一次紀念五一劳动节，由于已經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又在五四运动之后，同时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参加了領导，因此这次紀念活动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上海工人的这次紀念活动，是中国工人阶級自五四运动登上政治舞台以后所进行的斗爭中的一部分。就在同年5月，上海和其他几个地方产生了共产主义小組；一年以后，即到1921年7月，中国工人阶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誕生了，从此，中国工人阶級作为中国革命的領导力量，通过自己的政党領导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

① “新聞报”，1920年5月3日。
② 同上，1920年5月2日。
③ “民国日报”，1920年5月4日。
④ “新聞报”1920年5月2日。

教学問題



关于使学生牢固地掌握历史知識的几点体会

江苏苏州高中　胡息麟

历史課是一門阶級性和战斗性很强的課程，学生在参加当前的政治斗爭和生产斗爭中，历史知識是十分有用的。我們历史教师不仅要把历史知識傳授給学生，而且还应該要求学生牢固地掌握历史知識。可是就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情况来看，学生所学历史知識的不巩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学生所学的历史知識，往往支离破碎、概念不清、前后混淆、張冠李戴。因此怎样巩固学生的历史知識，是当前改进历史教学方法中的重要問題之一。

巩固历史知識，决不能把它看成是課堂教学中某一个教学环节的专有的任务。教师必須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中貫彻巩固性原則，必須在全部教学过程中随时注意巩固学生的历史知識，才能收到巩固学生知識的效果。几年来我在实踐中力图这样去做，收到了一定效果。现在把我的做法和体会提出来，請大家指教。

（一）指导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的目的性，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覺性，是巩固知識的重要前提。

过去不少学生往往提出这样的問題：学习历史有什么用？学生既然对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明确，自然就不会感到兴趣，学习态度就不会很积极。今天学了，明天忘了，也无所謂。

凱洛夫在教育学中指出："誰都知道，理解劳动的目的和这种目的对人类的重要意义是劳动能够取得效果的重要前提。学习劳动也适用这个原則。从这里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教师的职責在于向学生闡明在教学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学生的具体的学习任务。不但如此，重要的是要指出这些任务的实际意义，并且要使这些任务成为学生所心爱的活动。"①这就是說，向学生闡明学习历史的目的性，是誘导学生自覺地努力去鉆研和理解教材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基础上，学生才有可能牢固地掌握历史知識。

本着这样的認識，我在每学期开始时总要花一定的时間向学生說明本学期所要学习的这門課程的内容和它的意义。

1957年下半年我在开始講述中国近代史之前，先向学生說明：学习这門課程主要是可以使我們認識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向，这都是有助于我們参加当前的革命斗爭的。我告訴学生：

（1）中国近代史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丑恶本質，揭露了中国封建統治阶級对外投降、对内鎭压的反动罪行，可以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

（2）中国近代史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頑强反抗的优良的革命精神，可以激发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可以培养我們的爱国主义的品質。

（3）中国近代史表明了农民阶級虽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但是限于他們的阶級意識，所以不可能領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資产阶級由于本身

①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50頁。

的軟弱性，也不可能領导反帝反封建革命取得胜利。中国近代历史証明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必須在无产阶級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才能获得胜利。中国人民从流血牺牲的无数教訓中終于找到了自己应走的正确的道路。所以学习中国近代史可以帮助我們深入地了解当前的革命斗争，使我們更加拥护工人阶級和共产党的領导。

1958年上半年我在开始講述“五四”运动之前，也先向学生說明了学习中国現代史的意义。我告訴学生：

（1）中国現代史告訴我們，中国工人阶級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領导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英勇战斗的，是怎样經过許多艰难曲折，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傾向和各种缺点、錯誤而終于取得胜利的。学习中国現代史使我們信服地認識到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从而更加巩固我們确信党的事业在中国必然要获得最終胜利的信心，更加坚定我們拥护党、依靠党、听党的話的信念。

（2）学习中国現代史使我們認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取得胜利的过程是异常艰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得之非易的，所以中国現代史教育我們珍視革命胜利果实，鼓舞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并且也更加痛恨破坏中国革命的国內外敌人。

（3）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領袖毛澤东同志天才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說来解决中国革命問題的伟大胜利。因此学习中国現代史可以使我們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領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特別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的毛澤东思想。无疑的，学习中国現代史将会帮助我們提高理論水平和阶級觉悟。

（4）中国新民主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十月革命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历史上的最伟大事件，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伟大的世界意义。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世界上两个陣营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陣营的巨大变化。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影响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命运，而且也影响了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国革命的經驗極大地援助了被压迫的民族，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一个中国人民、中国青年，对于这一伟大胜利应該有深刻的認識。

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上半年正是整风和反右斗爭的高潮。右派分子污蔑党、污蔑社会主义，企图把中国拉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历史是最好的証明，是反击右派的最有力的武器，所以我在向学生說明学习目的的时候，特别强調了这方面的意义。学生对反击右派的意义是認識清楚的，当他們明确了学习历史的重大意义之后，积极性显著地提高了，而且能自觉地努力进行学习。如最近有的学生和我談，他們这一年来的历史学得很有劲。我問他們为什么有劲？他們說主要的原因是历史密切地結合了政治斗争，历史学习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觉悟。他們觉得学历史有用，学了历史使他們对当前的政治斗争体会得深刻。因为他們有了历史知識，因而在文学課上学到“不平常的春天”一文时，也領会得更透彻了。

所以指导学生明确学习的目的性，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是巩固知識的重要前提。

要使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的目的性，克服輕視历史的錯誤思想，决不是靠一堂課，一次談話所能解决的，这样的想法是不現实的。在学期开始时向学生說明本学期所要学习的这門課程的目的，仅仅是一个开始。必須要在以后的每一堂課里都要注意这个問題。并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紧密地結合当前的政治斗爭和生产斗争，使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的現实意义。

在另一方面，要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必須努力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綜合能力，养成他們从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观察一切历史現象的技能。要在学习方法上給学生以具体指导，使学生逐步学会独立地分析問題研究問題。学生养成了独立地分析問題的技能，他的学习就会更积极更自觉。

学生学历史不感兴趣，学不好，是不是学生不愿意学呢？这种学生我想是有的，但是如果簡单地、籠統地說学生不愿意学历史，那是不符合实际的。絕大多数的学生是有旺盛的求知欲的，他們是喜欢求得更多的知識的，那末为什么有不少学生都感到历史难学、兴趣不高呢？我觉得关鍵問題还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高中学生“要求获得知識……是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周围的生活和更好地准备实际参与生活”。①因此机械地、被动地学习对他們来

① “凱洛夫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頁。

說是兴趣不高的。如果我們的教学是单純的史实堆砌，不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学生的学习必然是很被动的。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不高，就不可能把知識牢固地記住。何况历史的材料是那么多，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如果教师不顧效果，只是一古脑儿地把一些史料死板地灌輸給学生，就无怪学生不感兴趣，甚至苦恼，教学效果也就不会好的。

这里需要附带談一談培养学生学历史的兴趣問題。学生没有兴趣怎么办？有些同志在講課中用穿插一些生动故事的办法来引起学生的兴趣。虽然老师并不是“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但是学生却往往只注意故事的情节，忽略了老师所講的基本历史事实。所以如果我們把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单純寄托在講故事上，那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兴趣应該是建立在对学习历史有正确的目的的基础上。当然在历史課的課堂教学中补充講授一些故事是可以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十分必要的。如战爭的經过学生很难記住，如果老师在講述时加上一些生动的故事，那就容易記得。在初中，更需要这样做。但重要的是要使这些故事为教学的中心目的服务。

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培养学生分析和綜合的能力也不是靠一堂課、一次談話或是一个典型問題的分析所能解决的。要把这一工作經常化，在提問时要注意，在講授新知識时要注意，在全部教学过程中都要注意。这样才能使学习历史成为学生“心爱的活动”。

总之，要使学生学得的历史知識能够巩固，启发和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是一个重要前提，而明确学习目的性，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历史問題的能力是提高自觉性和积极性的重要途徑。

（二）清晰地、明确地叙述教材和深透地分析教材，含有巩固知識的因素。

学生获得知識的重要源泉是課堂教学，是教师对教材的叙述和分析。因此学生对历史事实是否能形成鮮明的观念和概念，并把这些观念和概念在記忆中牢固地保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叙述是否清晰、明确，分析是否透徹。

所謂清晰地、明确地叙述教材，深透地分析教材，不仅指教师的語言要清晰明确，更重要的是指教师的叙述的感染性和邏輯性。

我們对历史教材的叙述和分析如果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就可以影响学生的情感、想象和意志，激起他們的爱或憎，憤怒或同情，这样获得的知識是可以巩固不忘的。使叙述富有感染力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即使是极簡单的、极普通的几句話，只要运用得当也能达到这个要求。例如我在講述东北抗日联軍的艰苦斗爭时，談到敌人在杀害了楊靖宇同志以后，曾解剖了他的遺体，在胃腸中所发現的完全是青草树皮和棉絮，一顆粮食也没有。这里既没有文艺性的描述，話又是那样的簡短，但是学生对抗日联軍的艰苦性的認識却是极其深刻的，也激发了学生热爱革命同志和憎恨敌人的情感。所以要感染学生并不一定需要做長篇的描述（描述有时是十分必要的）。有些同志耽心課堂教学中加强感染力要費掉很多的时間，会影响进度，我認为这是不必要的。

在教学过程中仅仅使学生获得“生动的直覚”的感性認識是不够的，必须由此进一步到“抽象的思維”。这就是說，在教学过程中要使学生深刻而且牢固地掌握某些概念，仅仅依靠叙述的感染性是不够的，我們还必須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来講述历史事实。这样，学生就可以有条有理地、系統地理解这些事实，認識这些事实之間的依存关系。

这里我想着重談一談怎样分析教材的問題。

一个高三学生和我談，过去他們总認为历史事实只有机械地記忆，現在覚得并不完全是这样，历史事实是可以理解地記忆的，即使象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約的內容也是可以理解地記忆的。这样的記忆，比較牢固。而老师对教材的深透的分析是他們理解教材的最重要的帮助。这段話說明了分析教材对巩固学生知識的重要意义。

我們应該怎样分析教材呢？

首先，分析教材应当根据可接受性和量力性原则。这就是說，教材的分析必須符合学生的年龄和他們的一般发展水平。不能过于深奧，但也不能过于肤淺，必須恰如其分。过分肤淺，学生不需要任何努力就可以掌握，就不能刺激学生的积极性，就会阻碍学生智力活动的发展。我們必須要让学生通过一定的智力活动，也就是通过一定的思維活动，才能使他們自觉地去掌握教材。

例如对中国工农紅軍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围攻，課本没有着重說明毛澤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在講到这一課时，我考虑毛澤东同志的战略思想是指导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紅軍战爭的基本原则，是工农紅軍四次反围攻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同

时也只有講淸楚毛澤东同志的战略思想才能使学生明确地認識第三次"左"傾路綫在軍事上的錯誤，深刻地認識到毛澤东思想的伟大。因此分析毛澤东同志的战略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教养和教育意义，对巩固有关的历史知識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在講課中就根据毛澤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做了分析。这篇著作完整地闡明了毛澤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如果全盘地分析是不必要的，是学生接受不了的。因此我只講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着重分析了'誘敌深入、后发制人'和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战略思想。一般学生对軍事知識是缺乏的，这样的分析是不是超过了他們的接受能力呢？我考虑，他們刚好看过了电影"星火燎原"，因此估計他們是可以接受的。过后学生反应說：看了电影，再听了老师所講的，我們对"紅軍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路，然后各个击破"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理解得比较深了，記忆得比较牢了。

其次，分析教材必須結合史实步步深入。要积极启发学生思維，对历史事实要进行理論分析，要使学生透过現象去認識問題的本質。这就是一般所說的归納法。一般的方法是，首先使学生弄清一系列的历史事实，并对这些事实加以鉴别分析，然后指导学生做出結論。这样的方法可以充分启发学生的思維，自然也就加深了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和巩固了学生的历史知識。教师的分析不是单純講理論，"分析"在課堂教学中决不能孤立地进行。

例如我在講述戊戌变法这一課題的时候，首先說明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然后說明了康有为領导的改良派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最后講述了从1898年6月11日起光緒皇帝所頒布的一系列的法令。这些都是叙述事实。当学生初步掌握了这許多事实并对这許多事实有所識别之后，再对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性質作深入的分析。这样，学生就自然地把事实和理論結合起来，記住了事实也就記住了理論。这样，学生就可以不必机械地背誦变法的各种措施，也可以不抽象地去記忆变法的实質。当学生透过事实認識了問題的本質以后，知識就容易巩固了。

又如我在講述洋务运动的时候，先引导学生看了課本所列举的各种"洋务"，然后再分析洋务运动的实質。我的分析是这样进行的：

（1）向学生提出問題：洋务运动是以什么为中心的？学生很容易回答：以軍事工业为中心。

（2）我又問：为什么洋务派办洋务以軍事工业为中心呢？我估計学生回答这个問題不象第一个那样容易，就引导学生从当时的时代特点得出这样的結論：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洋务派办洋务的时候，是外国資本主义国家对华侵略日益加深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漲的时代。当时腐朽的清政府不但无力抵抗外来的侵略，也无力鎮压国内人民的革命运动，清統治已經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要挽救它的統治，也就是要維持地主阶級搖搖欲墜的統治，所以他們要建立軍事工业。

（3）建立軍事工业，增强軍事力量对付誰呢？洋务派和清統治者是不是想抵抗外来的侵略呢？学生从以前学过的材料中可以自己做出答案。教师然后再問：旣然不是抵抗外国資本主义的侵略，那末办軍事工业又为了什么呢？到这里为止，学生对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質可以有初步的認識了。

（4）外国資本主义国家是要侵略中国的，那末为什么他們又乐意帮助洋务派办軍事工业增强封建統治者的軍事实力呢？通过这一問題揭露資本主义国家通过洋务运动扶植清統治者扩大对华侵略的目的。

最后我指出：洋务派办洋务的过程就是中外反革命勾結的过程，办洋务决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而只能加深我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5）我接下去再分析洋务运动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指出它阻碍了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的发展。

通过这样的分析，学生对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質認識得比較深刻了。然而分析还需要繼續深入下去。要分析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对民族資本主义发展所起的刺激作用。我們必須把洋务运动旣阻碍民族資本主义的发展又刺激民族資本主义发展的这一个"矛盾"使学生得到解决。这样，学生对洋务运动的認識就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完整的了。

这样的分析，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以事实作基础，而这些事实又是学生已有的知識；第二，是步步深入的；第三，是通过学生积极的思維活动进行的。这样分析以后，学生就容易把知識巩固在記忆之中。

第三，分析教材必須是有重点的，我們决不能漫无限制地在每一个問題上都进行深透的分析。需要着重分析的只是中心課題，对其他一些次要的教材可以用实事求是的語言只作簡明扼要的叙述即

可。

总之，分析教材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深刻地理解教材。只有被学生經过深思熟虑后理解了的教材，才能牢固地保存在記忆中。我們分析教材决不是为了旁証博引，炫耀自己，过多的过深的分析反而是有害的。

不仅教师要进行分析，还必須随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当然，教师在課堂上的分析可以起示范作用，事实上也就是指导学生学习怎样去分析問題。但这还不够，应該让学生在課堂上也有机会来分析問題。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巩固学生的知識都是有好处的。

我在講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这一課題时，采用这样的办法。我先告訴学生：今天让你們自己来分析。学生一听，情緒都很振奋。我让同学先列出提綱。因为“五四”运动的全部过程他們已經学过，学生列出来的提綱虽不能概括得很好，但基本精神是离得不太远的。然后我把它归納为下面两个問題：

（1）“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轉折点。

（2）“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提綱确定后再引导学生来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再不断地提出一些启发性的补充題，随时告訴学生应該怎样去看問題。学生的发言很踴跃。經过充分討論后，再指定一个学生把大家的发言进行归納。这堂課学生反应很好，认为既培养了他們的分析能力，又加深了他們的印象，不用死背而能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比較深刻地掌握了。因而也提高了他們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除了作具体的指导外，教师还应該作原則性的指导，这种指导带有更大的普遍意义。我曾經常告訴学生：历史的特点是时間性、空間性和一定的关联性，因此必須根据不同的时間、地点和条件来分析历史問題。告訴学生怎样去領会某一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呢？应該先了解这一事件的主要內容，它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去考察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历史意义。……学生掌握了这些原則以后，他就可以更广泛地自行运用这些原則去分析历史問題，掌握历史知識了。

总起来說，教师清晰地、明确地叙述教材，深透地分析教材才能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和掌握教材，而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更能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帮助学生牢固地掌握教材。

此外，加强历史教学的直观性，也能够帮助学生牢固地掌握历史知識。广泛地应用直观教具是加强直观性的最重要方法。直观教具是多种多样的，运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要收到好的效果，关鍵問題在于教师如何审慎地选择教具，如何恰当地运用教具。大家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經驗，我在这里就不贅叙了。

（三）反复地、經常地联系旧教材，可以使学生的知識系統化，巩固地保存在記忆中。

知識的积累总是螺旋式上升的，在講授新教材时密切地联系以前学过的教材，把新教材和旧教材联系起来，就能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历史現象的相互关系。有机地联系着新学的教材而不断地、經常地复习以前学过的教材，这是牢記的基本条件。因为哪怕完全領会了的知識，如果没有运用的机会，不在学习过程中加以应用，它們也可能被忘掉。而历史事实本身又具有內在的关联性，因此教师在进行新課的过程中联系旧課是非常必要的。

如何联系？在什么場合下联系？我个人通常是把所要联系的旧教材組織在新課开始前的“检查学生知識”的这一环节內。如果这一課的內容是上一課的繼續，那末通过提問就可以联系旧課，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新課，这是十分簡便的。有时候，这一課并不是上一課的繼續，我就不检查上一課所講的內容，而是检查和新教材有关的、过去学过的內容。一般的做法是通过談話作为新教材的导論。这种“导論談話”的任务是巩固旧知識并提示領会新教材所必需的事实和知識，为学生接受新課准备条件。

例如我在講述第二次鴉片战争这一課題的时候，曾用下列十个問題組織談話：

（1）第一次鴉片战争发生在什么时候？

（2）英国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这一次侵略战争？

（3）这次战爭的結果，中英簽訂了什么条約？

（4）中英南京条約在什么时候簽訂的？

（5）中英南京条約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6）五个通商口岸分布在哪里？

（7）鴉片战爭后英国侵略者有没有进入广州城？为什么？

（8）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資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內战采取什么态度？

（9）資本主义国家为什么采取"中立"政策？

（10）上海小刀会起义为什么会失敗的？

通过这一段談話，学生对于这一堂課所要学习的几个中心問題——英法发动第二次鴉片战爭的目的，清政府的投降，广州佛山团練局的斗爭，天津条約北京条約等，都可以較比容易而且深刻地領会。这样，既复习巩固了旧知識，又便于学生更深刻地領会新教材，同时也教育学生应該联系地观察历史問題。

組織在"导論談話"中的旧知識，也不限于最近几課所教的，有时候也可以把很久以前学过的教材組織到談話中去。

这种"导論談話"不只能起上述的几个作用，有时候它能够直接解决新教材所要闡明的問題。例如第二国际这一章，教师要說明的第一个問題是第二国际是在什么情况下成立的？这个問題就可以通过"导論談話"去直接解决。

我在講課开始前，通过談話复习了下面三方面的旧教材：

（1）第一国际的有关史实。

（2）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来，德法等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

（3）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

通过談話，教师只需作簡短的小結，就可以使学生明确第二国际成立的历史条件。

学生对每堂課的检查提問是已經习惯的了。但是一般的只习惯于教师提問上一課所講的內容。这样做，学生一开始是不习惯的，甚至有反感，但是逐漸就习惯了。学生反应說，这种方法开始不习惯，后来觉得很好，使他們能随时复习，因而掌握的知識能达到系統化，也比較巩固。

在講授新知識的环节中，教师也可以（而且也应該）联系旧知識。教师不能花很多时間去进行导論談話，因此有許多旧知識必須在講新課的过程中予以联系。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例如講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左"傾路綫时可以联系第一次和第二次"左"傾路綫，講述紅軍第五次反圍攻失利时，可以联系前四次胜利的原因。講戊戌变法可以联系洋务运动，講清政府預备立宪可以联系戊戌变法。这样的联系既有助于巩固旧知識又便利学生巩固新知識。

联系旧知識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我把它称为縱的联系和橫的联系。上面所举的第二次鴉片战爭、第二国际的例子就属于縱的联系，这是从年代的次序上表明了历史的发展。講"一二·九"联系"五四"，講戊戌变法联系洋务运动，講預备立宪联系戊戌变法就属于橫的联系，这是通过类比和对比揭示了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使学生对相同的和不同的历史事件的性質認識得更深刻。不論那一种联系，教师都应該在备課时經过深思熟虑，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联系的机会。

为做好这一工作，就要求我們必須全面地把握整个課程的內容，要把工作計划得很远，要有全局观点。在准备一堂課时不但要照顧到前面也要照顧到后面。前后呼应，反复联系，这样学生所学的知識就容易巩固。

除此以外，还应該經常教育学生从联系的观点来記忆历史知識。如在布置作业时指示学生怎样联系以前学过的知識来复习今天所講的教材。培养学生习惯于把历史事实联系起来記忆，并自觉地去复习旧教材。

总之，教师反复地、經常地联系旧教材，可以使学生学得的知識系統化起来，可以使学生掌握历史的发展規律，可以使学生充分認識历史事实之間的关联性。可以克服学生把历史現象看作孤立的、偶然的、彼此割裂的不良傾向。当学生系統地掌握了知識，認識了历史事件相互間的关系，他們就容易而且省力地把这些知識牢固地保存在記忆之中。

（四）組織复习課是巩固学生知識的重要方法之一。

复习对于巩固学生知識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防止把已經掌握了的东西遺忘掉的最好的方法。凱洛夫教育学指出，"教师要建立一套复习的制度，来保証学生掌握知識的巩固性"。①

在課堂教学中經常进行的复习工作，在前边已經談了一些，在这里只想着重談一談使知識系統化的概括性的复习。

在每一单元講完后，我总要用一——二节課来复习，期終的复习有时要多到五——六課时。

概括性的复习課一般都是通过談話进行的，因为只有談話才能够广泛地組織同学参加。

有时候是采取課堂討論形式进行的，由教师提出問題引起爭論，最后引导学生得出正确的結論。

---

①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53頁。

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运用乡土教材改进教学方法的尝試

安徽师院附中历史教研組

上学期我校高一、高三各班都講授中国近代史。这一段历史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資本主义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結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論断，給我們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如何使学生能够比較深入地理解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受到較深刻的阶級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呢？我們认为首先必須加强課堂教学的系統性和思想性，使他們学到一些来自于书本的必要的中国近代历史知識。另外，又考虑到他們都是在新中国成長起来的青年，对旧中国的社会黑暗状况缺乏直接的感受，在可能范围內，使他們直接获得一些感性知識以补課堂教学的不足，还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增强他們憎恨压迫者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使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更具有現实教育意义。

为了爭取在实踐中解决这个問題，我們在学校党的領导和鼓励下，注意搜集了有关的乡土教材，并从中找出有現实教育意义的材料补充到教学中去。同时結合这些內容就近組織了参观訪問等活动。

我們学校所在地的安徽省蕪湖市，过去曾經遭到帝国主义在經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長期侵略。在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約"中，蕪湖被开辟为商埠，以后，帝国主义又在这里划立租界。从"蕪湖县志"中，我們找到了1905年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蕪湖关道童德璋——所簽訂的"蕪湖租界章程"。这个章程虽然总共只有十条，短短的一千多

有时复习課是采取分析少数几个概括性的問題的方法进行的。例如我在复习第一次鴉片战爭时，提出了以下四个問題：

（1）鴉片战爭的性質；

（2）中国失敗的原因；

（3）在鴉片战爭中和战爭結束后，中国人民的英勇斗爭；

（4）鴉片战爭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有时，我也采用綜述性的講演来进行复习。这是按照教学大綱中規定的題目对学过的教材进行綜合的叙述。这种講演不是簡单的課程总結。如果教师只是按以前教过的知識重复地叙述的話，就不可能給学生以"新的刺激"，因此我在采用这一种方式进行复习的时候，总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組織教材。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要引起学生对已学过的教材的新兴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深入更全面地揭露教材的实質。例如我在复习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就采用这种方法闡明了教学大綱上要求学生明确的五个問題。这是打乱了过去的知識系統另行組織的。

为了使复习易于进行，也可以利用直观教具。在复习課上我常常让学生研究綜合性的大事年表。教导学生从"縱""横"两方面去研究这类年表。所謂"縱"的研究是指按年代复习重大历史事件，"横"的研究就是考察同一时期內所发生的事件的联系。例如我在复习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在黑板上就用不同的顏色粉笔列出了一系列的年代，然后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学生是极其活跃的。

在复习課上教师还应該帮助学生掌握复习方法。我是从两方面努力的。

第一是設法使学生掌握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基

字，但是却具体而完整地説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其中对于領事裁判权、外国人操縱中国关稅等不平等权利，都一一作了具体的規定。例如关于領事裁判权，在章程中就有这样的規定："凡不安本分、作奸犯案之人，除华人由中国地方官拘办外；如系外国商民，概由监督照会領事官懲办。"另外，在章程中还規定："界內华人房屋以及堆积木植等項，俟該地有人承租时，限六个月內由地方官导諭迁让，惟拆迁各費頗巨……酌給津貼，每亩定价四折，按內地亩数随繳。""界內草屋及下等板房，立即勒令拆毁。"从这些規定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財产房屋的侵占和破坏是多么横蛮无理！

我們在課堂教学中，就把这些具体的材料，用作向学生进行反帝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并且根据这些文字記載中的綫索，訪問了过去居住在蕪湖租界的老年居民和工人，請他們回忆并口述过去帝国主义者侵略蕪湖的具体事实。經过几次訪問座談，确定了参观的步驟和內容以后，我們就带領学生到旧租界去进行参观。

参观由原来在蕪湖海关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現在是当地居民員委会的主任）指引。他向我們指出过去帝国主义洋行的森严的大鉄門和围墙四周密布的鉄栏杆，并且告訴我們說：过去在鉄栏杆的外面还围有一层鉄絲网，大門还有守卫的卫兵。这一切，不但突出地显現了帝国主义者过去凭借武力侵略中国的具体形象，而且也表現了他們內心里又是如何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所以才这样戒备森严。

我們还参观了过去为帝国主义長期操縱的蕪湖海关。就在瀕临長江的海关瞭望塔的下面，这位曾經在帝国主义把持下的海关做过多年工的老人，生动而形象地講述了当年帝国主义者操縱中国海关主权、对待中国船只貨物不平等的情形。他說：当时在海关上的一切重要工作人員，从总管一切的稅务司、办公室主任，到签发放行証的人員，全由外国人担任。一切重要問題只有他們才能决定。載运貨物的船只靠了江边，到海关来报稅的人，只要是外国商人（包括日本商人），他們就可以受到一切优惠的待遇。不論有多少中国人在等候着，也不管等候了多久，外国人一到，就可以随到随办，立即放行。而对于載运中国貨物的船只则百般刁难，故意找麻煩，以致有些貨物因为等时間过久而霉烂了。更不平等的是：中国土貨出口，要征收高額的稅款；而对于进口的洋貨稅額很低，或者根本不納稅。这位老年人感慨地說，据他的回忆，就因为这样，眼看着到海关报稅的中国出口土貨一年比一年減少，而由外国运进中国的洋貨船只却一年比一年加多。

帝国主义者凭借治外法权、关稅协定、关稅操縱等一切不平等的特权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

本綫索。例如我在講述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就把毛澤东同志的两句話告訴学生：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結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引自"毛澤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第二版，第625—626頁）

以后在复习每一单元时总是扣紧了这条基本綫索。学生掌握了某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綫索，他就可以归納这一时期許多历史事实的最基本的特征。这样，历史知識就容易理解和巩固。

第二是使学生明确哪些是基本的教材，哪些是次要的教材。要指导学生怎样分別地对待这些教材。要求学生全部都記住是不可能的，但是孤立地提重点也是不对的。因此正确地处理这两种教材之間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次要的？教师应該根据教学大綱，根据教学目的来决定。

总之，及时的經常的复习，使学生在新旧知識之間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学生就能够深入地理解知識和掌握知識。組織概括性的复习課对巩固学生知識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知識更加系統化，更便利于学生全面地、牢固地掌握知識。

以上是我在教学中的一些做法和体会。当然，巩固学生历史知識的問題在我的教学中并不是已經完全解决了。上面所說的只是我注意这个問題的开始。学生所学历史知識的不巩固的情况仍然是較普遍的。我所以写出来是希望获得大家的帮助，以爭取更好的教学效果。

在租界內横行霸道。但是中国人民并不是好欺侮的。好些老年人告訴我們說：蕪湖租界碼头的搬运工人，因为痛恨帝国主义者的蛮横行为，曾經好几次組織起来，痛打平日欺压他們、为他們所深恶痛絕的帝国主义分子。

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里，当北伐軍占領武汉等地，汉口、九江工人起来收回英国租界以后，蕪湖的工人和爱国的青年学生組成了游行示威的队伍，搗毁了当时为英国人把持多年的蕪湖海关。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威力下面，長期操縱海关，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分子被迫离开蕪湖，抱头鼠竄地逃到上海。蕪湖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收回了海关自主权。这件曾經轟动一时，并且为人們長期广泛傳頌的历史故事，对于蕪湖本地生長的学生是很熟悉的。他們在听了老人的講述后，还用他們自己所听到的生动事实，互相补充，把当时蕪湖人民的英勇斗爭事迹描述得有声有色。同学們听了以后，无不眉飞色舞、喜笑顏开，他們为蕪湖人民反帝斗爭的胜利而感到无限的兴奋和自豪。

除了上述的参观訪問活动外，我們在講到中国近代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时，还和学校附近的公私合营明远电厂联系，到該厂請老工人范兴保同志給学生講課。范兴保同志介紹了这个工厂創办和发展的簡单历史。他說：这个厂是1907年由徽州商人集資办起来的。当时在長江中上游一带算是創办最早、規模較大的发电厂之一。但是由于在帝国主义的排斥和国內封建軍閥的黑暗統治下，一直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加上資本主义的經营不善，內部封建派別傾軋，机构臃肿，很多人光拿錢不干活，解放前不但电費經常漲价，而且还时常停电。这个厂的厂史，也具体地代表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一般概况。

这位老工人还以他的亲身經历講述了工人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剝削的痛苦遭遇。他說：那时工人生活没有保障，劳动没有保护。資本家为了賺錢，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工人的工作时間很長，半夜睡觉，三点起床，很多年輕力壯的工人就这样被活活地折磨死了。在經济方面还要受到层层的剝削。工人的工資已經很低，但就是这一点很低的工資，也不是直接发給工人，还得經过封建把头的手，尅扣一部分以后，才发給工人。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向資本家或把头送礼，不然就随时有被毒打或被开除的危险。那时工人的生命根本得不到一点保障，經常发生触电伤亡的事故。由于没有安全設备，爬到很高的电杆上操作的工人也常常摔了下来，跌得头破血流。受了伤或患了病不能工作的工人，資本家就把他送到一間小黑屋子里，听其自生自死，当然更談不上什么医治和疗养了。病重的不等到死就被抬出工厂，扔在工厂后面的赭山山沟里。在講話中，这位老工人一再感动地說：那时工人暗无天日的痛苦生活和今天工人的幸福生活真是不能相比；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年真是太幸福了。

听过范兴保同志講課以后，我們还在工厂有关負責同志的帶領下，参观了这个发电厂的部分厂房和机器，以及工人的福利設备，如工人疗养室、飯厅等。通过参观，活生生的現实使同学們更清楚地看到今天党和政府对于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是如何地关怀备至。

通过这些活动，同学們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級教育是非常深刻的。有的同学感动地說：“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我一生永远也忘不了。”

我們在进行了这些教学活动以后，也深刻地認識到历史教学只有在“为无产阶級政治服务”的方針指导下，紧密地联系現实，使教学內容与社会实踐相結合，才能提高教育質量。当然，我們上学期的这些教学活动，仅仅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初步嘗試，存在的缺点和問題还不少，今后还需要継續不断地改进。

小辭典

門閥制度

这是以宗族为中心講究家庭出身的一种制度。自魏文帝設九品官人法，門閥制度开始发展。南北朝时，达到頂点。当时社会上最重視門第出身。其目的是維护高級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巩固其經济上的蔭亲制度，压抑中小士族的发展，以达到他們对人民殘酷剝削的目的。东晋南北朝时，南迁的北方大族，有王、謝、袁、肖和南方士族大族朱、張、顧、陆等，都是当时有名的門閥大族。他們为了防止假冒門第，所以非常重視家譜，这种制度不仅巩固了当时士族在政治上的独霸地位，同时也使各种矛盾日益尖銳，也是十六国战乱和南北朝長期分裂的根源之一。（开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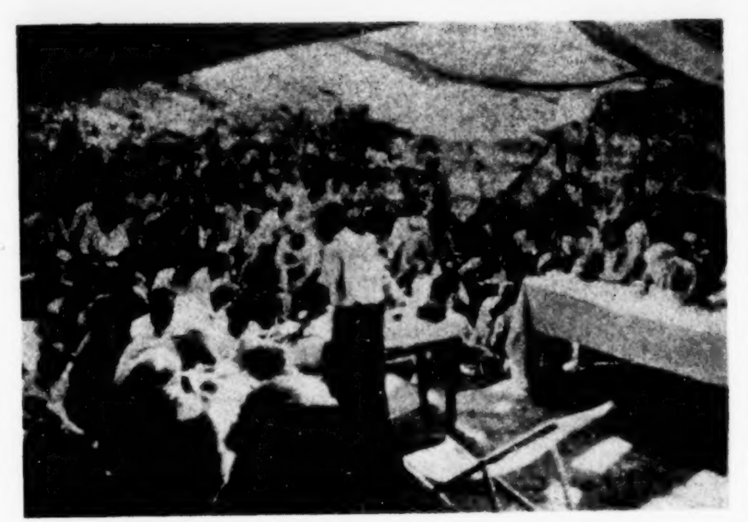


图　五



中共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
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图　六



图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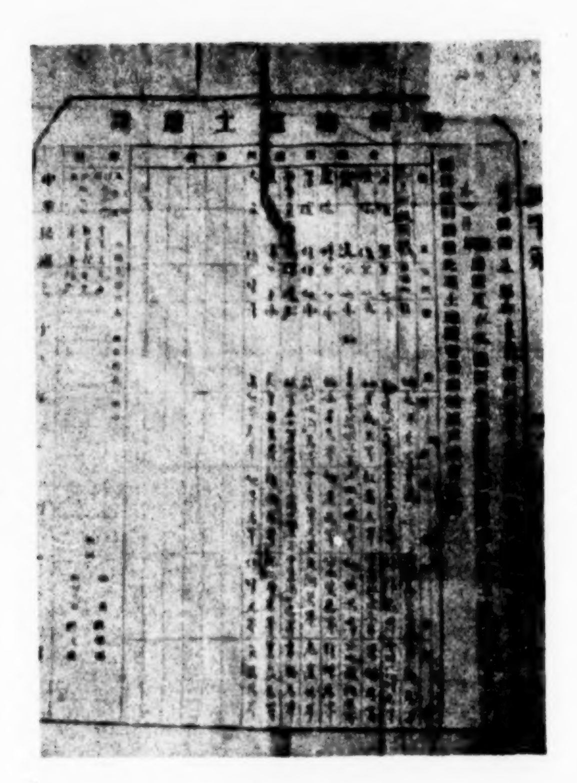


图　八

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議，总結了过去土改的經驗，制訂了“中国土地法大綱”，并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公布。土地改革使解放区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并为整个革命战爭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1947年9月，为了支持严重的軍事斗爭和貫徹“土地法大綱”，中国共产党又进行了全党的整党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內存在的成份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严重現象。〔**图五**〕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会議上作报告；〔**图六**〕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图七**〕河北省淶水县赵各庄农民在土地改革后举行庆祝翻身大会；〔**图八**〕晋綏边区土地証。



中共中央委員會
發佈紀念「五一」口號

图 九

图 十



图 十一



图 十二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紀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了召集沒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議，討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迅速获得了全国人民一致的拥护。而在国民党統治区，在1947年7月—1948年6月的一年間，又爆發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压迫、反飢餓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勢力再起的正义运动。〔**图九**〕中共中央發布的紀念“五一”口号；〔**图十**〕1947年10月28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慘杀了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引起了国統区学生反压迫、爭自由运动的新高潮。圖为北平学生抗議慘杀于子三的示威游行队伍；〔**图十一**〕1948年1月29日，国民党軍警打伤和逮捕举行反压迫請願的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圖为上海伪地方法院审訊被捕学生时，同济大学等各校学生在伪法院門口举行示威；〔**图十二**〕1948年5、6月間，全国各大中城市掀起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勢力的爱国运动。圖为北平学生示威游行。

